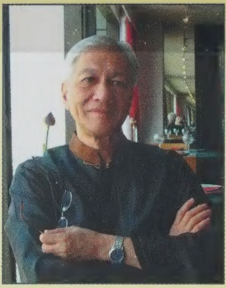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117905489



李怡・邊緣

沒有季節的廢墟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李怡 一九三六年生，童年在上海、北京經歷抗戰與內戰。一九四八年來香港，中學畢業後入職出版界。一九五六年開始投稿報刊，從事寫作及新聞出版工作逾五十年。一九七零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共經營二十八年。在月刊及其後在報章寫政論至今。無大學學歷，自學也不算有成。只是任何人做一件事幾十年總會有點心得。畢生辦雜誌，寫政論，秉持忠於自己、質疑權貴、就事論事、不怕獨持異見的原則，因而不斷在社會引起爭議，被壓制、遭批罵是常事。見過及訪談過不少名人，寫的文章不計其數，也出過些書。至今仍未輟筆，尚在《蘋果日報》寫專欄及社論。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bianyuanmeiyouji00liyi

人生何苦催頭白，知也無涯，憂也無涯，且趁新晴看落霞。
春光釀出湖山美，纔見開花，又見飛花，潦草東風亦可嗟。

汪精衛《采桑子》

卷前這首詞，選自汪精衛《雙照樓詩詞選》。汪雖因其在抗戰時主和與附日，被國共兩黨及它們主導的華人社會指為漢奸，但體察當時情勢而同情和理解他的人也不少。我對這首詞有共鳴，是那句「知也無涯，憂也無涯」讓我頓生「人生何苦催頭白」之嘆。歲月蹉跎，真箇是「纔見開花，又見飛花」，轉瞬數十年，中國的政治文明有進步嗎？

李怡　識

次文化現象文化叢書

現 象 文 化 系 列 之 七 十 六

邊緣·沒有季節的廢墟

李怡◎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⑯

邊緣•沒有季節的廢墟

作　　者：李　怡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0 年 7 月初版
書　　號：SCB535
I S B N：978-962-992-254-2
定　　價：HK$80

©二〇一〇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自序

在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並逐漸財大氣粗的這些年，香港政商界的主流意識是「向錢看」，在經濟上向內地靠攏的同時，政治和社會意識也不斷向中原意識傾斜。主流派最常說的話是：香港不要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被邊緣化。甚至有人發出「宣言」，說為此香港人要改變固有的價值觀和行為。

然而，無論祖國強大不強大，香港從來就處於中國大陸的邊緣，而自從一百多年前，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香港的邊緣地位反而使香港有自己生存發展的空間，更是從楊衢雲、孫中山起，百多年來一直是推動中國大陸建立民主自由人權社會的基地。八九六四和回歸後，這種從邊緣影響中原的社會意識並無大改變。隨着香港與中國大陸在經濟文化上的聯繫密切，緣自殖民地的香港人的價值觀影響大陸，而中國大陸的價值觀也漸漸改變香港。零八年台灣大選後，大陸網頁有一篇署名岳海的長篇評論，從台灣談到大陸，

談到香港，文章說，「中國的前途不是讓這些制度和文化上的『異數』為內地傳統基因所同化，而恰恰在於如何讓這些地方的制度和文化逐漸影響內陸各地乃至中央；我們顯然更樂於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

次文化堂繼《放逐》後，要出版我的第二本政論集，我想最合適的書名就是《邊緣》。我近年的所有政論文章，一個中心主題，就是維護香港在中國大陸的邊緣地位，盡力要保住香港的邊緣價值觀，阻止香港社會意識的中原化，並從邊緣的角度延續百多年來對大陸的影響，我相信「樂於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不會只是大陸少數人的期待。

但數十年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觀察，我對自己的筆耕可帶來甚麼改變，不但不樂觀而且簡直已不抱希望。我相信不論我再寫多少文章也無法改變香港從邊緣化的地位漸漸中原化。我的寫作在很大程度是為了自己，為了忠於自己的良知，為了抒發自己的感受，為了講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再在意社會有多少回響。就像一部電影中的一個智障的孩子，幻想自己是個電車司機，每天準時在貧民窟垃圾場邊風雨無阻開着虛

無的電車，心懷着對未來世界的美好希望。這電影是四十多年前日本黑澤明的《沒有季節的小墟》。本書的副題取用這電影名字但改了一字，因香港不是小墟，今天的處境則有可能淪為廢墟。

智障的人和清醒的人，到底哪一種人更幸福？不言而喻。可惜我不是智障的人，因此對現實我不感快樂。

寫作者的人生態度是：即使我們看到的現實無法使自己樂觀，但並不表示應該消極。在令人悲觀的現實中保持積極的作為，盡其在我，是我寫這本書的所有文章的心情。

目　錄

自序

讓步是一種能力......3

京奧開幕式有違傳統先哲理念......7

為了國家利益，甚麼事做不出來......11

外國傳媒何以冷落金牌大國？......15

京奧閉幕，中國向世界傳達甚麼訊息......19

京奧成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勝利......23

同一個月亮，同一樣的自由......27

老百姓無語問天：我們可以相信甚麼......31

神七中國和毒奶粉中國......35

衣食不足無以知榮辱......39

神七問天，百姓無語問蒼天......43

中國的希望何在？......47

《海角七號》vs「神舟七號」......52

特首施政卻不知何謂核心價值......56

對手強反對派也強，對手爛反對派也爛......60

以欺騙手段搶獸首是更大國恥......64

國強民弱，中國的悲哀..68
是第二個權力中心還是太上皇？................................72
不知是政協們的幸福，還是香港的不幸...................77
驚世真言：把掌權者關在籠裏..................................81
禁得了仆街，禁不了福佳..85
諂媚過度敗事有餘的知識人......................................89
中國的朋友與敵人..93
開放討論，是解決六四難題第一步...........................97
《基本法》大，還是鄧小平大？.............................101
「五四」九十周年，「德」「賽」今非昔比.........105
對領袖無情，是偉大民族的標誌.............................109
非愛國主義，乃國家主義..113
不要綁架整體香港人與你一起見利忘義................117
奴才拍錯馬屁，六四再掀熱潮................................121
非理性主義的政治數學..125
黃雀行動寫下香港歷史光榮一頁.............................129
香港人孤獨地延續六四記憶....................................133
香港人七一「再出發宣言」....................................137
姑息主義讓專制政權更肆無忌憚.............................142
換一個特首，仍是怪胎..146
二零一二特首爭奪：鹿死誰手？鹿死定了！.........150
中共建政六十年的真正反思....................................154

天國與地獄：海外華人的兩極際遇......158
爭取二零一二成為邁向普選的中間站......162
中國進入一個互不相信的時代......166
在專權政治邊緣六十年的香港故事......170
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難解難分......177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181
沒有了「人民」的慶典......186
有普選，才免於「官不聊生」......190
試為錢學森的最後一問作答......194
「民主行頭，個黨第二」是重要原則......198
王維林以一人之力推倒柏林圍牆......202
北京現階段沒有讓步的能力......206
中國特色的普選路線圖......210
籲請泛民以鋼鐵團隊參與總辭公投......214
北京全力在港推動中國特色的「普選」......219
把市民應有的決定權，變相給予市民......223
市民應奮起捍衛《基本法》......227
這不是一個快樂的聖誕節......231
中國香港，變亦變，不變亦變......235
走出無法實現真普選的怪圈......239
摒除文字障，看公投本質......243
扭曲孔子迎合時潮令人痛心的電影......247

譚案顯示：國家政權等同豆腐渣工程......................251
沒有激烈主張，連平和改革也不行..........................255
每年三月開一次的苦菜花..259
「愛國」新詮釋：不是感情，而是政治..................263
釐清「事實」與「言論」的分野..............................267
保香港優勢和特點，是解決矛盾之道......................271
真的真不了，假的假得了..275
香港核心價值的淪落..279
兒童節感言「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283
感謝聲中，黨和政府越來越偉大了..........................287
要爭取當公民，還是甘願淪為屁民？......................291
立會世博行是一石四鳥的統戰招數..........................295
假如黃福榮仍活着..299
民主黨方案總算向普選走前一步..............................303
支持民主的市民何去何從..307
新階段民主運動的開始..312
絕不讓政改一小步演化成最後一步..........................316

邊緣・沒有季節的廢墟

讓步是一種能力

中國既要舉辦一個「平安奧運」，又要舉辦一個「盛世奧運」，這兩個目標看來有些矛盾。要保證「平安奧運」，自然要安全部門大舉出動，除了種種反恐演習和戒備之外，還收緊外國人的簽證，壓制國內的任何抗議聲音，封閉網站的討論區。《蘋果日報》記者一度被拒入境，對香港記者連續兩天粗暴對待，大舉逮捕維權人士，都是政法機關要加強專政手段的表現。但另一方面，以奧組委為首，就要貫徹辦一個「盛世奧運」的目標，因此，對《蘋果日報》記者終於放行，對連續兩天干預香港記者採訪的行

動就表示「處理手法不當，避免再有同類事件發生」。奧組委被問到是否會徹查事件時又支吾其詞，並要求香港記者配合公安管理工作。似乎最高當局仍以「平安奧運」為第一優先，是不是表現出「盛世」及按現代文明社會的要求和秩序處事，就放在低一個層次考慮矣。

為了與文明社會接軌，奧組委宣佈設置專供示威人士表達意見的三個示威區。儘管示威區都離奧運比賽場地甚遠，又要提前五天申請，更嚴禁「損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申請，禁止沒有永久居留權的人提出申請」，這實際上已將西藏、達爾富爾等問題的示威申請排除在外了。國際人權組織說這「只是一塊遮羞布」，目的是「幫助中國和國際奧委會擺出尊重示威權的樣子，而事實卻恰恰相反」。

不過，即使是這樣一個遮羞布式的舉措，中國也以對外宣示為主，在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主流媒體，都沒有發現對這項舉措的直接報道。報道這消息的只有《南方日報》、《京華時報》等非主流媒體。中國當局顯然不想這措施在內地引發討論，並誘導對人民示威權利的期待。

但即使這樣，仍出現兩篇有關評論。一篇評論刊於（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國青年報》，題為：〈「奧運遊行示威公園」開始的民主訓練〉。評論說：「和平集會和遊行示威的權利是一項普世性的公民權利，也是我們憲法所保障的權利」，「各種觀點的意見紛呈是很正常的，應當予以容忍。多元化的觀點通過正常的渠道表達，有助於政府兼聽則明」。評論主張不要把示威遊行「視之為洪水猛獸」，這樣「才能讓公民紓緩過激情緒，保障社會和諧」。評論對中國留學生在奧運聖火傳遞期間的一些過激表現提出批評，說「留學生不遵守所在國遊行示威的法律規定，對他國公民表達意見顯示出極度不寬容，給他國人民留下不好的印象」。

當然，評論沒有提及這些留學生是由中國駐外使領館所發動的，也沒有提及大批來港的內地客在香港聖火傳遞時的惡劣表現，和香港警方與他們的配合。

另一篇是七月二十四日發表於中國網的評論。評論說，設立示威區「對歷屆奧運會來說，並不是創舉而是慣例，但對正在崛起的中國來說，卻是開創先河的破冰之舉」。「在中國，遊行示威向來屬於敏感詞

彙，雖不至於談之色變，但自上而下，均避之唯恐不及。」「設立示威區，正是成熟包容的平常心的表現。」「這是一種政治智慧，也是一種大膽嘗試。或許未來成為一種慣例，亦未可知。」

這兩篇評論，如曇花一現，並無後繼，但卻殊不簡單。它們反映了內地社會對意見表達自由充滿期待。這期待顯然不是中國主政者所願意見到的，因為中國主政者仍未具有包容和讓步的智慧與能力。假惺惺的示威區，對香港記者動粗自認處置不當，都只是應付奧運的權宜之計。

「讓步是一種能力。」這是廿一年前（一九八七年）筆者訪問柏楊時他所說的一句話。當時正是蔣經國在台灣實行開放政策的時候。柏楊說他被國民黨關了這麼多年，沒有道理幫國民黨說好話，但蔣經國的讓步，確實表現了能力與智慧。「有些人老是從道德的觀點去要求一個政權自動讓步，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被迫的情況下，只要它認清局勢而轉彎，這就是英明。」

筆者認為，中共還未具備讓步這種能力。奧運過後，一切都會打回原形。

二〇〇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京奧開幕式有違傳統先哲理念

京奧開幕式已過去幾天。開始時是海內外一片讚嘆驚艷之聲，接下來就是內地網民對張藝謀承接他在《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中一以貫之的視覺盛宴的批評，指為空洞、無中心、不感人。經過數日的思考，筆者且對整個開幕式演出的中心思想，提出一點淺見。

開幕式總的精神表現，在於人多、步調動作齊一，而最後突出一個「和」字。有人指，「和」讓人聯想到「和食」、「和牛」，屬日本大和民族精神。但實際上，「和」字是從中國先秦哲學中就開始提倡的。

「禮之用，和為貴」，是《論語》的

話。中國藉奧運開幕式，提出「和」的精神，認為這可以與奧運的「和平」意念接軌，將「和為貴」解作社會、人際、國際等關係中以和平、和氣、和諧為貴、為先、為重。但這只是對「和為貴」的粗淺闡釋，並沒有觸到中國傳統哲學中「和為貴」的真正涵義。

明代朱熹《論語集注》中對「禮之用，和為貴」一句注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體雖嚴，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不迫，乃可貴。」後之學者也沿襲朱熹的解釋，認為「和為貴」的根本要義，在於自然和順與從容不迫。

古人愛講天道，最大的天道是自然，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比天與道更高的法則，人做事，一定要順應自然，切忌逆天逆道，為所欲為。中共建政以來，強調「人定勝天」，表示「與天鬥，其樂無窮」，包括「高峽出平湖」的壯舉，都與「和」所主張的順應自然精神相背。大幹快上、以運動治國，均違反和順自然、從容不迫的「和」之道。遭天譴是戕害自然所得到的報復。

《論語》關於「和」字的另一論述，是「君子和而

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承認和尊重「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有這種承認和尊重，就可達致人際、社會、國際之和諧，若不承認和尊重人心之不同，硬要追求表面上的統一，強要千人一面、眾口一聲，那麼表面上是「同」了，但卻是「同而不和」，無法達致和諧。

「和」是出於自然，而「不同」也是出於自然。因為人的意識千差萬別，世界正因為有不同的事物互濟互克，不同的意識切磋砥礪，才能令世界進步，令社會生機勃勃，奼紫嫣紅。因此，「和而不同」正是千變萬化的世界得以存在的自然之理。相反，如果硬要追求表面的一律，要所有人的見解都一樣，全國人民都只可以依循「毛澤東思想」，而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那麼過去的教訓就是導致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因此，「同而不和」不但是小人（如憤青網民）毫不從容的處事之道，而且是令整個社會趨於毀滅的定則。

用《論語》對「和」的釋義，來看奧運開幕式中以千人一面、整齊同一的步調動作來表達先哲的「和」的哲理，可說捉錯用神。這未必是出自張藝謀對中國古代哲學的一知半解，很可能出自中共今天追求和諧社

會的基本觀念。中共或認為，「和」就是要「同」，就是要千人一面，眾口一聲，因此不容許有不同意見在奧運場內外表達或標識展示，幾個示威區形同虛設，個別申請示威者突然無故失蹤，正是追求「同」並以此顯示「和」的表現。殊不知，按中國儒家傳統哲理，表象的「同」是一定會導致「不和」的。因此，近來內地的暴力事件不絕如縷。

開幕式宣揚「和」，卻以「同」來表現「和」，雖悅目，但少了讓人感動的人性，少了獨特個性，少了自然。《我和你》的主題演唱，更是空洞乏味，糟塌兩位好歌喉。

點聖火儀式，用了夸父追日的古典，雖具創意，但這典故恰恰是表現傳說人物違反自然不自量力的行徑。《山海經》說，「夸父不量力，欲逐日景」，把河水喝乾，仍遠未把太陽追到，就渴死了。如果設計者要藉此表達在中共盛世可以追到太陽，可以勝天，那就完全違反「和」字的和順自然之理了。

以「同」來追求「和」，是永遠不會「和」的。但這正是中共當前施政違反自然的矛盾和悖理之處。

二○○八年八月十二日

為了國家利益，甚麼事做不出來

奧運煙花的實況轉播揭發並非「現場實況」(Live) 而是電腦合成，開幕小女孩演唱《歌唱祖國》又揭發是幕後代唱，開幕式造假的新聞一樁樁曝光。德國傳媒形容開幕式造假就像是在湯裏發現了頭髮，《蘋果日報》刊出焦國標文章，總括湯裏的頭髮有七根。《華爾街日報》又揭露，開幕式中一群身穿中國各種少數民族服飾的孩子，簇擁一面巨大國旗進入會場，但其實這群孩子全部都是漢族兒童。湯裏又多了一根頭髮，至今共八根矣。

八根頭髮中，最受國際社會質疑

的，是造假代唱一事。這件事由奧運音樂總監陳其鋼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講出來，顯得理所當然：幕後代唱的七歲小朋友楊沛宜沒有被選上是因為形象，這樣做是考慮國家利益，尤其是中央政治局的領導給我們提了意見。言下之意，假唱完全是符合國家利益、領導人意見的無可爭議之事。然而據一般人的理解，代唱在電影、電視劇中固然是常事，但在現場演出中則屬作弊行為。即使在中國，據國務院第四三九號令《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演員不得以假唱欺騙觀眾，演出舉辦單位不得組織演員假唱，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為假唱提供條件。」因此，假唱在中國也是違法行為。但為了「國家利益」，在領導人指示下的違法似乎也有了正當性。

開幕式的造假代唱，在大陸除了網民質疑之外，公開的媒體全不觸及。香港傳媒也不當作是甚麼了不得的事，甚至有人認為只要能提供完美的視聽享受，是否代唱無關宏旨。然而在西方，從《紐約時報》到地方報紙，都把這次的造假代唱列為大醜聞，放在頭版報道。許多報道更把這次愚弄四十億觀眾的造假，與

中國的假產品、假名牌、劣商品聯在一起，認為這件事反映了中國是一個崛起的造假大國。開幕造假對中國形象造成的損害，奪取多少金牌也補不回來。

造假代唱事件最讓人們感慨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作為開幕式總設計師的張藝謀，在代唱未揭發前，接受北京電視台訪問時說，對整場演出，他最感動的是小女孩《歌唱祖國》那一節。他明知道這小女孩不是真的唱，而居然把假的當真的「感動」，他本人有真的感情嗎？還是早已真假不分了？

二是為甚麼在天真的孩子身上造假？用孩子的純真來感動觀眾，卻原來是欺騙觀眾。這種行徑對全中國孩子們的心靈造成甚麼影響？父母、師長都教導孩子要誠實，但偏要他們來串演假戲，讓孩子們從小就接受一個謊言的世界。而孩子所代表的，卻是中國的未來。

三是對造假代唱用上「國家利益」的藉口。甚麼是國家利益？為甚麼由一個聲音甜美、樣貌可愛而僅僅因為牙齒有欠齊整的女孩站出來演唱就不符合國家利益？是這個女孩的外貌有問題，還是國家利益有問

題？有內地網站揭露，假唱的林妙可，拍過一連串的廣告，她能走上台是因為背後有廣告商的公關在發功。所以，所謂國家利益，事實上只是政商界人士謀求個人利益的遮羞布而已。

四是從這件事，可以看到，在可見將來，中國怕很難建立一個人對人有起碼信任的社會了。當政府帶頭造假，一切都難以相信了，社會難免在爾虞我詐中沉淪。

比如說，這次在女子體操團體賽奪金的隊員中三個都剛滿十六歲，正好達到奧運的參賽資格。其中何可欣，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中國官方媒體報道她是十三歲，現在（零八年）中國拿出她的護照已足十六歲。國際奧委會當然要承認中國官方的年齡文件，但有了「國家利益」的說法，就難免使人們懷疑：她的年齡也會服從國家利益嗎？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八日

外國傳媒何以冷落金牌大國？

在北京奧運會中，中國代表隊已突破去屆所獲金牌總數，並大幅領先美國。照此趨勢，中國要成為超越美國的第一金牌強國，此夢想相信不難實現矣。

中國人當然會為中國運動員取得的成就高興。但為甚麼中國代表隊舉行記者會，反應卻出奇冷淡呢？這個記者會只有寥寥二、三十名記者出席，幾乎都是內地媒體，外國記者對金牌榜首的記者會毫不感興趣，他們大多湧往美國泳將費斯奪八金後的記者會。

外國媒體對中國奪金報道很少。各

國除了報道本國選手的賽情之外，大部份都集中報道費斯奪金以及牙買加百米飛人保特破紀錄的情形，電視一再重複費斯與保特奪金的賽事畫面。

關於中國，非常不幸，引起外國傳媒話題的，不是屢屢奪金，而是中國女子體操隊員的年齡問題。

國際體操聯會規定，參加奧運體操比賽選手必須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出生的。目的是保護兒童避免過早參與可能傷及身體的運動。中國這次參加奧運女子體操隊的，有三名選手正好滿十六歲。但外國傳媒卻翻出中國過去的官方報道，顯示有兩名運動員可能未達到年齡要求。

較多疑團的是何可欣。二零零六年一月，成都體育局官方網站一份「運動員交流協議名單」體操項目中的第十名選手何可欣，出生日期列明是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三日在新華網的一篇報道說：「十三歲的武漢選手何可欣在女子高低槓比賽中的對手是國家隊的楊伊琳。」同一天，在第六屆全國城市運動會上，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發表講話，其中說到：「十三歲的體操高低槓選手何可欣出色地完成了

『李婭空翻』的全套動作，戰勝了剛剛獲得世錦賽季軍的楊伊琳。」今年（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英文《中國日報》的一篇報道提到何可欣，說「這位十四歲的隊員是在去年進入國家隊進行訓練的……」

另一名女子體操選手江鈺源，在浙江省體育總局青年運動員名單上，她的出生日期是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

外國傳媒對上述中國官方的報道，都製版刊出以證實來源。雖然中國的新華網已刪除了這些報道，但在Google的Cach裏仍可找到原文。

不過，中國官方提供了護照複印本，顯示她二人今年都是十六歲。國際體操聯會無法不承認中國官方提供的文件。國際奧委會自然也不能說甚麼。但幾乎所有外國傳媒都不相信中國提供的護照證明。美國體操教練Martha Karolyi的丈夫Bela Karolyi在對選手年齡作了詳實調查後表示：謊報年齡比使用禁藥還要糟糕，無法被大眾所容忍接受。原因是：用禁藥只是運動員自己犯規，而謊報年齡則牽涉官方參與提供假年齡的護照。

當然，中國官方可以說，以前的報道都不確實，一切應以中國護照上的年齡為準。畢竟，政府參與在護照上造假是不可思議的。但慣於政治掛帥並強調事事服從國家利益的政權，若要世人相信它的說法，官方就應詳細交代過去有關這兩位運動員年齡的報道為何出錯，而不是把有關網頁刪除，當一切沒有發生過。如果認為只要「搞掂」國際體聯，就萬事大吉，不把國際輿論放在眼裏，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這樣，那麼中國舉辦奧運的意義何在？除了表面風光之外，中國怎麼顯示它與國際準則接軌？中國偽劣產品已不斷被質疑，中國的誠信何堪再自我毀傷？

為甚麼外國媒體不關心中國有多少金牌？答案可能要從中國自己的做法中去尋找。

（附記：二零一零年三月，國際體操聯合會宣佈，經調查證明，二零零零年在悉尼奧運會的中國體操女運動員董芳霏虛報年齡，那年她十四歲，卻虛報十六歲。國際奧委會撤銷中國女子體操當年所獲銅牌。中國奧委會沒有否認，只說這已是陳年往事。）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九日

京奧閉幕，中國向世界傳達甚麼訊息

北京奧運（零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舉行閉幕式。中國通過十七天的奧運，給數十億全球觀眾傳出甚麼訊息？

在香港電視轉播中，這十多天我們看到最多的，是升國旗、奏國歌的畫面，它使不少人興奮，甚至讓一些人抹淚。但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感受卻未必相同。

看看香港回歸前的宗主國英國吧。英國BBC中文網刊出一篇〈英倫隨筆〉，文章說，「奧運開幕以來，讓英國人集體抹眼淚的不是從北京傳來的升英國國旗、奏英國國歌的奪金喜訊，而是中國

小女孩林妙可和楊沛宜的故事。」「這個故事在英國媒體上佔據的報道篇幅不亞於對北京煙火美輪美奐的描述。」開幕式後，英國許多媒體刊登林妙可的大照片，天使、寶貝、甜美、秀麗，一片讚美之詞，這個九歲小姑娘征服了無數英國人的心。但一夕之間，有了一百八十度改變。

北京奧組委自我揭發是假唱之後，英國各報紛指是「騙局」、「醜聞」，各報紙的標題是：「小女孩太醜不能參加演出」；「牙齒不齊是奧林匹克的新禁令」；「(沛宜是) 中國不希望世界看到的小女孩。」倫敦一個帶大了四個小孩、有十一個孫子的老太太，在看到穿紅衣的林妙可時，感動得把手伸向紙巾盒，知道假唱後，她憤憤不平，既可憐這個因容貌面對壓力的孩子，又同情沛宜的媽媽，「不知道她怎麼向自己的寶貝解釋。」「All children are beautiful ! All little girls are angels !」這是老太太的「閉幕詞」，代表着絕大多數英國媽媽的心態。

這其實也是全世界絕大多數媽媽的心態，包括中國的媽媽在內。然而，在一黨專政、政治掛帥、以「國家利益」凌駕人類天性的體制下，卻要創造「虛假

的完美」，而且還由主其事者理所當然地向中國媒體「炫耀」這種來自政治局下達指示的創造。主政者似認為，讓九歲的孩子戴上「假冒」的帽子，以及讓七歲的孩子經歷因為容貌遭受拒絕的挫折，都無所謂：她們不就是小孩嗎？怎能不服從國家利益呢？

京奧開幕式這段小插曲，為甚麼讓英國人（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集體抹眼淚？中國當政者可能不懂，大陸人民也可能不懂，甚至回歸後的香港人也漸漸不懂。但這正正反映了北京奧運會未能與世界接軌的要害之處。

中共的意識形態，是以國家利益為主，但西方文化意識則更重視個人自由與尊嚴。中共的意識形態認為，它管治下的人民，尤其是孩子，理所當然是可以任意支配的。但世界文明國家的意識形態是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有天賦人權的、應該被尊重的，尤其孩子，更是人類未來的花朵，社會的關注中心。

中國以國家力量，不惜任何代價，也無須得到納稅人和民意代表的同意，就可以撥出超越雅典奧運八倍的經費去辦京奧。對奧運有任何非議，等於挑戰國家權力。但在英國，至今仍有輿論與政黨在反對二零

一二年舉辦倫敦奧運。

中國以國家力量培訓運動員，因此幾乎所有參賽的中國選手，都繃緊了臉去爭勝。贏了他們奔向教練與領隊，輸了（即使得銀牌）他們會流淚甚至痛哭。我們見到中國選手發表獲獎感言，都説感謝國家栽培，不負十三億人民期望，幾曾見中國選手有牙買加飛人保特那樣輕鬆、搞笑的動作和表情？有哪個中國選手會像水神費斯那樣，獲勝後説最想見媽媽？從賽場上的神色、表現，中國選手與西方選手像是來自兩個星球的人。

北京奧運向世界傳達的訊息是：在權力集中之下，沒有甚麼事情是做不到的，包括製造完美的容貌與歌聲的合成，包括四十多面金牌，包括暫時開放對境外網站的瀏覽，包括設示威專區……。表面上，一切硬體都有，實質上卻少了軟體應有的純真、自然、人性。比如示威專區，雖然設了，收到七十七宗示威申請卻沒有批准一宗，早前到北京申請示威的港商權益關注組成員被公安拖至偏遠郊區，音訊全無。

京奧閉幕，世人對京奧成果刮目相看，卻對它的體制更難認同。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京奧成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勝利

北京奧運毫無疑問是成功的。中國運動員的成績也毫無疑問極為彪炳。這成功、這成就，也毫無疑問地建立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基礎上。

首先是對京奧的投資。據北京奧運會發言人在（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宣佈的數字，是三千零六十七億元人民幣，合四百四十七億六千萬美元，比早前估計的四百二十億美元為多。這數字創下了一百多年來歷屆奧運投資之最。在過去二十九屆奧運會中，只有三次是在非高收入國家舉行，而中國是三次中的最

貧窮主辦國家（人均收入不足三千美元，低於十九屆墨西哥和廿二屆蘇聯的當時人均收入）。

一個國民收入處於低水平的國家，卻於奧運投入歷屆最多的金錢，如果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肯定不可能被民意、媒體、國會所接受。二零一二年奧運主辦國英國屬高收入國家，籌辦奧運預算九十三億英鎊，合一百七十一億一千萬美元，已被傳媒與反對黨痛罵。倫敦市長聲言，這次特意將奧運賽場建在倫敦最貧窮的五個區，目的是希望藉奧運之力幫助這些區復興。因此，只是藉奧運以投資社區。這樣才使罵聲稍減。

其次，中國若不是奉行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也決不可能取得金牌第一、總獎牌第二的奧運成績。與中國經濟發展相近的印度，這次才破天荒取得自參加奧運以來的第一面金牌。位列G8的發達國家加拿大，這次只取得三面金牌。在加拿大，為民眾提供的種種體育設施完善，人民愛運動，也不像中國民眾那樣要打破頭爭運動場。加拿大宣佈，在奧運會獲金牌的選手可得二萬加幣獎金、銀牌一萬五千，銅牌一萬。相對於中國由國家給予金牌選手三十五萬，加上霍英東基

金會、贊助商和地方政府付出的獎金，每個中國金牌選手可得一千萬，發達國家加拿大金牌選手的獎金，真是十分寒酸。

中國獲獎牌多，更因為用「舉國體制」對運動員作精英培訓，所花的錢也是天文數字，據統計每名金牌選手的投入為六億元。這樣的巨資投入去訓練精英運動員，在非專權政治的國家，一定被民意、媒體和國會吵翻天了，是絕對不可能通過的預算。至於從三至五歲就進行封閉式、地獄式的培訓，也不是民主開放社會所允許的。這自然也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舊日蘇聯和東歐國家都有這種奪金搶銀優勢，但自從社會主義體制崩解後，這種優勢也就消失了。

其三，京奧開幕式的假唱、假煙花腳印、假彈鋼琴、假少數民族兒童擎巨旗入場的令舉世驚嘆的完美演出，也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優越性。而二千多人的齊一動作，也只有同屬社會主義體制的北韓「阿里郎」萬人操可以相比。

被質疑未足齡的中國體操女運動員，也只有在社會主義體制的保護下才能過關。明明外國已從網頁上

翻出二零零五、二零零六年兩項官方文件「全國體操運動員上報註冊表」，上列明「楊伊琳」的出生日期是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而何可欣是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又翻出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在去年（零七年）十一月三日的講話，以及《人民日報》、英文《中國日報》等多份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都顯示她們未足十六歲，但中國官方卻能亮出她們的護照作證，使國際奧委會無話可說。現在全世界的媒體與民眾，大概很少人相信她們所報年齡是真實的，但若說官方護照公然造假，又超出現代文明國家人民想像之外。奧委會莫奈他何，看來只好輕輕放過。

京奧成功與中國運動員成績，固然主要是社會主義體制優越性所造就，但光有社會主義還不夠，還要加一個「中國特色」，這個「中國特色」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日益增長的全國上下的拜金主義。因此，京奧的成功與中國運動員的驕人成績，正是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加上「中國特色」即赤裸裸的拜金主義的勝利。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同一個月亮，同一樣的自由

明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這一天，我們都珍惜與家人團聚。倘若家人暫時分離，我們會想到「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美麗詩句。在宣揚「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奧運後到來的中秋，我們會不會想到，在同一個月亮之下，全人類是不是也應有同一樣的安寧、自由和權利呢？

今年（零八年）中國大陸第一次把中秋節訂定為「法定公休日」（公共假期）。北京資深媒體人淩滄洲等十四位學者、律師與文化人，日前聯署發表了一份《中秋節文化宣言》。宣言說，在中秋節

傳說中，「最震撼人心的，莫過於傳說月餅曾傳遞人們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信息」。

《宣言》指出，元末的暴政激起人民反抗，朱元璋聯合各路反抗力量準備同一天舉事，但蒙元官兵搜查嚴密，消息傳遞困難，朱元璋的軍師劉伯溫遂命下屬把「八月十五夜起義」的紙條藏入月餅內，派人分送月餅至各地起義軍，以造成各起義軍一同響應、奮起抗暴的態勢。

「這個追求自由平等，反抗強權，用月餅作為媒體傳遞信息的故事，寄託了中國人民美好的期望。」「今天……有多少人能思考：當文字獄瘋狂的年代，別說月餅傳遞反抗的信息，吟一首詩歌、寫篇文章也會鋃鐺入獄、身死名裂、凌遲處死、株連九族？有多少人能思考：在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互聯網上，每天蒸發、屏蔽的帖子有多少？有多少防火牆和網管、五毛（指在網上發表支持中共施政文章者）在偷偷摸摸地行動，阻斷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傳播，把我們民族弱智、恐嚇、退化為野蠻人？」

為此，《宣言》向中共政權和人民呼籲：「一方面

要把中秋節過成中國人尊重傳統、尊重家庭親情的節日，一方面也要把中秋節過成言論自由節。我們要衝破一切心靈內外的枷鎖，自由地表達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一切箝制言論自由的屠夫與掠奪者，必將遭到我們的唾棄。」

《宣言》說，「體育上的金牌固然是中國人競技體育進步的標誌，但言論自由的金牌，民選票選的金牌，才是每個中華兒女應該努力追求、無比渴望的。」「言論自由甚至比衣食更加重要，言論自由是區分一個人是奴隸還是自由人的顯著標誌。」「『幸福是自由的果實，自由是勇氣的果實。』我們在年年中秋節的夜晚，想起我們祖先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勇氣與智慧，我們確信我們的呼籲儘管是爭議性話題，但終將被人們討論。」

言論自由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早已不是爭議性話題，只有在中國等少數國家才是爭議性話題。言論自由在香港，本來已是同陽光、空氣一樣自然地存在，但近年媒體的自我審查使許多論政者都彷彿有了「心靈內外的枷鎖」。

言論自由對一個社會的重要性毋庸多說。《宣言》把它說成是「區分奴隸還是自由人的顯著標誌」，並不為過；因為掌權者的權力總是與人民的權利互為消長的。掌權者的權力大一些，就意味人民的權利少一些。當掌權者要擴張權力時，只要有言論自由，就能有效監督掌權者的濫權。因此，在所有的人民自由權利之中，言論自由最為根本。對於長期處於言論自由受壓制的大陸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在《中秋節文化宣言》中流露的心聲，我們深深理解也深表支持。

《宣言》受到了不少內地網友的呼應。有人以在籌辦京奧中，「黨和政府」的「非凡表現」，和居金牌榜首的地位，期待中國能擺脫「新聞自由度在國際排位表居於最末的行列」。在汶川地震中，中國曾一度開放境內外媒體的自由採訪，對內地媒體的報道也稍放鬆。京奧期間，也稍開放一直遭禁的境外網站。中國對新聞自由的控制雖有所放鬆，但能否持續仍受國際社會關注。

言論自由如中秋的一輪明月。大陸人民希望看到它的澄明。香港人也不願見到有雲影遮蔽。這是大陸知識分子的中秋節願望，也是香港人的中秋節願望。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三日

老百姓無語問天：我們可以相信甚麼

三鹿毒奶粉事件很可能是近三十年來最大的一宗公共食品安全事件。至（零八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全國已有六千二百四十四名嬰兒患腎結石。官方新華網表示，「保守估計，三鹿受污染奶粉全國的潛在受害者可能超過三萬人。」伊利、蒙牛等品牌的受害者尚未估算在內。因此，它可能是比汶川地震更大的災難。

在內地殘奧會的留言網上，網民因政府為了奧運而掩蓋毒奶粉事件，表現得極為憤怒，由支持奧運變為痛罵奧運，有的說，「對於洋人的禮遇永遠高於自己人，這究竟是民族自豪感還是民族自卑

感造成的？……火車出軌、三鹿事件、山西尾礦庫事件……且不論今年的雪災、震災，敢問一句：你們還有心情津津樂道甚麼奧運辦得如何，老外們讚許了幾多？上面這些事件，放在西方，政府早解散幾回了。作為執政黨，有沒有好好反思：究竟哪裏出了問題？根源在哪裏？」有的說，「為了一個奧運會，毒奶粉在中國繼續存在兩個月，我現在恨奧運會，博取外國人開心的中國燒錢賠本賺吆喝，讓外國人看熱鬧。」有的說，「中國老百姓現在活着都是問題，去醫院看不起，食品都有毒。」

這些網上的痛罵，估計很快就被刪除，而且會禁止討論。而對有關事件的報道，也要由新華社統一發稿。有外國傳媒曾一廂情願地希望中國會在奧運後延續《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九月九日斬釘截鐵說，「有關規定是十月十七日終止。」

對毒奶粉的處理手法，也同過去的重大失誤事件一樣：先抓幾個替罪羊嚴懲，對三鹿負責人作刑事拘留，罷去幾個官員的職務，對受害者家屬的索賠、抗議，就以「擾亂社會治安」的名義予以打壓，或由余秋雨之類的無恥文人撰文〈含淚勸告毒奶粉受害人〉，媒體不再提此事，讓民眾淡忘。然後，等第二宗其他的

毒食品事件再爆發。

罷免、懲處一些人，只勉強算得上事後問責，然而，為防止另一宗事件發生，更重要的是事前的管理制度。對十三億中國老百姓來說，現在陷於對政府、對整個社會的信心崩潰的邊緣。他們不知道今後可以吃甚麼，用甚麼，可以相信甚麼。衞生部長陳竺說，「日後會大力推動母乳育嬰計劃」，意思是只有媽媽的奶才是可以相信的。那麼有種種原因不能餵母乳的嬰兒呢？或長大一點要戒母乳的孩子呢？是讓他們在餓死與腎石之間作選擇嗎？

一個社會要穩定，要使人民對社會有起碼的信心，首先要厲行法治，並要建立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良好制度；其次需要有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社會力量，如代表工人的、農民的、社區的、消費者的等等民間組織，使人們能在利益受侵害時有抗爭、議價的能力；其三要有獨立的媒體；其四社會要有核心價值觀，要有信仰，而且必須是非基於物質利益也非政治利益的信仰。但這些東西，全部由共產黨一手包辦了。沒有法治，沒有三權分立，甚麼群眾團體與媒體，都要服從黨領導。

其他方面且不說，就以制度上的食品管理來說吧。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對食物藥物的監管，都是制訂法例與執行法例、檢控機構分開的，只有中國，質檢總局就既制訂條例又執行條例，既有批准產品上市權力，又有撤銷及檢控的權力，甚至連司法程序、法院都由黨包辦。為甚麼美國每年只批准三數種藥物上市而中國卻有數不清的藥物上市呢？因為每一種舊藥轉成新藥都可以提價。而批准的官員和決定三鹿為「免檢產品」的官員，會不會得到好處，就不問可知。

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並不是意味無法無天、甚麼害人產品都可以拋出市場的。自由經濟成功運作的關鍵，是必須實行政治權力的公有制，也就是說，必須經全體適齡選民投票產生的政府去執行公權力，這樣才起碼可以有對民眾負責的政府，才可以避免官商勾結、避免企業侵害民眾利益的事頻頻發生與大舉發生。當然，健全的制度還需要廉政等等其他配套。但在一黨專政這種政治權力私有制下，就連民眾監督政府、政府監管企業的基礎也不具備。老百姓只能無語問天：我們吃甚麼？孩子吃甚麼？我們可以相信甚麼？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九日

神七中國和毒奶粉中國

神舟七號升空，引來一些炎黃子孫歡呼；毒奶粉蔓延到蛋糕等奶製品，另一些中國人只會流淚嘆息。

我們看到兩個中國。這裏不是指政治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因為後者在海峽兩岸無論官方民間，都已經極少用這個稱呼，大家都只稱之為台灣。

我們看到的兩個中國，一個是神舟七號的中國，一個是毒奶粉的中國；一個是舉世矚目的成功奧運的中國，一個是被奧運建設霸佔土地遭迫遷的原居民的中國，因奧運被驅逐的上訪村村民的

中國；一個是金銀銅牌選手的中國，一個是數以萬計在童年時就被培訓卻墊了底的運動員的中國；一個是有外形壯觀、設施完善的運動場的中國，一個是人民到處找不到運動場地的中國。

總理溫家寶說，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毒奶粉事件，信息公開，查處肇事者，立即把問題奶粉下架、銷毀；另一個中國的現實是：毒奶粉信息延誤了至少半年，中宣部指令內地媒體禁止繼續炒作事件，政府又阻止律師為三鹿奶粉受害者索償，而一些無辜奶農就成為替罪羊。

有人看到中國在四川震災中反應迅速、災民受到照顧；有人看到的中國是不允許報道是否有震前預警、是否大量學校都是豆腐渣工程，並且不容許追究責任。

有吃售價低廉的三鹿毒奶粉的中國，三鹿的市場主要在農村和低收入的城鎮；有吃進口奶粉的中國。

我們有時會懷疑，為甚麼會有人製造毒大米、毒醬油、毒腐竹、毒粉絲，這些東西值幾個錢？然而，有假冒偽劣的東西，必有市場。中國有廣大的窮人消

費群體，他們的收入決定了他們不得不去購買這些質差價廉的商品。在高官巨賈的美酒佳餚的筵席上，當然不會有這種劣質商品，在澳門賭桌一擲萬金與來香港瘋狂購物的大款，對貧窮中國的消費行為是視而不見、毫不動心的。

一個中國是朱門酒肉臭，另一個中國是路有凍死骨。正是貧窮中國勞動力提供的血汗工廠，為富裕中國帶來每年百分之十的增長，也為國家機器帶來每年百分之三十增長的稅收，因而可以斥巨資辦奧運、升神舟。

不錯，許多國家都有貧富不均的問題，但那些國家的「富」，是靠知識、能力、勤奮在機會平等的自由經濟體系中致富。而中國的「富」則建基於機會不平等，是通過與權力的「聯婚」、國企改制和圈地以致富，在製造富人的同時也製造了大批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因此，不是在一個國家的公平法治下的貧富不均，而是在權力私有制下產生的兩個中國。

一個中國的人擁有所有政治權力，另一個中國的廣大人民完全沒有政治權利。一個中國的人自打江山

以來就將政治權力據為己有，並私下等級授權，或憑關係攫取權力；另一個中國的人就處於無權的狀態，連基本人權也闕如。他們供養着掌握權力、金錢的那些人，本身就過着悲慘的生活。

為甚麼筆者要說這是「兩個中國」，而不說是一個中國裏的不同階層？因為在香港，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中國。有些人看到的，永遠是奧運、神七、年增長百分之十、高樓大廈的中國，他們為中國歡呼、為神七亢奮，他們永遠看不到或不願看到中國的另一面。而另一些人，包括筆者，我們只看到毒奶粉、愛滋村、豆腐渣工程、上訪村、為失地抗爭的農民。我們確是無視奧運、神七，因為那不是我們要關注的中國，那只不過是掌權者的面子工程或確立對外的強權地位，甚或只是自炫、自慰的中國。我們永遠記住的，是艾青的詩句：為甚麼我的眼裏常噙淚水，因為我愛這土地愛得深沉。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衣食不足無以知榮辱

毒奶粉事件爆發以來，香港輿論尤其是網民都紛紛責罵大陸人沒有道德：奶農沒道德，二道販子沒道德，製奶粉及奶製品的工廠沒道德，各級幹部沒道德。溫家寶總理在紐約談到毒奶粉時說，「一個企業家身上應該流着道德的血液」。他把毒奶粉事件的矛頭指向企業家的道德，而輕輕放過高層官員的責任，尤其是，有沒有因為舉辦京奧的政治考慮而封鎖（零八年）八月一日就已確知的毒奶粉消息。

過去，毒食品頻頻發生，筆者也曾經認定這是大陸人道德沉淪的問題。然

而，最近反覆思考，這真是道德問題嗎？又或者是，若這是道德問題，那麼整個社會的道德沉淪又是怎麼發生的？

道德問題最重要的門檻是「同理心」，也就是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孔子回答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生行之者乎？」的答案。當中國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先前說，對製奶粉企業進行專項檢查，百分之八十都是合格的，他不會想到，如果他的孫子所吃的奶粉，正是那百分之二十不合格企業所生產的佔市場百分之八十的產品，他會不會這麼說。又或者，如果胡錦濤、溫家寶或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孫子，是毒奶粉的受害者，他們會壓下公佈毒奶粉的消息嗎？這就是同理心。也許我們還會問：奶農、二道販子、奶粉生產商，他們是不是也沒有同理心了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最基本的道德門檻，是不是大陸絕大多數人都跨不進去？

《史記》引管仲的一句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道德也要在「衣食足」的社會條件下才能行之有效。大躍進後的饑荒時代，許多地方的農

村都有「人吃人」現象，在饑饉之中還講甚麼道德？

三鹿奶粉的售價低廉至十八元一包。它的銷售對象就是中國廣大的窮人消費群體。貴了就超出了這些群體的消費能力。奶農、二道販子、製造商，若不層層放點添加劑，會有這麼便宜的奶粉乎？即使有道德的奶農，賣出的是純牛奶，但被混進其他滲水的、滲尿素的牛奶中，再加上製造商的其他添加劑，生產出來的仍然是毒奶粉。而且，賣純牛奶夠成本嗎？奶農能生存嗎？不造假的二道販子有活路嗎？不行賄的製造工廠能立足嗎？不做假賬的企業，能在各種稅費多如牛毛的經營環境存活嗎？不按照潛規則辦事，樣樣都依足明規則的人、企業、政府、官員以至最高層的領導，有路可走嗎？

大陸改革三十年，奉行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經濟發展政策，而實際執行起來則是「效率優先，不顧公平」。社會的財富分配，一直向資本（與權力「聯婚」的企業主）與政府（不斷加大稅收）傾斜。中國社會遂陷入既發展又窮困的怪圈。社會消費也出現富人消費高檔產品與窮人消費低檔產品的兩極分

化。為迎合低收入者的消費需求，自然有生產者生產低檔產品以至偽劣產品。在成本壓力下，生產者無法顧到道德。而低收入者也只能食用這些不合格的甚至有毒產品，他們可以有別的選擇嗎？

國企改制與圈地，使社會貧富分化益趨嚴重。中國農業部長孫政披露，二零零七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已擴大到三點三三比一，而在一九八四年改革開放初期，城鄉收入比例只處於一點七一比一的低水平。被中國界定為農村人口的農民，則有將近八億人。

有廣大的低收入消費者，就有難以抑止的不道德生產商，就有與這些生產商相勾結的各地官員以至中央官員。國家富了，因此有每年投入上百億元的航天工業，也有了載人航天活動，而這是科技與國力都遠超中國的德、日、英、法都不會發展的。中國為神七歡呼，而供奉着這項國家榮譽的，則是數億食用低劣產品的窮人。他們無法分享國家榮譽，因為從根本上說，他們是衣食不足無以知榮辱的社會底層的一群。毒奶粉不是道德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和制度問題。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神七問天，百姓無語問蒼天

連續幾天因香港所有電視台都直播而不能不看的神七升空與返回的報道，電視螢幕的右下角都有一個「神七問天」的標誌。自稱建基於無神論的共黨國家將太空船命名為「神舟」已讓人奇怪，而「問天」這用語更讓人疑惑。「問天」令人想起屈原的名作《天問》。據王逸《楚辭章句》中說，天問就是問天，但「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天乃萬物之總名，亦是統理萬物之主宰，因此問天就是問自然問社會問萬事萬物。

屈原的《天問》也從問自然開始而問

社會萬物。從「天命反側，何罰何祐？」(天命從來反覆無常，何者受懲何者得祐？）一句之後，就涉及商周以後的歷史與人物，因此，問天的重點在於追問社會現象為甚麼會如此？

「神七問天」也讓我們從對大自然之問，回到社會之問。一位網友說，「老百姓不關心能否載人上太空，只想喝一口沒有毒的牛奶，這過份嗎？」在毒奶粉事態不斷擴大的時候，中國黨政領導人和全國的傳媒，包括香港的電子媒體都一頭栽進神七的亢奮中，「為祖國驕傲」。一直宣稱「以民為本」的掌權者，為甚麼會在毒奶粉向所有糖果業蔓延的時刻，能夠不「為祖國羞恥」，不為自己的失職失責羞恥，而反感驕傲，他們的心肺是甚麼做的？

受毒奶粉這個大新聞的遮蓋，香港媒體較少關注差不多同時發生的日本毒米事件。日本於零六年發現早前從中國進口的大米含有農藥成份甲胺磷，因而將這批大米限制為「非食用」的工業用途，然而大阪的三笠食品公司卻以食用米的價格賣給日本各地數百個商家，被製成啤酒、清酒和燒酒。事件被揭發後，儘

管衞生專家說，一個五十公斤的人要一天吃三公斤含有甲胺磷的米才可能對身體造成傷害，但日本農林水產省大臣太田誠一已為他屬下官員未盡監督職責而辭職，一名五十四歲向三笠公司購買毒米的商家不堪名譽受損而在家中懸樑自殺。

相對於毒奶粉的數萬兒童中毒患上腎石，日本的毒米事件未有一宗吃了毒米而損及健康的正式報告；相對於中國質檢總局給予三鹿奶粉以「免檢」稱號，日本的農林水產省早在零六年已給有關毒米標籤為「非食用」工業米；但相對於毒奶粉的監管官員李長江若不是撤他職務他還賴着不走，日本的農林水產省大臣卻主動辭職以謝罪。這兩個國家，哪一國的官員才真正向人民負責，才真正是「知恥近乎勇」，而哪一國的官員卻只是天天口頭講「以民為本」的無恥之徒？

毒奶粉不但蔓延全國，而且蔓延海外。讓香港市民深感不滿的是，為甚麼連印尼都驗出Mars、M&M'S和OREO朱古力含極高濃度的三聚氰胺，但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卻沒有驗出來？為甚麼印尼有關化驗報告在（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已發表，而本港食物安全中心

截至二十八日晚上仍只表示「會與印尼當局跟進」，未就本港同款食品需否停售、市民應否停吃作回應或指引？為甚麼早前食安中心公佈一些蒙牛、雀巢食品的三聚氰胺為「零含量」，而《蘋果日報》委託檢測中心化驗結果就含量超標？如果要報紙代政府作化驗，我們要這個政府做甚麼？這些問題，自稱要成為紐倫港的香港特區政府該如何回答？還是我們只好仿效神七去「問天」？

八九年六四後，香港樂隊達明一派有一首歌在當時非常流行，這首歌就叫做《天問》，筆者記得的幾句是：

「抑鬱於天空的火燄下／大地靜默無說話／風吹起紫色的煙和霞／百姓瑟縮在惶恐下……縱怨天／天不容問／嘆眾生／生不容問……」

快二十年了。天空升起了神七的火燄，百姓仍然瑟縮在惶恐下。他們問：我們可以吃甚麼？天不容問，生不容問。香港特區政府何以也淪落到對市民的食物安全反應超慢？這個天機也不容問，生不容問……。

二〇〇八年九月三十日

中國的希望何在？

（零八年）十月一日，曾特首在國慶酒會上說，零八年國家經歷了喜與悲，對所有中國人來說，實在是百感交集的一年。又說，從汶川地震、北京奧運，到神舟七號順利升空及返回，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堅韌的生命力，以及逆境自強、永不言敗的精神。

曾特首的講話，與早前溫家寶總理在北京國慶招待會的講話同調。溫總也說「二零零八年是我國發展過程中極不平凡的一年，中國不僅戰勝了罕見的低温雨雪冰凍災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災害」，

還舉辦京奧，完成神七航天飛行……。

曾特首與溫總一樣，都絕口不提正受國內外關注的毒奶粉問題，更不提人民心焦的究竟吃甚麼才安全這個特大問題。溫總講多難興邦，曾特講逆境自強，好像零八年有了「多難」，有了「逆境」，同時也有了京奧、神七這種「興邦」與「自強」，中國就走出困境，萬事大吉了。

實際上，多難興邦與逆境自強的要義，不在於既有「多難」與「逆境」，又有「興邦」與「自強」，而在於是否能從「多難」與「逆境」中吸取教訓，自我反省，改正錯誤，由此而帶來「興邦」與「自強」的行動。顯然，京奧的成功，神七的飛天，並非從雪災、地震中吸取教訓而來，而是不相干的行動。甚至可以說，「多難」、「逆境」，與「興邦」、「自強」等悲喜事態，都是基於同一個制度之下的產物。不是一黨專政、舉國體制，不會釀成汶川地震、毒奶粉事件這樣的大災難，同樣也不會具有成功辦奧、神七飛天的能力。

就在溫總在北京講戰勝汶川特大地震災害的同一天（九月二十九日），香港電台電視部播放《鏗鏘集》，

這是一個題為《是天災還是人禍？(上)》的專輯。這個專輯對汶川地震作了災後的深入採訪，就豆腐渣工程的校舍問題作探討，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當局不僅不是戰勝了汶川地震，而且是迴避以至壓制了地震所暴露出來的問題。

專輯提到，在地震中絕大部份的學校校舍，都在幾秒鐘之內瞬即全面倒塌，包括只興建了十多年的校舍，而校舍旁一幢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並於早前已宣佈為危樓的樓房卻在地震中屹立不倒。遇難學生家長劉玉婷悲憤地指出，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專輯提到，在地震後一個星期，中央和地方政府負責人都說，會徹查是否有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違規建築。但幾個月過去，沒有任何徹查的動靜。當地的黨書記說，要等中央統一調查的指令下來，才會去徹查。另方面，當局又用向每一個遇難家庭發放六萬元作利誘，要遇難學生家長簽名放棄追究鑑定校舍建築的責任，並阻止家長之間相互聯繫，公安更不允許家長們集體會商。

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好的專輯，筆者必須向製作這

個專輯的港台人員致敬。他們為災難者發聲，若要從「多難」的教訓中興邦，首先應從讓受難者發聲開始。可惜這只能由香港、而且是一個公營電台才可為受難者發聲。

如果多難、逆境與興邦、自強的行動，都來自一黨專政的絕對權力的話，那麼我們實在沒有為京奧、神七感到自豪的理由。相反，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的希望何在？

最近，前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劇作家沙葉新，在網絡上轉載了國內外網站關於三鹿奶粉的文章，並寫下按語，而題目就是《中國的希望何在》？按語說：「人們注視三鹿奶粉事件，其實就是注視在中國吃甚麼才是安全的大問題。除了為高層領導提供的特供食品之外，給我們老百姓下肚的食品有多少是安全無毒的呢？這個國家怎麼了？太怕人了！為甚麼說出來的話是那麼動人，作出來的事卻是那麼恐怖呢？這個制度還值得信任嗎？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這個文化是甚麼文化呀！三鹿奶粉不只是無知的奶農出了問題，不只是無良的奸商出了問題，不只是無道的貪

官出了問題，而是我們的制度出了問題，我們的民族出了問題，我們的文化出了問題，是我們的血脈、我們的根基出了問題！而且漸入膏肓，難以藥救！想想幾年前新疆大火的『領導先走』，想想山西煤窰連續礦難，想想四川地震無數校舍倒塌，想想上海最近公然黑箱判案，想想全國兒童都可能吸入腹中的有毒奶粉……誰的心不在顫抖？真是爛到根子上了……」

若說中國還有希望，希望就在於還有沙葉新這樣的知識分子，尤其他是屬於體制內的知識分子。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日

《海角七號》VS「神舟七號」

正當中國以神舟七號激發大陸、香港及海外部份華裔人士的民族主義亢奮之際，海峽的另一邊卻掀起了《海角七號》風潮。都是七號，一個遨遊太空，一個落腳於海角一隅，兩廂對比，令人感慨。

《海角七號》是台灣人拍的低成本電影，沒有大明星，沒有萬馬奔騰、盔甲如林的大場面，甚至宣傳費都很少，誰料憑着口耳相傳，卻在台灣創出了賣座奇迹。從（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映，到十月初，全台票房已破三億台幣（約七千一百八十五萬港幣）大關，破了

《色，戒》、《功夫》等鉅片的賣座紀錄。而且走勢仍然淩厲，觀眾往往要排隊好幾小時才買到票。在台灣，人們見面，常以「你看過《海角七號》沒有？」作問候語，電影的背景——屏東恆春更掀起實景觀光潮。

更妙的是，在網站上，網民發起了「拒絕下載，前進戲院，支持《海角七號》，支持國片」的行動，於是不見網絡有偷錄下載。

是怎樣的一部電影呢？筆者在香港暫時還看不到這影片。不過，從介紹中略知影片的情節，主要講幾個在不同角落生活的小人物，為了實現音樂夢想，而組成樂隊要在台灣南部的墾丁度假中心舉辦演唱，經過許多波折，特別是樂團主唱阿嘉，與日本來的活動公關友子之間由不斷衝突而發展出一段情。在實現上台表演的音樂夢想的日期越來越近時，又找到了一個郵包，上面是六十多年前未及寄出的一個日本男教師的情書，收信地址是日據時代的舊址：「恆春郡海角七號番地」，他們一邊忙於安排演出，一邊記掛着務必要把郵包送到主人手上……。

這是一個平凡的小人物追求夢想的故事。

《海角七號》如何能跟「神舟七號」相提並論呢？神七耗資數百億，海七只花了不到一千萬港元。神七遨遊太空，海七只是海角一隅的幾個人的故事。神七追求的是「祖國的榮譽」，寄託十三億人的期望，海七只是一些小人物追求微不足道的夢想。不過，神七欲以飛天來凝聚大陸人民對政權的認同，即使讓一些人亢奮一時，熱情過後卻會想着：能不能喝到一口沒有毒的牛奶？而海七呢？在電影中，展現了台灣土地、歷史、人民的多樣與包容；電影中有原住民、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有傳統月琴，也有搖滾吶喊；有不同國籍、種族、世代、次文化，而最後都在野玫瑰的歌聲中得到釋放與和解……。上述種種的多元與包容，正醞釀出台灣人民的認同感情。電影受歡迎，說明新台灣民族主義興起，而這種民族主義，並非來自政權的號召，並非基於對「舉國體制」炮製出來傲立寰宇的大項目、大工程的崇拜、嚮往，以自己置身其中成為一員而莫名地自豪，而是出自個人的生活感受，出自對自己的土地，那裏的風物、人情，對不同種族、文化之間的人與人的包容……。這種認同在人

們日常生活中自然流淌，既無政治色彩，恐怕也不是出於編導者本意，台灣各政黨甚至對海七所激發的本土認同還懵然不知。

台灣的電影業已沉寂多年。它一直被香港、荷李活的大製作壓得抬不起頭。現在冒出了一部《海角七號》，另一部本土電影《囧男孩》也賣座鼎盛。台灣似已找到立足本土的電影出路。台灣民間響起一片「支持《海角七號》，支持國片」的聲音，而這是自發的、沒有政治鼓動的聲音。

京奧、神七，要博取國際社會讚賞，反過來用國際肯定引發本國民族的亢奮。台灣的海七，從人性、本土、社會中尋求共同的追求夢想的價值。那一種認同更真實、更深入血脈？不言而喻。

大陸神七vs台灣海七，硬實力是九牛與一毛之比；軟實力呢，則恐怕憑藉集體意志的鋼鐵政權，比不過柔軟的人心。

二〇〇八年十月七日

特首施政卻不知何謂核心價值

相信香港許多市民，對社民連三位議員（零八年）十月十五日在立法會鬧場的興趣，比聽曾特首的施政報告為高。儘管筆者認為鬧場不可取，但一句「曾蔭權無能」卻道出了不少市民的心聲。

在施政報告中，曾特首自誇「憑着一生的公務員歷練，我對行政管理及執行都有一定把握」。但在報告中，他除了承認「今年政府落實擴大政治委任制度的安排，一度引起社會爭議」之外，對一年來「行政管理及執行」的種種錯失，卻無一字交代。這些錯失除副局政助的委任風波之外，其他讓人記得的，也是罄竹難書，包括處理外傭稅的混亂、控制油價、在迎

聖火活動中警方對展示標語者選擇性執法、對民間電台嘉賓的選擇性檢控、淫照風暴的「警」字兩個口、梁展文事件、毒奶粉處理的混亂和延慢、盧維思失職案法院更直指「特首失當」……。過去一年，曾特首自言「對行政管理及執行都有一定把握」，真是不知從何說起？他的民望持續走下，確實毫不足怪。施政報告中他說「強政以民意為本」，誰知甚麼時候他又「視民意如浮雲」呢？

冗長的施政報告，可說沒有甚麼新意。事實上，施政報告發表前的民調顯示，只有一成四市民對之有較高期望，而七成半的人則是期望「一般」及「低」。這說明不少市民對政府已到了「哀莫大於心死」階段。激進的社民連反映了部份市民的這種心態。

對施政報告，筆者只略談「結語」中的「核心價值」。

曾特首重複他在二零零七年《競選宣言》中「對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的看法」：「在全球化的衝擊下，香港面對經濟轉型，社會浮現各種意見和利益的矛盾關係，我認為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關係，香港才能踏上新台階，走向新時代。」

這算是甚麼「核心價值」？處理矛盾關係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所謂核心價值不是說要不要處理各種關

係，而是說要用甚麼價值觀念去處理。

曾特首說的處理辦法，是「發展與環境保育要取得平衡」、「行政與立法要相輔相成」、「權利與義務要有適當平衡」……。這些話如同一些學者分析問題時說：「一方面這樣，另方面那樣」。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針對On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的模稜兩可議論說：「給我一個獨臂經濟學家吧。」因為這是沒有主見的面面俱圓說詞。

曾特首多次提到「相輔相成」：「行政與立法相輔相成」，「愛國與民主不單並存，而且相輔相成」。

中國傳統文化，除相輔相成之外，更重的是相反相成。相反相成是指兩個對立的事物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促成。梁啟超曾寫《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一文，指「獨立與合群」、「自由與制裁」、「自信與虛心」、「利己與愛他」、「破壞與成立」就是十種相反相成的德性。

行政與立法，不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而是相反相成的關係。選舉產生的立法會，代表民意對行政機關起監督作用，《基本法》規定：立法會由選舉產生；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會負責。一個立法，一個守法；一個民選產生，一個對這民意機關負責。彼此是

處於相反、對立地位。但惟其如此，才能「相成」一個既有執行力又不違民意的體制。

愛國與民主，只有「國」是民主之國，才可以說處於相輔相成的地位。但倘若「國」不是民主之國，那麼愛國與民主就處於相反相成的地位。你若堅持民主，愛國就不會盲目愛非民主政權，而會力促國家向民主方向發展；你若堅持愛非民主之國家政權，就會參與扼殺或閹割民主。

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是面面俱圓、干預與自由平衡，而是以機會平等讓所有市民能盡展所長。機會平等，建立在法治、自由、民主的基礎上。曾特首說，「市場不是萬能，干預不一定是萬惡」，雖不算錯，卻沒有反映香港的核心價值。核心價值的原則是自由而不是干預，干預只是不得已為之，幾十年行之有效的「積極不干預」才是香港自由經濟的核心。

曾特首沒有清晰的理念，不知何謂核心價值，只想在種種矛盾中左右逢源，既迎合中央又迎合輿情，又要不違《基本法》，實難取得平衡。沒有基本價值觀的特首，能帶領香港市民迎接新挑戰嗎？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六日

對手強反對派也強，對手爛反對派也爛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多次提到美國的開國先賢，並以美國國父華盛頓的一段話作結尾。

在就職演說中提到美國開國先賢的，奧巴馬不是第一人。許多總統在當選時、就職時都提到，甚至競選總統的落敗者，也會在他們的演說中提到美國先賢。而且，先賢不是國父華盛頓一人，而是包括撰寫《獨立宣言》的傑弗遜、亞當斯、麥迪遜、富蘭克林、潘恩等一批人。他們不但制訂憲法，確立了美國人民有自由、民主、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且他們留下的許多名言也一再被

世人傳誦，成為施政、治國與堅持自由民主制度的格言。比如傑弗遜所說的：「我寧可自由太多而忍受由之帶來的麻煩，也不願自由太少。」就是一句任何人應該謹記的話，尤其是，作為一個掌握權力的人，說這樣的話更難能可貴。

為甚麼十八世紀下半葉，美國會冒出這樣一批智者能人呢？為甚麼他們的語言與行為都充滿智慧並且不會戀棧權力而知所進退呢？是美國的運氣？是偶然因素讓他們的言行成為後來者的典範？

春節期間，筆者曾與政治學者翁松燃教授談過這問題。他給了一個很好的答案。他說，因為獨立戰爭的對手是英國人，而英國的政治哲學已走前一步，有了傑出人物如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貝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等人。尤其是洛克，他主張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同意，並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社會契約才會成立，如果缺乏了這種同意，那麼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權利。

洛克的理論不僅影響了美國開國元勛們，更反映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上。

美國獨立戰爭的對手，是受洛克的政治哲學薰陶的英國人。開國元勛們必須在理念上、認知上高於對手，或至少能以對手之矛攻對手之盾，才能贏得戰爭。光靠武力而不能在理念上擊倒對手是不能贏得勝利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道理上的角力，不能只作為宣傳的手段，而應是深入骨髓的信念與認知，並身體力行，以及發展成為一整套的實行共和體制的理論。

對手強，所以你也要強。這是翁教授的道理。筆者補充說，那麼對手爛，反對派也會爛了。為甚麼民進黨當權那麼不爭氣、那麼讓我們失望呢？因為它是靠反對國民黨起家的。

共產黨在大陸奪取政權時，也大力鼓吹自由、民主、多黨制等等，並在道理上壓倒了當時一黨專政的國民黨。然而，中共當時的主張，是作為一種宣傳手段來運用的，並非真正相信並要貫徹這種理念。而中共與國民黨鬥爭時，學會的是「比狐狸更狡猾」，是

「以革命的兩手來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因此在奪取政權後，狡猾、兩手、不講真話，就一脈相承了。這是對手爛，反對派也競爛的另一例證。

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或法輪功，他們在內地抗爭時當然都是真誠的。然而當在海外建立起反共陣地，要不是忙於內鬥，就是使出「比狐狸更狡猾」的謊言手段，對中共劣政的揭露和自己宣傳的功效往往誇大其詞，以致鬧出中共有幾千萬黨員退黨的笑話。何以致之，因為他們的對手夠爛之故也。

「有怎樣的執政黨就有怎樣的反對黨」，「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這些說法或過甚其詞，但其中的道理實在是值得不甘於馴服的人民和反對派深思的。反對派不能為反對而反對，而必須站在更高的理念與道德高地上，才可以跳出與對手比爛的命運。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一日

以欺騙手段搶獸首是更大國恥

中華搶救海外文物專項基金的收藏顧問蔡銘超，以假競投、拒付款等同開空頭支票的方式，去「阻斷流失文物的拍賣」，大大發揚了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精神。被基金副總幹事牛憲鋒稱之為「一個令人欽佩的中國人」的蔡某說，「我是代表了所有中國人這樣做」，而政協發言人趙啟正說，拍賣事件教育了世人，包括法國人。

中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僅教育自己人民，還「教育世人」，讓人們知道：中國是一個不講誠信、以欺騙和蓄意破壞舉世公認的買賣程序為榮的民族。

蔡銘超自稱「代表了所有中國人」，但誰給了他這個代表的權利？儘管政協發言人對他的行為予以正面的回應，但無論政協或人大或中國政府都沒有被「所有中國人」授權。從報章讀者留言網上可以看到，大多數留言都以蔡某的做法為恥。如果要筆者在做一個正直的人與做一個中國人之間作選擇，筆者（相信許多讀者也一樣）寧可不做中國人。然而，誰賦予你們這種要我們作選擇的權力的？

圓明園的獸首是國寶嗎？稍有藝術鑑賞品味的人，都認為形象呆板，不具藝術性。此其一。水力鐘的十二生肖獸首，當年是洋人設計以媚惑中國帝王的玩物，既沒有中國藝術家或中國工匠的心思，也不是中國的傳統工藝。此其二。獸首只有兩百年歷史，還攀不上古董價值。此其三。

唯一挑動中國人民族主義情懷的，是火燒圓明園這段「國恥」。燒了園又搶去東西，成為中國民族恥辱的印記。但不能因為被搶走了，就視之為國寶。獸首代表的是一段國恥，把國恥搶走不是很好嗎？即使真要取回，也應以光明正大方式，或通過外交途徑交

涉，或通過正常渠道交易。而現在用的是欺騙、破壞的方式去阻止買賣，並沒有雪了國恥，倘若欺騙行為「代表了所有中國人」，那無疑更增加國恥。

要說對中國文物的破壞，中國人比八國聯軍、英法聯軍超越千倍。報章留言網頁就有讀者列出了四十五項對文物的大型破壞，其中包括炎帝陵、倉頡墓、舜帝陵在內。為建三峽水庫，許多古迹、文物遭淹埋。盜賣出國的文物更是不計其數。筆者曾在美國加州一個小鎮的私人藏品展中，看到一些戰國時代的完好並精緻的銅器。中共建政後，尤其是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大量文物在「關係人士」核准下盜運出國，才是中國最大的國恥。

要說國恥，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中俄外長關於國界東段的互換協定，以俄國交還中國半個黑瞎子島（相當六分一個香港），交換中國承認清朝時被俄國強佔的一百四十四萬平方公里土地（約相當於一千三百個香港），是近年最大的國恥；（零九年）二月中旬俄羅斯擊沉中國貨船新星號，而俄艦見死不救導致八人失蹤，中國政府對此事輕輕放過，則是最新的國恥。

國家是人民、土地、主權這三大元素組成的。對人民死活不顧，對失去的土地以協定正式承認，對關係人民、土地的事低調處理，甚至對中俄互換協定只選擇性報道交還半個黑瞎子島，你會覺得這是一個主權國家嗎？另方面為轉移視線，大肆為幾個獸首張揚，以此來掀動國民的民族情緒，更不惜以假競投的欺騙手段去激發仇外聲浪，這是不是較火燒圓明園大許多倍的國恥？

更痛心的是：對欺騙行為的肯定和讚揚，所付代價是全國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誠信都會蕩然無存。

二〇〇九年三月四日

國強民弱，中國的悲哀

中國外滙存底居全球首位，中國因體制原因受金融海嘯衝擊最小而領導人對走出經濟困境最具信心，中國是美國最大債主而是否繼續買美國國債也舉世關注，中國領導人近期出訪都擺出國際「大款」姿態指點國際金融運作，大手買外國產品及向落後國家提供援助。中國GDP連年保持百分之十以上增長，今年(零九年)「保八」看來也志在必得。據稱北京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已臻發達國家水平。經濟影響外交，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顯得舉足輕重。中國又是「崛起」，又是「盛世」，中國不少人為國家而感驕

傲，但中國公民自己呢？

持中國護照的人士，到世上任何地方都最肯花錢，應該受歡迎才是。然而，世上沒有任何國家，給中國護照持有者免簽證待遇（除了持外交護照的中國官員在部份國家可以免簽）。許多國家在給予中國公民簽證上都諸多刁難，即使是經濟上遠比中國落後的國家。

目前，香港特區護照已在一百三十七個國家或地區享有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與台灣有正式邦交的國家只二十個左右，但卻有六十多個國家予以台灣護照持有人免簽待遇，新近英國給了台灣免簽證，歐盟其他國家也在評估中考慮跟隨。

中國國家的國際地位似乎越來越高，但持中國護照國民的國際地位則居世界的倒數第二（第一是北韓）。香港雖說是回歸，但香港人都不願當一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中國公民，因為持這種護照，在世界各地都得不到尊重。相反，中國內地人士，卻千方百計要取得香港居民身份，以便可持香港護照旅遊世界各地。台灣人談到「統一」問題時，提到在世界各

地，當中國人是否會比當台灣人更獲尊重？

中國護照持有者申請其他國家的入境簽證，都手續繁複，各類擔保、邀請、證明、回程機票一樣不能少，一些國家甚至要求不出機場的中國過境旅客也要辦理過境簽證，像是堵截恐怖分子一般。

獲得簽證的中國公民，在外國的機場、移民局、海關，常被懷疑是持假證件的非法移民遭扣查，縱使放行也備受詰問威脅。

有人說，外國對中國護照持有人歧視，是因為中國是窮國，人口眾多，如果放鬆簽證，很多中國人會滯留國外成為非法移民。但中國不是已經崛起，已經有錢了嗎？而且，許多人均GDP比中國低的窮國公民，出國並沒有受到同樣的限制與歧視。比如日本政府對中國公民發簽證極為嚴格，但對接受中國援助的巴基斯坦的公民卻相對寬鬆。中國人口佔世界發展中國家約四分一，但其他四分三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受到這麼嚴格限制，而且其他發展中國家至少在本區域內旅行是免簽證的，比如東盟國家或非洲國家。但中國公民去任何一個區域的任何國家都要簽證。

也有人說，中國公民到其他國家要簽證，可能是因為其他國家去中國也需簽證，是一種對應的政策。但世界上並沒有這種對應政策。任何國家的人去澳洲都要簽證，但持澳洲護照的人去許多國家都免簽證。香港人去美國要簽證，但美國人來香港卻免簽證。

其實歧視中國護照持有者，不僅是外國使領館，而且還包括中國使領館。中國駐外使領館人員，對持中國護照華人，都另眼相看，將這些人視為沒有本事撈到外國籍的次等人。持中國護照的華人，把中國使領館形容為「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的衙門。

中國富起來了，崛起了，國家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國家領導人在外國領袖面前威風了，但中國公民在國際社會卻是不被尊重而且受盡歧視的族群。

國強民弱的嚴重落差，歸根究柢的原因是：國家不是屬於人民的，人民沒有權選舉掌權者，而各級的掌權者包括駐外的使領館官員，都把中國老百姓視為「算個屁」的「屁民」。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一日

是第二個權力中心還是太上皇？

中共喉舌《文匯報》零九年三月十一日報道，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政協工作報告中強調，「支持港澳委員在香港、澳門社會政治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據了解，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今早（三月十日）透露，特區政府與中聯辦已就港區政協委員可發揮的功能及角色達成十點協議，其中包括港區政協委員可就香港內部發生的問題發表意見，制訂工作機制，設立活動場所，而特區政府則可向中央推薦港區政協委員的名單等。有與會政協委員要求把有關協議白紙黑字寫下來，以作憑證，黎桂康予以允

諾。」

泛民議員質疑中聯辦與港府的協議有違《基本法》中列明管治香港屬特區政府責任，政府不應在香港為人大及政協設立第二個權力中心。對此，港府發言人及黎桂康本人，都立即否認有相關協議，不過港府與黎桂康都承認不時就港區政協委員的作用進行溝通，毋須要定甚麼「協議」。

黎桂康有沒有在政協閉門會議說過「協議」，有不少港區政協委員可以作證。不過，有沒有「協議」，又或者只是口頭協議，都無關宏旨。白紙黑字的是政協主席賈慶林的話，要港澳委員在港澳社會政治事務中發揮作用，以及港府與中聯辦均表示對港區政協的作用「不時溝通」，而溝通正是中聯辦藉港區人大、政協對香港社會政治事務的介入，是「第二個權力中心」還是港府的「太上皇」，就彼此心照了。

《基本法》第廿二條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人大、政協，甚至中聯辦，都屬「中央所屬各部門」，因此，按《基本

法》是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但現在中共當局與中聯辦甚至香港特區政府，恐怕都只是口頭講《基本法》，而實際上已把《基本法》拋到九霄雲外了。自中央高調介入屬香港自行決定的零七年選舉方式之後，不少港區人大、政協都以得到中央的意向而對香港社會「發揮作用」。比如零七年特區政府提出《政制發展綠皮書》，明明列出了二零一二年雙普選是其中一個選項，但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卻以中央代言人的口氣公然說，二零一二年不可能有普選，相信中央稍後會明確表態。現時行政會議成員，不乏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他們在香港社會政治事務中「發揮作用」還不夠嗎？早前盛傳劉皇發以讓出立會議席給葉國謙而換取進入行政會議的交易，豈非空穴來風？

因此，「協議」確實不需要了。黎桂康說，特區政府可向中央推薦港區政協委員的名單，這句話可視為中央給予特區政府的「恩典」；至於中央向特區政府推薦行政會議成員、各司局級官員、副局長、政治助理的名單則早已不在話下。

按《基本法》規定，人大、政協這些兩制中另一

制的中央機構，不應在香港社會政治中發揮作用，現在由賈慶林公開宣示，要「發揮作用」了。至於人大、政協按規定就內地事務議政建言的角色，則不但發揮不了作用，而且若建言不合黨意的話，還會被封殺。比如去年（零八年）全國政協委員汪明荃在政協提議發回鄉證給全體立法會議員，這意見不但遭封殺，而且按職權不應干涉內地事務的曾特首，還出言教訓汪明荃要「多做事少說話」。對內地「積極議政建言」，行不得也。

因此，原來港區人大、政協之設，不是要他們在國家事務中發揮作用，而是實行潛規則，要他們違反《基本法》在香港事務中發揮作用。這等於是將按中共黨意產生代表、委員的這種體制，強加在香港自治範圍內並起主導作用。《基本法》、「一國兩制」將名存實亡矣。

美國前總統布殊，在任時許多政績都受到批評，不過，他有一句話卻極為精到，他曾說：「香港的未來，取決於中國大陸靠近香港的速度，而不是香港靠近大陸的速度。」

大陸有識之士支持這說法。去年台灣大選後，大陸「天益網」一篇貼文說：「中國的前途不是讓（港、澳、台）這些制度和文化上的異數為內地傳統基因所同化，而恰恰在於如何讓這些地方上的制度和文化逐漸影響內陸各地以至中央；我們顯然更樂於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

可惜事實與他「樂於看到」的相反，香港已漸漸成為山西。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八日

不知是政協們的幸福，還是香港的不幸

全國政協田北俊表示，對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和特區政府否認雙方存在「十點協議」，感到「好奇怪」，因為他當日在北京是親身聽到黎桂康講「十點協議」的。他如此坦言，難怪他在去年（零八年）立會選舉中，不被中方支持而落敗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說，真理部迫一個人承認2+3=4，這個人在刑求下只好這麼說，但結果還是不對，因為真理部這時已改為2+3=6了。在專權政治下，一個人只有放棄自己的獨立判斷，才能過真理部這個關。相比之下，特區政府自然識趣得多了。

黎桂康、特區政府，以及說政協參與香港事務是「理所當然」的李剛，其實都只是根據政協主席賈慶林的講話辦事。賈在本月（零九年三月）三日的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完善發揮港澳委員作用的工作機制，支持港澳委員在香港、澳門社會政治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

因此，按賈的意思，並非僅僅如李剛所說，「港區人大、政協作為香港一分子，參與香港事務是理所當然」這樣的事了。你我都是香港一分子，都可以參與香港事務，但港區政協要以凌駕「兩制」之上的「一國」的地位，在香港設立「工作機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其實，即使港區人大、政協以個人身份就香港事務表達意見，份量也與香港一個普通市民不一樣。過去歷次釋法和為廿三條立法時，一眾人大、政協出來講話，所引起反響之大，的確起了動員香港市民上街的作用。鄔人大、徐政協、馬人大相繼離世，曾人大又退位，中共固然少了些火爆支持撐一國壓兩制的聲音，卻也少了些從反面教育民眾要維護自己權益的力量。

話說十點共識，原來還引起港區人大不滿，質疑若消息屬實，為甚麼厚政協而薄人大，何以港區人大不獲相同對待。

理由其實很容易明白，因為港區人大雖屬小圈子「選舉」產生，但好歹還是「選舉」。不管怎麼控制選舉團，仍會跑出一些中共不怎麼喜歡又或不大聽話的人。比如以前的李鵬飛，中共就難控制他講2+3=4或6的話。但政協就完全不同了。政協委員全部由中共委任，絕大多數政協委員都只是旨在享受政協這種虛榮，又或者可以利用這虛名拓展自己的經濟利益。所謂「議政建言」，恐怕這四個字在他們腦子裏根本沒有出現過。而實際上，看全國政協在北京兩會上的種種不痛不癢甚至迹近荒謬的提案（比如「以女性精神應對經濟危機」、「穿國服刺激經濟增長」、「以雷鋒精神申請世界遺產」），就知道許多政協都是在中共專權政治下甘當佞臣角色。有不少政協更是旨在取得頭銜，對參加兩會毫無興趣。今年（零九年）全國政協有三百零一人缺席，而港區政協缺席率更高達百分之四十四，一百二十六名港區政協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只有六十七人出席，而缺席的五十九人中，廿一人沒有請假。另小道消息盛傳，大陸買官的風氣也吹襲到政協了，港區政協一位從事拉皮條行業的人，也拉起政治皮條，在做這種推薦政協委員的買賣。

據筆者所知，社會上不少知名人士，都拒絕擔任政協。如果政協中有經營黃賭毒或有黑社會背景的，靠走私起家的，賣假商標而有犯罪紀錄的，擁護文革並參與六七年暴動的……，那麼怪不得「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則士之所以不至也」。

去年，內地一網站有一個「中國七大惡心」的貼文，其中一個「惡心」是「可憐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協」，貼文說：「每年的三月份，這一對苦菜花都要開放一次。」人大「代表是誰選出來的？怎麼選出來的？代表誰？」「政協就更讓人不知道幹甚麼了，看着一群老得連自己姓甚麼都想不起來的人在參政議政，不知道是委員們的幸福，還是國家的不幸。」

今年全國政協的經典場面，是一個地方上的政協主席，被問到「怎麼看待官員的財產公示制度」，他的回答竟是，「如果（官員的財產）要公佈，為甚麼不公佈老百姓財產？那些企業老闆的利潤為甚麼不向工人公佈？」

套用大陸網站貼文的話：若要在香港設立政協參與香港政事的工作機制，不知道是政協委員們的幸福，還是香港的不幸？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驚世真言：把掌權者關在籠裏

民主不是萬能的。儘管不少辯護士為香港和大陸不實現普選而說這樣的話，但支持民主的筆者今天也這樣說，是因為看了電影《驚世真言》(*Frost/Nixon*) 而產生的感慨。

民主如果單指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那確實不夠完美。民主還應該有其他配套。

儘管美國有兩百多年的民選傳統，因「水門事件」而辭職的尼克遜總統，在下台三年後被訪問者問到：「你是否認為總統有權做出違法的事情？」時，他居然宣稱：「只要總統做得出，就不是違法。」

阿克頓勛爵說：「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是至理名言。全民選舉產生的美國總統，一旦掌握了這個至高權力，竟也有「總統做甚麼事都不違法」的「腐化」意念。

民主制度絕不是完美的制度，只不過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所能找到的相對不壞的制度。民主制度一路走來都跌跌撞撞，三十多年前的「水門事件」，就是在跌撞中的一大教訓。「水門事件」以一九七四年尼克遜辭職而落幕。但尼克遜不肯公開道歉，繼位者福特又赦免了對他的起訴，因此事件未有一個公道的結論。直到三年後，大衛霍斯對尼克遜作訪問。起先，尼克遜還只是承認犯了嚴重錯誤，而不肯承認違法，而且還強調他做了許多有功於國的事。然而，霍斯找出一些證據，證明尼克遜在水門竊聽之前，已知道有這回事，而事後又刻意掩蓋自己的罪責。他問尼克遜，他是否應向人民道歉，他如果認罪道歉，是否會使他的餘生過得較為心安。尼克遜找不到遁詞，他終於說了：「我辜負他們，辜負了朋友，辜負了國家，更糟的是，我辜負了國家體制，以及那些心懷夢想要從政的年輕人。是啊，我辜負美國人民。我將背負這個

包袱，度過餘生。」

他說出這段話，使水門事件有了評價，使民主體制在跌跌撞撞中跨前一步，使美國人民對國家體制與從政恢復了信心。不錯，繼任總統赦免了他，他不須面對司法審判，國會放過了他，政敵也因為他辭職而不為已甚，然而，還有媒體，媒體要滿足人民的意願，經過三年，媒體終於在一次訪問中，讓尼克遜認罪道歉。

「水門事件」與尼克遜，給全世界掌握權力者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權力必須被約制。即使憑選票而上台，若不對權力作自我約制，在民主政制下只會身敗名裂，許多例子都證明了這一點。最新的例子無疑就是陳水扁。

美國前總統布殊，曾在捷克這個從極權體制走出來的國家發表演講，以下是其中一段話：「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掌權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他又

提到這個籠子四周，插着五根欄杆，那就是：選票、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和三權分立。

今年（零九年）布殊卸任時，又在告別演辭中重複了這個觀點。

中國古語有一句相似的話：苛政猛於虎。沒有圍欄約制的掌權者，就等於沒有被關在籠子裏的猛虎，到處噬人。掌權者當然不想要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民選的立法機關、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這些欄杆，去妨礙他們任意施為，當然想只要是他們做的，就都「不是違法」。

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沒有普選，言論自由與人民的其他自由、獨立司法、民選的立法機關就都只是做做樣子，是虛假的。至於曾因民主宗主國保障而有良好管治根基的香港，回歸後因沒有普選的保護，已有的根基也漸受消磨，公務員、立法權、言論自由，都大不如前。香港這一制不斷向一國那一制傾斜。

回歸後特別是近年的弊政，實在都是欄杆漸漸消蝕的惡果。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禁得了仆街，禁不了福佳

今天是（零九年）四月一日，愚人節。繼內地網民推出《草泥馬之歌》後，資深傳媒人淩滄洲在愚人節前有新貢獻，就是推出一個新物種——猴蛇。猴蛇也如草泥馬一樣，取的是諧音，用普通話來講，就是「喉舌」。淩滄洲建議，四月一日愚人節可命名為「中國猴蛇節」（中國喉舌節）。

他的建議理據是：鑑於中共建政六十年從不報道中國人過愚人節；鑑於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成功完成所有傳媒的官方喉舌化，民間傳媒已是六十年前的歷史；鑑於每年兩會期間都有代

表、委員就年節假期問題作些無聊提案；鑑於從今天起，中國所有出版社將全部實行「書號網上實名申領」(以便官方更有效控制出版物)……這些中國的喉舌特色，使作者覺得應該要有一個「中國猴蛇節」了。而喉舌之愚人，也適合把「中國猴蛇節」定於西方愚人節的四月一日。

這是繼草泥馬之後的又一個大陸稱為「惡搞」，香港稱為「玩嘢」的網民創作。而這個創作的特點，是針對刺激種種惡搞的源頭——喉舌。正因為官方控制了所有傳媒，官方每天以種種愚人的新聞報道，充滿謊言的對政治社會問題的話語權，加上在傳媒和網站對所有敏感詞彙的封殺，使老百姓積怨、積憤得不到發洩，於是變花樣玩諧音，草泥馬之大為流行，現又有以猴蛇來諧音喉舌，直攻中共官方其喉與其舌也。玩諧音發洩，香港可謂領先潮流。零七年的《福佳始終有你》，以「福佳」諧音「仆街」，對回歸後種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及無能人士亂噏力拼，加以冷嘲熱諷。第一版《福佳始終有你》，靈感來自香港官方慶祝回歸十周年主題曲《始終有你》，《福佳》上傳

YouTube，三個月內收看人次達八十一萬，而官方版《始終有你》，兩個月才有二萬人收聽；《福佳》第二版《煲呔搵工靠你》，三星期共有二十八萬人次瀏覽；第三版《福佳，We Have Money !》則改編自北京奧運倒數一周年歌曲《We Are Ready》。官方曲歌功頌德，讓人悶煞兼氣煞，導致《福佳》大受歡迎。

最近，立法會議員的粗言穢語引起社會議論紛紛。不少人指摘立法會不去正正經經議事，而去就粗言穢語問題互耍花槍，實是浪費公帑，也不符市民期望。但問題是，立法會過去除了對政府的提案通過如儀之外，有作過多少建設性的議事論事？曾有民選議員的提案在不合理的點票規則中通過嗎？對四川撥款的二十億又加四十億，這些香港市民的血汗錢究竟有多少落在災民身上？又有多少進入貪官的口袋？市民對政府和立法會，早已滿街粗話了。

四川省領導人在兩會期間，否認震災倒塌的學校是豆腐渣工程；對學生死亡人數與名單至今不查究、不公佈；四川地震災民與三鹿奶粉的索償案至今沒有一宗被法院受理。全國喉舌更是對所有這些消息予以

大封殺。

如果你處身在大陸這樣的社會，尤其是身為有寃無路訴，甚或訴寃反而更被寃而吃盡苦頭的受害者，你在呼救無門的情況下，難道不會喊一句「草泥馬」嗎？

老舍小説《我這一輩子》寫一生循規蹈矩的老巡警，被寃進監牢，他氣得大罵：「我操你媽的祖奶奶。」中共建政後拍成電影，石揮演此角色照樣粗口出街。我小時看電影聽到這粗話，只覺解恨，不覺耳朵被污染。

所謂粗言穢語，如果是指正常社會中有些人講話總要夾帶性器官，正人君子覺不雅，想移風易俗予以匡正也是應有之義。但在一個扭曲的社會，在政府處事總讓人氣憤，官員表現總是滑頭、迴避問題、領高薪不負責、鏡頭前皮笑肉不笑，這時人們説粗口恐怕就不是出於不良意識，而純粹只是一種發洩與解恨吧了。你禁得了粗話，卻禁不了諧音粗話，禁了「仆街」，禁不了「福佳」。當政者還是自我檢討一下，為甚麼政府與官員的民望評分一路趨下，為甚麼會被人罵「福佳」，才是正途。

二〇〇九年四月一日

諂媚過度敗事有餘的知識人

北京大學教授孫東東指上訪者有精神病的言論，引起的民憤越鬧越大。接連幾天有數百民眾在北大門前聚集抗議，要求與孫及北大校長見面，並要他們就孫的言論作解釋。大批公安驅散示威民眾，帶走部份人士。基於北京每年有數百萬來自各地的上訪者，而全國各省市每年上訪民眾估計達二千萬，因此，訪民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含冤積怨的群體，一旦聚眾抗爭，將釀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事件讓人感慨的是，北京大學，這個上世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的發祥地，蔡元培、魯迅、胡適、傅斯年、羅家倫、李大釗、陳獨秀等重量級知識分子都曾在此為自由民主發聲，如今竟墮落到成為一個維護掌權者的保守營壘，成為民眾抗議的對象。回想五四運動時，校長蔡元培力保遊行學生，自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挺身為民主向掌權的北洋政府扛起所有責任；而今天，北大校長在示威民眾面前，竟躲在軍警保護背後，做縮頭烏龜。專權政治對知識人的腐蝕，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孫東東不是普通教授，他身兼國家衛生部專家委員、司法精神病學專家。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訪問時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户，我負責任地說，不說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一類」，「只要政府批准，精神病院收強制醫療的病人，這是沒有問題的」，又說，「我們把他（們）關起來治療，就是保障他（們）的人權」。

作為衛生部專家委員，衛生部以他的建議為據，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上訪者，都可以用精神病為藉

口，把他們關進精神病院。孫的這種說法，又豈能不引起訪民強烈反彈呢？

中國數以千萬計的上訪民眾，已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之一。為甚麼上訪的規模如此之大、人數如此之多，根本原因是有冤情的民眾得不到司法保護，又沒有獨立輿論為他們發聲。二千萬的上訪大軍是體制腐敗造成的，體制腐敗表現在沒有三權分立的憲政架構，司法受到非司法的政治權力壟斷者掣肘，人大之類的所謂的「人民代表」只是掌權者的應聲蟲，官方操控的媒體更不會為含冤的民眾說話。總的根源就是一黨專政。因此，每年千千萬萬的各地冤民到省市信訪部以至到北京「告狀」，就成為中國歷朝歷代所沒有的曠世奇觀。

老上訪們是否有理，還是精神有毛病？二零零三年，國家信訪局局長周占順在接受《半月談》訪問時，公開承認上訪者「百分之八十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既然上訪者有道理，他們的問題應予解決，為甚麼又不解決呢？原因是國家信訪局的權力有限，只能把問題轉交各地處理，而各地

諸侯的權力層官官相衞、官商相衞，就使上訪者的問題鮮有獲得解決。因此，上訪者到北京告御狀，各地掌權者派人截訪、毆打，上訪者若掙扎到得以面見信訪局人員，問題會由信訪局交回各地，也仍然沒有解決。腐敗體制就是這樣進行着惡性循環。

孫東東向當局獻毒計，除激怒訪民、引起騷動外，也進一步暴露了在專權政治下，知識人依附權力已到了何等無恥的田地。他們為了向掌權者諂媚，竟說出連當權官員都說不出的混賬話。這些諂媚過度的專家學者，對政權來說，其實是引發騷動破壞和諧敗事有餘。去年（零八年）震災時《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余秋雨，歡呼死難災民「縱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就都是這一類人。香港這類人也多的是。出現這些人，應是絕對權力之下的自然產物。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一日

中國的朋友與敵人

八九年六四後，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到北京，他對鄧小平說了一句極具智慧的話：「以前反對你們的，是你們的敵人；現在反對你們的，很多都是你們的朋友。」

據說鄧小平聽了此語，沉吟了一陣。後來，鄧提出了因應世局的二十八字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善於守拙，絕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二十八字的重點，在「韜光養晦」四字，意思是隱藏自己的光芒，把自己放在一個不顯眼的位置，基本上與保持低

調的意思相同。

八九年後，中國就以這樣的低調，忍受國外的抵制、杯葛，不作激烈與憤怒的反應，慢慢謀求重建國際關係。

中國政治文化中，有兩句話是交替應驗、屢試不爽的，一句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另一句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韜光養晦，可說是面對全球的抵制杯葛，乃有見棺流淚的低調反應。接着，中國在全球化趨向中，找到了世界工廠的地位，經濟起飛了。尤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高於國民經濟增長（據統計，一九九六至二零零七年這十二年，GDP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三點零二，國家財政收入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九點二七），顯示國民財富向政府加速集中。中國的外滙存底與擁有的美國債券，都居世界第一。又因為金融管制而使中國受金融海嘯的影響較小，於是在國際上也頻頻要擺點身段啦。

「不見棺材不流淚」的韜光養晦時代過去了，是不是「得志便猖狂」的時代來臨了呢？習近平副主席在拉美講的「三不」（意味着中國是有條件給外國「折

騰」的)，已露出了端倪。而背後的支持力量，則有去年(零八年)中國憤青的民族主義鼓譟，以及將憤青的情緒予以合理化和理論化的書本《中國不高興》在今年(零九年)三月推出。

這本書在香港出了繁體字本。只是原書封面副標題：「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不見了。

《中國不高興》全書充滿了無知、自大、偏激、煽情。以「高興」作書名，就點明了是以情緒化而不是理性化立論。幾個作者高興不高興當然是他們的自由，但扯上「中國」，那麼若不是包含了「人民、土地、主權」這個關於國家的三元素，至少是指體現主權的中國政府了。

「大時代、大目標」講的不是「內憂」，而是「外患」。而所謂「外患」，則是指「西方人的自以為是」，是西方世界(其實主要是民間與人權組織)針對中國去年的西藏事件、傳聖火、毒奶粉等的批評抵制，作者們提出要中國旗幟鮮明地去懲罰報復。提出中國要「領導世界」，要做「英雄國家」，提倡「尚武精神」，要「持劍經商」，只差沒有提議中國要出兵征服世界了。

《中國不高興》是對外國人不高興。但對中國隱瞞地震預報造成數萬人死亡，卻沒有不高興，對四川豆腐渣校舍在地震中造成大量學生死亡沒有不高興，對中國貧富懸殊擴大、貧困戶增加沒有不高興，對中國軍警鎮壓為自己權益而抗爭的村民沒有不高興，對中國的黑獄酷刑沒有不高興，對無數人因付不起醫療費致死沒有不高興，對毒奶粉與數之不盡的有毒偽劣食品損害人民健康也沒有不高興，倒是國外有人對這些事關注一下，中國就不高興了。若這幾個人可代表中國，那麼中國又是甚麼國家？

中國無疑政府是有錢了，有錢就會財大氣粗，「得志便猖狂」，但大多數老百姓還窮得很。外國領導人基於本國利益，對有錢政府的領導人固然給足了面子，但對中國老百姓去這些國家的入境簽證還是嚴加控制。中國的政治並沒有改變，仍是尼克遜二十年前訪華時的狀況。不過，也許可以稍為把那兩句話改一下：今天，巴結中國的，不是中國的朋友；而批評中國的，卻不見得是中國的敵人。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五日

開放討論，是解決六四難題第一步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此語出自《史記》，意思是眾多唯唯諾諾的人，不如一名獨持異見的諍諫之士可貴。

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在港大六四論壇上，可說是獨持異見了，但他選擇的不是對當權者諍諫的意見，而是迎合當權者而與香港主流民意相反的對六四的意見。於是當場被同學所噓，亦被現場講者叫他「收聲」。事件越鬧越大，港大學生啟動了罷免陳一諤會長的機制。

目前在香港和海外，幾乎所有三十

多歲以上的人，二十年前（八九年）都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每天被來自天安門廣場的電視報道扣動心弦，我們流淚，我們上街，我們呼喊，我們心如刀割，從來沒有過這麼長的時段讓我們對時事產生如此深的感情反應。這種真實的感受主導了香港人對六四的觀察與評價，形成了六四情意結。雖然不少人因政治利益而後來轉了態，但他們心中都知道六四是怎麼一回事。因此，陳一諤的異見遂令大多數香港人感到刺耳難忍，現場講者與網民對他幾乎一面倒地怒罵。

然而，陳一諤也同馬力的「坦克碌豬」一樣，從反面再喚起港人對六四的激情，尤其是漸趨冷漠的大學生。此外，我們還要問：陳的這種意見，能不能在內地媒體或官辦的論壇上發表呢？恐怕不可能。因為六四事件從中共官員到官方媒體，是一個字都不能提的禁忌。從指六四是「有組織的暴亂」到「動亂」到「風波」到「事件」，到恨不得全世界把這事忘掉，是中共自感理虧的轉態。如果陳一諤能把他說官方處理六四只是「有啲問題」、學生領袖是「走佬領袖」這類意見，帶到內地的學生論壇上，即使可能贏得掌聲支

持，但肯定不會是官方願意看到的事。

陳一諤事件，讓我們看到對六四的兩個極端對立的觀點，一是絕口不提或將學運污名化，另一則是要求平反六四。兩種對立觀點以前不會公開交鋒，但也各不相讓，看不到妥協餘地，也看不到這難題可以如何解決。

六四已經二十年了。時間多少會沖淡記憶，更重要的是：年輕新一代，沒有經歷過從八九民運到六四屠城的日日夜夜，他們只從家長、老師口中知道六四經過，又或是自己在YouTube上看到六四片段畫面，或讀過有關記述。即使有認識，也缺乏切身感受。

我們不能否認，年輕新一代，不可能有老一輩的六四情意結。他們很可能從不同資訊中、從一些歪理解說中，得到錯誤印象或觀點。內地生，在當局的意識灌輸和利益誘惑之下，就有更多人與多數港人看法相左了。我們不應該無根據地指控陳一諤或支持他的人，背後有甚麼政治背景，正如我們反對中共當局指八九學運背後有甚麼外國勢力一樣。我們應對六四持開放討論的態度，本着真理越辯越明、真相終會被

認知的信念，與持異見的本地生與內地生討論，而不是互罵。我們更應鼓勵陳一諤和支持他的本地生、內地生，將有關六四的討論帶到內地，帶到能在內地有限度發行的香港左報的論壇。據説，一位內地生，對六四論壇中有同學被噓離場，感到受侮辱，他認為這種對異議不能容忍的行為也是一種暴力。他們這種看法，值得香港支持平反六四的人士關注。

中國名記者戴晴，早前提出解決六四的道路是「和解」。「和解」是中性的，是首先排除對立的。所謂和解，是不設結論，而在公平法律的基礎上，先對六四的每一過程、每一個受害人、每一個參與者進行調查，然後作分析、鑑定、解決。這雖屬中性建議，卻是中共難以接受的難題。於是，戴晴認為，她活着看到「和解」的機會很小了。也許開放討論，是朝向解決難題走出的第一步。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八日

《基本法》大，還是鄧小平大？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剛從文革噩夢中蘇醒，幹部和輿論提出了究竟是「黨大」還是「法大」的社會大討論。時任人大委員長的彭真，面對記者提出這問題時，曾說「我也搞不清楚」，但後來他澄清了：「黨領導人民制訂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己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

黨是領導人民還是代替人民去制訂並執行憲法、法律呢？當然就說不清楚了。不過，至少當時老黨員幹部們經歷文革的無法無天時代，經歷毛與四人幫無視憲法而任意妄為的時代，還多少有

意識要把黨的活動範圍限制在法之內。現在，經過二十多年特權勢力的蔓延滋長，從法院拒絕受理四川災民和毒奶案受害者索賠，到數之不盡的黨主導司法審判案件，黨的活動範圍早已超越法律啦。

香港回歸後，國際社會與香港人均認為，對香港這一制的最大保障是《基本法》，但近年來，《基本法》大還是中共黨大，或更具體地說，《基本法》大還是鄧小平大，這問題已由專權政治的「一國」不斷衝擊「兩制」的香港矣。

去年（零八年）七月，中國副主席習近平訪問香港，在特區管治班子包括大法官、律政司司長和立法會主席面前，說特區管治班子，「要精誠合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香港輿論聞之譁然。因為《基本法》所定，是一個「三權分立」的體制，無論《中英聯合聲明》或《基本法》，更強調「獨立的司法權」。若沒有獨立司法權，香港回歸後已立即淪為「一國一制」了。

不過，鄧小平生前，卻多次表示反對「三權分立」。一九八七年他說「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優越性，就是凡是一件事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

執行，不受牽扯。……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權鼎立。」同年他會見香港草委時說，「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當然，《基本法》並沒有體現鄧的「不搞三權分立」的觀念。但如果中共認為鄧小平比《基本法》大，那麼香港的獨立司法權就守不住了。

最近引起政圈和輿論關注的曹二寶的文章，又抬出鄧小平的話來壓《基本法》，引述鄧說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如果中央把甚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於是，曹二寶就認為，在香港「必須有一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而成為香港的另一個「管治力量」。

曹二寶的根據是鄧小平講話，而不是《基本法》。因為《基本法》已規定除了國防與外交之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並列明中央各部與各省市都不得插手香港事務。

《基本法》大，還是鄧小平大？若香港厲行法治，那麼當然《基本法》大，「兩支管治力量」的說法，就無法成立。若鄧小平大，那麼不僅人大多次釋法、粗

暴干預香港終審法院裁決、建立一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幹部的隊伍」淩駕於香港特區政府之上，這些說法與做法都可以成立。三權分立、獨立司法，也都可以丟在一邊了。

抬出鄧的那一段話，也要看「黨的需要」。一九八四年鄧說，「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特區政府派出幹部……我們派軍隊……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又說，「要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現在，曹二寶說要派出幹部在香港作為另一支管治力量，不是表示鄧的話「不算數」嗎？不是「不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嗎？鄧這些話就不提了。

《基本法》大，香港就仍是法治社會；鄧小平大，那就變成人治社會啦。至於鄧小平哪一句話大，則看中共黨的需要。

這是目前香港面對黎桂康「十點協議」和曹二寶文章君臨下的政治形勢，也是特區政府在法治與人治間徘徊的考驗。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五四」九十周年，「德」「賽」今非昔比

今天（零九年五月四日）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回顧九十年來中華民族的步履，比對九十年前和現今中國在「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方面的進展，中國人是應該感到興奮、欣慰，還是羞愧？

「五四」高揚「民主」與「科學」兩個重要的現代價值。近日讀到一篇對學者金觀濤的訪問，他說民主的基礎是人權。「五四」提出這兩個現代價值，是劃時代的，「其重要性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份」。

且讓我們審視一下這兩個現代社會

核心價值在中國的貫徹。民主，不僅是實踐上踟躕蹣跚，而且理念上也在過去九十年一直被曲解與質疑，但科學就一直受到無異議地尊崇。那麼我們就先從科學說起。

比較九十年前，許多人一定認為中國的科學已有長足進步。尤其是近年「神七」升天，航母下海，中國經濟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加上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科學觀念在中國應被全民普遍肯定，沒有甚麼異議了吧。

但甚麼是科學？科學最重要的是求「真」。所謂真、善、美，科學追求真，宗教追求善，文學藝術追求美。在中國，求真的科學觀念是否已普遍建立，還是相反？假貨滿天滿地，假事充斥社會，假話更習以為常。中國大陸這個舉國俱假的社會，與科學的求真精神不但背道而馳，而且比九十年前更形缺乏。

愛因斯坦曾說過，不管我們的科學有多大成就也只能說某個東西是如此如此的，不能夠說應當如此或不應當如此。「是如此」就是求真，屬科學精神；「應當如此」就是求善，屬宗教範疇（也可以是邪教，成為

求惡）。中國的政治領袖，儘管總在提倡科學，卻總是愛指導社會應當如何如何，而不是說某個東西是如此如此。在政治領袖缺乏科學精神的指點之下，中國社會遂蛻變成充斥「應當如何如何」的造假社會。

至於中國民主與人權的現況，我們或可以與「五四運動」時比較一下，是民主人權多了呢，還是少了呢？

九十年前，北京學生為反對巴黎和會的喪權辱國，打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要求政府「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貨幣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遊行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燒了曹宅。隨後，軍警逮捕了三十二人，運動在全國各省市擴大，政府最多逮捕了八百餘人，未見學生被殺害。最終，北洋軍閥政府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請辭，而中國代表也沒有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這樣的事，如果發生在今天，會有這樣的結果嗎？二十年前（八九年）六四事件，學生沒有燒房子、

毆官員，政府卻出動軍隊進行大規模屠殺，被捕判刑者不計其數。有輿論壓力嗎？所有媒體都操縱在掌權政黨手裏，中國今天的「萬馬齊瘖」的局面，恐怕是九十年前的學生無法想像的；他們怎會料到經他們如此熱情地呼喊民主，九十年後竟會倒退到如此地步呢？

二零零五年，中國與俄國簽新協定，把清朝時被俄國強佔的一百四十四萬平方公里土地，確定永為俄國領土。中國領土之斷送，較諸九十年前日本要強佔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何者更甚？但中國媒體對這新協定全無報道，中國學生對這事也毫無反應。今昔對比，我們豈能不為中國社會越來越變得沉默，中國人民包括學生、知識人的暫時做穩了奴隸的心態越來越深化，而感慨繫之？

九十年了，已有了好幾代人的交替，讀一下九十年前的歷史，比對一下今天的現實，置身在仍有自由的香港，你若良知未泯，是否還要為反民主反科學的專權政治加持？你是否應為「六四」發聲？想一想吧。

二〇〇九年五月四日

對領袖無情，是偉大民族的標誌

二零零二年，BBC舉行一個「最偉大的一百名英國人」的調查，結果是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獲選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

這位反對綏靖政策，領導英國堅決與德國納粹決戰到底並贏得勝利的「最偉大的英國人」，戰後卻立即被英國選民拋棄了，由於工黨提出福利國家的目標對戰後一貧如洗的英國社會有吸引力，導致保守黨慘敗。一九四五年七月邱吉爾卸下首相職務，他後來引用古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的話說：「對政治領袖無情，是偉大民族的標誌。」這句話因邱

吉爾引用而成為傳世名言。

最近，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談六四，他說「中央肯定是錯的」；並說，在六四事件中，鄧小平是下令軍隊開槍的人，也是要負責的人。但他說，如果講死人，文革比六四不知多幾多倍。需要負上責任的毛澤東，他的肖像仍懸掛在天安門，他的思想仍寫在黨章、憲法之內。「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導還是敵人？如果你否定他，好多中國現在行緊的嘢都要否定。」同樣，如果平反六四，會不會「郁鄧小平」？「會郁到何地步」？中國會怎麼走？他說，「最關注中國是否能夠走一條繼續改革開放，越來越開明、進步的道路。」

倘若曾鈺成關於對毛鄧不能否定的看法，是反映內地主流意見的話，那麼對比邱吉爾關於偉大民族的說法，我們也許不得不產生一個可悲的結論：中國民族不但與偉大民族無緣，甚至可稱之為渺小、劣敗的民族。

首先，且不說偉大民族了，一個正常民族，都會正視自己的歷史。倘若為了一個人的聲譽，而不能面對歷史作符合事實的評價，這民族還有希望嗎？曾鈺成說，中央的六四鎮壓「肯定是錯的」。事實上，中共從指八九民運是「暴亂」，到說是「風波」，到現在絕口

不提，當然也是對六四的錯誤做法，心中有數，只是因鄧小平這神主牌而不能正視事實。十三億中國人的多數，似乎也聽之任之。

其次，對人的評價與對事的評價，應予分開。中共對毛的評價是一回事，但不影響對文革評價為「一場浩劫」。鄧的改革開放之路走對了，也不等於六四下令鎮壓的事也是對的，更不等於中央對六四的定性不應平反。

其三，毛澤東縱使對中共建政有功，但建政後的反右、大躍進尤其是文革，則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災難，為甚麼他的像還掛在天安門？鄧小平縱使改革開放有功，但為甚麼不能提他「肯定做錯」的事？為甚麼平反六四就會影響中國走改革開放的路？邱吉爾在戰時立下赫赫功勛，為甚麼戰爭剛結束，英國人民就對他如此無情？

答案是：主要原因不是英國民族比中國民族優秀，而是英國的民主制度使人民有權。有權的人民才可以對政治人物無情，有權的人民才能夠自己選擇掌政者，才能夠按照現實需要而不是揹着歷史包袱去投票選出領導人。而中國人民則長期處於無權狀態，現

在的所謂「崛起」，也正如魯迅闡釋「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一樣，說穿了就是老百姓永遠交互處於兩個狀態之下：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無論哪一個時代，領袖都是強加在奴隸身上的統治者。國家施政不是按人民的要求，而是按領袖的喜惡與思維方向。因此，對領袖犯錯的批評就會動搖他的地位，他的施政路線也可能受影響而變更。

當然，「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做慣了奴隸的中國民族，沒有強烈爭取民主政治權利，是無法成為偉大民族的原因。若曾鈺成真的希望中國「越來越開明、進步」，恐怕還須鼓勵仍有自由的香港人去認識六四，討論六四。張文光議員提出動議修訂，要政府將六四事件加入中學中史課程綱要內，令中學生可以了解這段歷史，確實是應該支持的動議。

我們不希望下一代中國人，仍交替生活在魯迅所說的兩個不幸時代裏，我們希望中國民族有一天成為偉大民族。因此，下一代的民主薪傳至為重要。

二〇〇九年五月六日

非愛國主義，乃國家主義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他的意思是：歷史是由當代掌權者去詮釋的。歷史真相難以呈現。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更說得露骨：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

以控制過去並控制將來詮釋歷史，中共藉由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推動新一波愛國主義教育。（零九年）五月二日，胡錦濤為「五四」定調，說「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內容」。接着，在九

常委全部出席的「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大會上，主管宣傳的李長春更進一步說，「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把愛國主義作為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就是「弘揚五四精神」了。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也寫了篇紀念五四的文章，緊跟中共黨意，提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五四精神』」。文章說，「在香港，由於歷史的原因，人的眼界和胸懷都難免受到限制，習慣從香港的視角去看中國，用香港的尺度去量度神州大地事物，這難免偏頗，失去準繩。」

稍稍涉獵一下五四歷史的人，都知道，五四精神正是由一批曾留學外國或從外國論著中了解民主、人權、科學之可貴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中國辦刊物引進西方啟蒙思想而發祥的。中共創始者陳獨秀，在一九一五年創辦《新青年》，就舉起「民主」、「科學」兩面旗幟，猛然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提倡新文化。若當年的五四先行者不是以境外的視角去看中國，以外國的尺度去量度神州大地事物，會有五四運動與新文化嗎？甚至會有毛澤東所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

響，為我們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嗎？

在中共扭曲五四精神的詮釋下，今年（零九年）五四後幾天，全國出現了些怪現象。據博訊新聞網記者了解到，從北到南，不完全的統計，竟有超過六十起因寫紀念五四文章、或者小範圍聚會而遭到警察偵訊、驅趕、單位批評（甚至威脅要開除），而這些只是記者通過網絡和熟人聯繫到的微不足道的情況。

九十年前的五四，是青年學生呼喚民主、科學、自由、人權的運動，而九十年後紀念這個運動的掌權者，卻壓制人民申述這個運動初衷的文章與活動，豈非咄咄怪事？

據聞在五四紀念日到來前，中共宣傳部門沒有給各大網站及媒體下封口令，結果很多知識人和青年寫文章紀念五四，而探索的五四精神主要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其後中共為五四精神定調為愛國、愛黨之後，中宣部才急急下令各大媒體（包括網絡）拿下不符合定調的紀念文章。可是，很多文章已經出籠了，於是出現各地黨委清查五四文章、聚會的怪事。

九十年前的五四固然有反帝、愛國意識，但絕不

愛當時的政府。現在把五四的「愛國」剽竊為愛現政府，遂帶來對闡揚五四真義（民主、自由）的壓制。

內地一網文提到：五四運動的一個嚴重不足，恰恰是將人從家族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同時，使人更徹底地依附國家。他們以為國家得救了，卻忘記救亡國家的最終目的應該是人，是對人的救亡。而犧牲人來挽救國家的結果就是：「當竊國者宣佈國家得救了的時候，在這個國家生存的人，卻淪陷了。」五四時「覺醒」的部份有力人士，「從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導到以國家主義壓制個人自由的邪道，從學習英美文明正道引向『以俄為師』的岔路。」今天的愛國主義，實際上是國家主義。所謂國家主義，就是要所有國民放棄自我，服從國家至上的信念。

筆者前文的題目是：《對領袖無情，是偉大民族的標誌》。有網友在留言上寫：「對人民無情，是『偉大』領袖的標誌」。盛哉斯言。前者是愛國主義，後者是國家主義。

二〇〇九年五月九日

不要綁架整體香港人與你一起見利忘義

曾特首在立法會的六四言論，引致泛民議員集體退席抗議。他會後在曾鈺成辦公室與智囊研究一個多小時，再次走出來會見記者，說了以下一番話：

「我剛才在議會説我的意見代表香港人整體意見，的確用詞是有問題的，這並非我心裏面所講的意思。我絕對無意認為我的意見能夠代表所有香港人意見。如有人對我剛才的發言有誤解的話，我願意為此致歉。」

這段話説出來，使筆者頓時如墮五里霧中，真是「你不解釋我倒明白，你越解釋我越糊塗了」。

聽了曾蔭權在立會就六四的發言，儘管筆者不同意，但他的意思倒是很明白的，實在聽不出有用錯詞語的問題。無論他重複說「香港人整體」也好，或說「香港一般人（即排除要求平反六四的另類人）」也好，他指的都是他的意見代表香港人的絕大多數。現在他說這些話並非他「心裏面的意思」，那就是說他心裏面另有想法。然而，所有人都只能從一個人說出來的話去理解，不可能從他「心裏的意思」去理解。若有誤解，也只能是對他講出來的話有所誤解，而不可能對他「心裏的意思」有所誤解。因為沒有一個人是他肚子裏的蛔蟲。

如果說，「有人誤解」是指對他「絕對無意認為我的意見能夠代表所有香港人意見」的誤解的話，這誤解也不存在。因為曾特首並沒有說過他的意見代表「所有香港人的意見」。「整體香港人」、「一般香港人」所指的是香港人作為一個「整體」，是香港人的絕大多數，不可能有人誤解為「每一個香港人」。

曾特首說，如有人對他「心裏面所講的意思」有誤解，他願意道歉。這是非常奇怪的思維邏輯。他的

話使筆者懷疑，他的心智是不是不大正常？若由一個心智不正常的人當香港的特首，恐怕會比他為諂媚中央而說的六四言論更可怕。

曾蔭權說，他明白香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又說「香港人的意見亦會影響他的意見」，但多數香港人的意見就是六四以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嗎？曾蔭權究竟有沒有看過每年維園六四夜萬點燭光的壯觀景象？有沒有讀過每次香港民調機構所作的六四民意調查？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每年五月底均就六四事件做民調，近年支持平反六四的港人平均都有五成至五成多，數字較回歸初期增加，反對的約有兩成多。調查亦顯示，平均超過六成受訪者認為，北京以武力鎮壓民運學生的做法有錯，認為沒錯的只有一成多。

由於國家經濟發展，香港也得到利益，因而認為可以忘掉六四、忘掉斑斑血痕，不求還歷史公道，這種見利忘義的識時務聰明人的取向，曾特首要自我作賤是他閣下的事，且不要把「整體香港人」、「一般香港人」賠上去一起作賤。香港政商界某些名人，或從

中國六四後掌權者的恩寵中得到些政治、經濟利益，他們要出賣良知是他家的事，絕大部份香港人憑自己本事與努力謀生，也憑自己的認知去發聲，我們從不巴望從掌權者手上得到甚麼好處，而即使中國的經濟發展給香港帶來一些商機，絕大多數香港人也不會去舔中共掌權者的屁股。

當然，在所有權力都來源自中央的情況下，你要曾特首公開講平反六四，也是強他所難。但如果真的是所講的跟心中所想的不一樣的話，他也可以講得委婉一些，比如他可以說，「我的想法和看法，和大多數香港人一樣，但基於我所處的地位，實在不便多談。」相信議員和市民都會諒解的。即使他像董建華說的要人們「放下六四包袱」，也比他現在綁架整體香港人與他一起見利忘義好些。我們終於清楚認識到，「曾精仔」比「老懵董」更不如。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六日

奴才拍錯馬屁，六四再掀熱潮

六四話題，再掀熱潮。據一位書店中人說，有關六四書籍，多達二十本。記協的《人民不會忘記》再版發行，資深新聞工作者陳潤芝的《六四二〇》出版，屬香港人的記述與訪談。較早出版的孔捷生的《血路一九八九》，是作者個人的六四歷程。最轟動的，無疑是趙紫陽的《國家囚徒》(中文版書名為《改革歷程》)，反映六四時的高層鬥爭。而六四的最完整記錄則屬張萬舒著新書：《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

張萬舒在八九六四期間，擔任官方權威新聞機構新華總社的國內新聞部主

任，直接負責及處理內地記者採寫有關八九六四的第一手新聞，並有機會透過新華社社長穆青了解中共高層動向。在《歷史的大爆炸》這本書中，他翔實地記下從胡耀邦病逝至六四大鎮壓、大逮捕、大清洗的全過程，全書四十餘萬字，寫得客觀、真實、詳盡，作者是報道文學作家，故文字也具可讀性。

這是六四的全程真相。作者已退休，現居北京，二十年後他將他的記述拿到香港出版，他說：「這就是我們日日夜夜記錄在案的歷史事實，任何人任何時候也篡改不了。」

中老年人對六四認識源於記憶。而年輕一代會不會忘掉六四，則要靠歷史記錄。基於「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掌權者的扭曲，筆者對「人民會不會忘記」從來不那麼樂觀。但悲觀並不影響我們對人生的堅持。儒家傳統有「義」與「命」的分立觀念。「義」指是非對錯，「命」指成敗得失。指導人的言語行為，應是「義」的堅持，若一切都以成敗得失去計量，那就會是非不分、善惡不辨、真假混淆，陷入「見利忘義」的人生了。

六四的真相很清楚。沒有經歷過二十年前的日日夜夜的年輕人，也可以從上述書本中了解到詳細經過。中共各級領導幹部其實也很清楚，基於六四鎮壓的主事人和既得利益者仍有人在生，並對中國政治有很大影響力，所以現時各級領導人對六四問題完全迴避。但另一方面，由於現在的主政者並非直接參與鎮壓，因此對一些書稿在境外（香港亦屬境外）出版也採不聞不問態度。零五年中共隆重紀念胡耀邦誕生九十周年（不是百年才要紀念嗎？），有人認為是對六四問題間接退讓與輕微改正，因為胡耀邦之逝，正正就是八九民運的導因。

平反六四，不是指人民心中的六四，不是指包括新華社高層領導張萬舒所認識的六四，人民心中的六四是非分明，毋須平反。平反六四是要求中共當權者尊重事實，給六四一個公正的評價，希望由此而使中國政治向民主改革邁開一步。而目前中共當權者的對策是不跟你爭，只是避而不談。

然而，皇帝不急太監急，偏偏有許多香港的小太監們，錯解上意，不斷為中共的六四鎮壓辯護。先是

有馬力的「坦克碌豬」論，後有陳一諤的「有啲問題」與學生「走佬」論、曾鈺成的「毛鄧不可否定」論。稍聰明的，早前有曾憲梓的「向前看」論、董建華的「放下包袱」論、范徐麗泰的「相信國家自有安排」論，還有「一國兩制井水不犯河水」論。而最新及讓人惡心的，就是指「六四後導致國家經濟發展，取得驕人成就，香港也得到好處」的「精仔攞着數」論。這說法不但賦予六四鎮壓的正當性，更擺明樂於享用鮮血供奉的盛宴。

這說法顛覆了儒家的仁義為先的觀念，還要綁架「整體香港人」去分享這人肉盛宴，它肯定會動員更多香港人參與六四燭光集會。這會是中共領導人樂意見到的情況嗎？

主子要淡化，奴才卻要挑起熱潮。拍錯馬屁為主子添煩添亂的奴才，真為你悲哀。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非理性主義的政治數學

近代理性主義認為人類須掌握數學原則，才能推理出其他知識。因此理性主義的標誌之一，是數量化。也就是說，對任何事情作出判斷，都以數量為依據。比如民主政治，數量化就是數人頭。不經過數人頭的普選，你說你代表全國人民，那就不是理性主義。愛國，不是理性的，因為「愛」無法數量化，「愛」往往是盲目的，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愛」屬感性，非理性範疇；但忠於憲法與法律，則是理性的，因為憲法與法律的第幾條第幾條是數字，有明文規定的具體指涉。

任何災難發生，死多少人傷多少人，是最重要的處事依據。這就是數量化。飛機失事，全部死亡與只有幾個人死亡，死者中有沒有本國人，都是數量，是所有政府、救援人員處事與救難規模的依據，這就是理性主義。

喬治•奧威爾小説《一九八四》中極權國家「大洋國」的「真理部」，強迫人民説2＋3＝4，但當受刑人説等於4時，又錯了，因為這時「真理部」已將之改為2＋3＝6矣。這是極權政治衝擊理性主義的典型。

最近在網頁讀到一篇文章，講「中國的政治數學」，大意是説，因奉行「政治掛帥」，所以政治介入到數學之中，就使數學為政治服務了。凡是有利於政權穩定的，就用加法甚至乘法；凡是有損執政黨形象的，就用減法甚至除法。比如GDP，經濟增長速度、外滙儲備等等，國家統計局與宣傳部都是能加就加，能乘就乘；至於災難死亡人數、毒奶受害兒童人數等，就能減就減，能除就除。

西方的二戰陣亡士兵人數、日本、德國的二戰陣亡人數、美國越戰陣亡人數，甚至因戰禍而非正常死

亡的人民的人數，都早已計算出來；但中國，歷次戰爭的死亡人數，還是講不清楚。中共建政後，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多少人寃死，一直沒有統計；大饑荒餓死多少人？也是最近由民間學者楊繼繩經逐省逐縣地調查，才在《墓碑》一書披露餓死三千六百萬。

六四經過二十年了，當時的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先說大學生死了二十三人，於是有人封他綽號為「袁廿三」；後陳希同向人大常委報告說大學生死了三十六人；再後來楊尚昆私下透露死亡總數是六百多人。幾百人的死亡，早應該有名單公佈，沒有道理二十年都交不出一個準確數字，而名單則要「天安門母親」們去逐個搜尋。

汶川地震已一年，遇難學生人數是越說越少，最新的數字是四川教育廳廳長涂文濤說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人，數字準確到了個位數，難道還有假？但藝術家艾未未公佈的有名有姓的遇難學生名單，竟比官方數字多出近百分之五十。

中共公佈的所有數字，都是政治數學發的功。在政治數學的指引下，你不可能相信官方的任何數字，

也不能巴望中國會有「數目字管理」。

「數目字管理」是已故著名歷史學家、《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在他去世前三年（一九九七年）接受筆者訪問時提出的詞語。他認為中國必須進入數目字管理，才能真正走向現代的理性管理。他舉例說，「人與人關係，不能進行數目字管理，那麼同一個等級，地位就不同。一個團長跟另一個團長，地位是不同的；下面三個營長，地位也不同。在美國，進行數目字管理，像機器一樣，任何職務都標準化，一個軍官調到哪裏都一樣。但在中國，被調動就會有危險。」

因為在中國，數字是政治數字；而人，也不是平等的，人的地位、份量可無限大也可無限小的。鄧小平死了，還能淩駕香港《基本法》去發功。而地震遇難者呢？也許前蘇聯獨裁者史太林的一句話最能體現政治數學視生民如草芥的最高境界，他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就只是數字。」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黃雀行動寫下香港歷史光榮一頁

臨近六四二十周年，當年營救內地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曝光，擔任前線總指揮的「六哥」陳達鉦在香港出席公開論壇，並披露黃雀行動的幕後人物有岑建勳、鄧光榮、梅艷芳，居間聯絡的還有高世昌。儘管梅艷芳已逝世，鄧光榮否認「參與」，又說「不講這些事」，但當年付出的勇氣與承擔，關心中國民主前途的人士是不會忘記的，歷史也必將寫下這屬於整體香港人的光榮一頁。

這也許就是近來被香港幾個誣衊八九民運、刻意為六四屠殺辯護的跳樑小丑所指的「外力介入」了。但這「外

力」是甚麼？陳達鉦說沒有外國政治勢力，沒有美國中情局。這外力就是支聯會。而支聯會是八九民運風起雲湧時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組織，當中包括左中右團體。香港數百萬市民的熱心捐助，是支聯會的經費來源；一百五十萬市民上街聲援民運、抗議屠城，是促成黃雀行動的精神力量；數百萬市民每日在電視機前，邊看民運進展和鎮壓慘劇邊流淚，這股靈魂的呼應，讓有能力參與救援的人士感到義不容辭。「外力」就是數百萬香港人，包括新華社、《文匯報》、《大公報》和所有中資機構的人。

根據陳達鉦零七年接受海外《多維月刊》的談話，參與和協助救援民運人士的，還有中共黨政軍各部門不願執行大逮捕、大清洗的有良心的人。孔捷生早前的文章透露，載着他的高速快艇上，有六七名中國現役軍人或武警。陳潤芝在《六四二〇》一書中，引述「六哥」的話，說他的弟弟「七哥」偷運民運人士時，公路上遇到軍人查車，把車門打開看到滿車都是戴眼鏡的年輕人，「七哥」正擔心「這次玩完」時，怎知軍人說：「沒事了，走吧。」

這些「外力」為甚麼要「介入」？因為螢幕所見，軍隊殺人已近瘋狂。逃亡的知識分子嚴家祺說：「從八九年六月四日早上開始，五日和六日那幾天，中國情況混亂，政府抓到和民主運動有關的人，就要殺掉。政府狂捕濫殺，有人當時被就地處決。我們都怕被抓，不逃不行。」因此，當一個個民運人士被傳出已脫難時，香港人在淚流滿面的壓抑中，也算舒了一口氣。黃雀行動擔負着香港數百萬市民的期望，所做的不僅是拯救了一批人，對香港人也是一次心靈救贖。黃雀行動體現了整體香港人的意志。整體香港人不是曾特首嘴裏的見利忘義之徒。

八九民運中，學生領袖「有錯」嗎？有「不負責任」嗎？縱使有，也不是問題的焦點。手無寸鐵的學生再錯，也不是用坦克機槍去捕殺他們的理由。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今年（零九年）二月到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他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譴責了以色列對迦薩的軍事行動，演辭中最動人話語是：「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邊。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

麼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那邊。」

高牆，是掌握一切暴力機器的權力體制，雞蛋，就是被他們壓碎、射殺的平民。「我們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理應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以卵擊石，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黃雀行動，是當年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靈魂彼此融合，所產生的溫暖」。村上春樹說：「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是。」當然，有的人投靠體制，已放棄自己獨立的靈魂。但這些人至少可以選擇沉默吧，何必扭曲自己良知，將所有的受害者再殺害一次呢？

二〇〇九年五月三十日

香港人孤獨地延續六四記憶

（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六四遊行，有破紀錄的八千人參加。這不是值得高興的事。明天（六月四日）六四燭光集會，不管有多少人參加，也不是值得高興的事。因為環顧世界，只有香港人在孤獨地紀念六四，在追悼六四，在為枉死者而泣，在為受難者禱告，在要求中國當權者為六四翻案，並期望以此為起點，讓中國向政治改革邁步，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

曾為六四事件而反對她丈夫克林頓在天安門接受官方歡迎儀式的希拉莉，到北京訪問不提中國人權問題了。曾在

天安門拉起橫額的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最近訪北京不提六四了。仍在北京訪問的美國財長蓋特納恐已忘記中國有人權問題了。我們可以期望奧巴馬會對中國說甚麼呢？每年六四都發表文章或談話的台灣馬英九，去年（零八年）當選總統後六四不再提「血腥鎮壓」，據稱明天他會有專文發表，我們能對他有甚麼期待呢？

人民不會忘記？中國大陸的人民真的不會忘記？他們記得三反、五反、大饑荒、文革嗎？中國人是馴服的（也可以說是過份善良）的民族，是好了傷疤忘了痛的民族，是日子過得好一點就對既往痛楚選擇失憶的民族，除非掌權者要他們記住比如南京大屠殺那樣的事件。中共建政六十年以來的所有歷史記載都是掌權者撰寫的「當代史」。

面對全世界幾乎都對六四失憶的情勢，中國掌權者會自以為得道多助嗎？但實際上只是「得錢多助」吧了。各國政要對六四選擇沉默是「睇錢份上」，若拿出他們心中的價值觀，或讓他們私下談，他們的真正想法決不是這樣。

在「得錢多助」的世界，偏偏有一個地方的人，不被金錢收買，他們就是已回歸中國的香港人。每年六四，香港都有數萬市民，在維園點起悼念的燭光，今年（零九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也許會有更多人走向維園。是因為曾蔭權的言論起了反面動員作用嗎？也許是的。但參加燭光集會的市民都知道，事情並不像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那樣，人多就可以把事情改變。我們去維園，是因為要對這件駭人的屠殺繼續發聲，是因為我們無法抹去記憶，是因為我們不能捂住良心過日子。我們曾有過一段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歷史，使我們可以在自由的空氣中，關注和支持中國向民主自由的體制奮進，我們有過楊衢雲、孫中山、黃花岡烈士，他們都在香港醞釀革命，我們為抗日戰爭輸血，為反對國民黨專政的共產黨人掩護，今天，我們也會義無反顧地支持內地的愛國民主運動，不管時間有多長，不管代價多大，我們也會讓支持民主的薪火相傳。這是香港人的人格。

面對專權政治的高牆，環顧「得錢多助」的世界，我們不僅孤獨，而且毫無勝算，但正如村上春樹

所說：「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錯誤。」

講多少歪理為鎮壓開脱都沒有用，批評學生當年過份激情也沒有用（誰沒有曾經幼稚和不成熟的地方？），不管誰正確誰錯誤，我們只知道一方是擁有所有體制的暴力、宣傳工具、動員能力的高牆，一方是只有靈魂和脆弱軀殼的雞蛋。這就是事實的全部。

有沒有勝算，有沒有利益，甚至有沒有效果，都不是香港人考慮的。從一百多年前楊衢雲時代至今，香港人就沒有考慮過這些。除了那幾個不是流着香港血的小丑。

明天到維園去。每一個獨立的靈魂會互相取暖。儘管是孤獨的，但我們心中徜徉昆德拉的一句話：「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讓我們反抗遺忘，延續記憶。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

香港人七一「再出發宣言」

儘管警方奉命將六四維園人數大幅縮小，但是親北京及政府中人對維園真正的盛況不會懵然不知，他們顯然擔心由六四到七一的延續。於是，由親北京人士劉迺強、王卓祺出面，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參與的《香港再出發宣言》，遂於早前在九份報章刊登全版廣告。不要問誰付廣告費和誰拉攏人聯署，宣言的主旨，發起人坦言是要「改變港人的價值觀和行為」。

「宣言」洋洋灑灑，可議之處甚多，謹摘幾點談談。

首先，宣言要改變港人愛國的價值

觀。從楊衢雲、孫中山以來，港人的愛國是問心無愧的。愛國是愛土地、人民，愛在中國建立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政權和體制，而不是愛一個貪污、腐朽、全國以權謀私的腐敗政權。因此港人支持愛國民主運動，港人六四去維園。《香港再出發宣言》則要香港人改變價值觀，將愛國變成「愛實質上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愛這個實行一黨專政的政權。儒學大師徐復觀生前說，「你做得一塌糊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那一點呢？」

其次，「宣言」論述香港政治、經濟危機，貧富懸殊，民生困難，而它歸咎於香港「沒有用足」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巨大機遇」，「香港將會在祖國壯大中邊緣化」。

無論祖國壯大不壯大，香港從來就處於中國大陸的邊緣。百多年來，香港的邊緣地位反而使香港擁有

自己生存發展的空間。去年（零八年）台灣大選後，大陸網頁有一篇署名岳海的長篇評論，從台灣談到大陸，談到香港，文章說，「如果內陸民間力量過份薄弱……那麼不要忘記還有港、澳、台這三顆不受中央指令直接控制的『衛星』。中國的前途不是讓這些制度和文化上的『異數』為內地傳統基因所同化，而恰恰在於如何讓這些地方的制度和文化逐漸影響內陸各地乃至中央；我們顯然更樂於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

邊緣的香港，堅持原有的司法獨立，言論自由，至少可以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並為中國經濟通往世界提供特有機制。香港對原有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制度、文化的堅持，是中國大陸真正關心國家進步的人士的希望。如果香港放棄了邊緣地位，融入中原體制，放棄了批評專權政治的言論自由轉而強調愛一黨專政的政權，香港成為山西，對香港、對中國會是好事嗎？

其三，「宣言」也談到權利與責任。愛國愛港都是

一種感情，而感情是非理性的，不應拿來作衡量是非對錯的準則。現代文明社會，講的是權利義務，「宣言」說：「如果每一位香港市民只重視自己權利，不重視自己責任，社會只會紛爭四起，內耗不息。……因此，我們不單止要問香港為你做了甚麼，更要問你自己為香港做了甚麼，為香港下一代留下了甚麼？為民族復興貢獻了甚麼？」

作為香港一個普通市民，除了家庭責任之外，我們的社會責任是交納種種直接間接稅，而我們的權利則是要由我們稅金供養的高官及公務員，為我們提供良好服務，我們的權利還包括法律權利，和若對政府有不滿可提出批評的權利。更根本的，我們應有政治權利，但現在殘缺得近乎不存在。「宣言」說的「你為香港做了甚麼」，是抄襲美國前總統甘迺迪向美國人民發問的話。在越戰期間，反政府人士提出的反詰是：不要問我為國家做了甚麼，應問國家為我做了甚麼。

其實，反政府人士提出的詰問才是以人為本的精神；而問老百姓為國家、社會做了甚麼，為民族復興

貢獻了甚麼，則是反人文主義的國家主義精神。

香港人要堅決反對的，是中央、特府、高官「只重視自己的權利，不重視自己的責任」。而香港市民，連選擇掌政者的基本政治權利都沒有，還有資格講要承擔民族復興的義務嗎？

「為香港下一代留下了甚麼？」若自問對香港是有承擔的人，至少應爭取為下一代留下一個民主的而不是任憑專權政治宰割的制度吧。這才是香港人在七一的「再出發宣言」。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七日

姑息主義讓專制政權更肆無忌憚

劉曉波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對政改的建議溫和，只求政權改善，而絕無顛覆共產黨政權之意。中共把他扣留及隔離六個多月，相信都在苦苦找尋對他入罪的證據。現在對他正式逮捕，固然同面對六十周年國慶而各地群體抗爭事件不斷增加有關，但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則同國際姑息主義抬頭有莫大關係。

自美國奧巴馬上台後，即一改布殊政府對極權國家的強硬態度，以柔軟身段，軟弱無力的説詞，向極權國家乞求和平。和平，當然是全世界人民的願望，但向極權者乞求和平，會得到怎樣的回

應呢？先是伊朗試射導彈，繼而北韓接連試射長短程導彈，進行地下核試。奧巴馬的反應溫和，不但仍表示與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無條件會談，對北韓也只是空洞無力地說，「現在該是有強硬反應的時候了。」《蘋果日報》論壇版刊登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柯翰默的文章，連續對奧巴馬的軟弱外交提出批評。當中的一篇文章，更指出伊朗改革派的示威活動，所反對的政權，是「美國所代表的寬容與自由的敵人」，示威者等待美國表示與他們站在一起，但等來的卻是奧巴馬說要繼續與伊朗宗教領袖對話。直至早前，備受美國輿論批評，奧巴馬才對伊朗局勢發表較強硬的談話。

對中國，更不用說了。美國所有訪華的高官政要，包括希拉莉、蓋特納，甚至向以維護人權見稱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時都不再提中國的人權問題。奧巴馬政府給中國當權者的訊息很清楚：你們隨便怎麼幹吧，面對金融風暴，我們要的是中國的合作。

在美國的影響下，西方國家的政要也跟隨。法國總統因會見達賴被溫家寶故意繞道，他隨後也對中國

軟化了。

於是，劉曉波被正式逮捕，面臨被羅織罪名及按黨意判刑的處境。世界各民間組織、人權組織齊聲對劉聲援，但各國政要卻少有發聲。中共不再顧忌在國際上受譴責，對內壓制更肆無忌憚了。

奧巴馬的姑息主義，當然與美國國內的民意取向有關。伊拉克戰爭使美國在經濟上、軍人傷亡上，並因虐囚而在國際聲譽上，都受創慘重。再加上金融海嘯，美國人民大都傾向先顧好自己家園、解決國內經濟困境、少管國際事務的孤立主義。奧巴馬在這樣的背境下以高票當選，很自然就採取「以合作代替對抗」的對外政策，這是姑息主義的根源。

問題是：極權國家的當權者，國內既無民主制衡，又不具有尊重人權的價值觀，他們崇尚的是實力。對極權國家的姑息、退讓、妥協，只會鼓勵這樣的國家對內實行更野蠻的統治，對外則可能會擴充軍力以至冒險犯難。過去希特勒被國際姑息主義縱容，今天伊朗、北韓也如此。曾經因起草《七七憲章》而在捷克共黨統治時被囚的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早前在報

章中說：「從其二十世紀的自身經歷出發，歐洲知道向邪惡妥協可能引發的災難性後果。……這種政策或被經濟利益主導，或者出於邪惡能被安撫並自行消失的幻想。向邪惡妥協的政策導致歐洲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歐盟不應該也不能再重複犯這種錯誤。」

儘管姑息主義暫時主導了國際政治，但畢竟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不可剝奪的人權這個普世價值基礎上的。真理也許一時之間敵不過強權，但強權卻永遠無法代替真理。在國內輿論的指摘下，奧巴馬已開始扭轉了對伊朗的姑息、妥協態度。當國內經濟好轉後，美國的人權外交相信會再次抬頭。

當然，任何國家的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人權，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外力。香港人也應如此。看到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的遭遇，看到在國際姑息主義縱容下，專權政治的肆無忌憚，仍享有自由的香港人絕不可氣餒，也不應聽天由命，我們應看到香港人的命運、前途，與劉曉波事件的關連性，因此我們七一要再出發，為劉曉波，也為我們自己，發出最強聲！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換一個特首，仍是怪胎

（零九年）七一真的很熱。這一天下午，在街頭走幾個小時，烈日煎熬非常辛苦，尤其歲數大的長者，很難走完全程。

這麼辛苦，仍要上街，為了甚麼？有的是為自己所在的群體，如市區重建的居民，如康文署公務員，如香港彩虹同志或性工作者……，但更多的，佔六成的參加遊行者，則是為爭取實現真正普選。

炎暑之下，願意為香港整體利益與前途而走上街頭，這樣的市民不管人數多少，也值得當政者反省了。何況是數萬之眾？

絕大部份的示威者，喊出一個共同口號，就是「曾蔭權下台」、「勿當奴」。最新公佈的調查顯示，曾蔭權的民望在這一年內突然大滑坡。去年（零八年）五月，對他執政表示滿意的市民，尚佔百分之七十四，不滿的則佔百分之二十一。一年之內，今年（零九年）五月的調查，滿意的已跌至百分之四十三，不滿的則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一。不滿的首次超過滿意的。

一年之內，為甚麼民望變化如此之大？回想零五年曾蔭權接替董建華上台，市民懷着對港英時代高官的良好期待，曾的民望一直高企。至零七年連任特首選舉，他的民望更達百分之八十，當時有人認為，即使這時全港市民進行普選投票，選出來的仍是曾蔭權。

轉折點是零八年五月，這時出現了招聘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風波。招聘過程，體制程序，薪酬釐定，以至部份副局政助的國籍效忠問題，都無規無矩，不但不依從機制（例如薪酬的訂定就繞過了獨立薪酬委員會），而且顯露出特首辦獨攬大權、黑箱作業的自把自為，暴露曾蔭權擴充馬房、扶植親信的野心。這是政府的一大錯失。它宣示特區政府告別港英管理的依足

機制、法度、規矩的時代，也可視為對特區政府的一次詛咒。

這一詛咒，帶來連番失誤。政府推出的利民紓困措施，因外傭稅的安排失當而變成擾民措施；施政報告的生果金，因要長者接受審查，受到廣泛批評，曾特首收回成命卻指反對者「不理性」；接着又出現曼谷派機事件，雷曼迷債事件，以及今年公務員減薪安排，種種缺失均在社會產生無休止的爭議與抨擊。

面對批評，特區政府沒有在管治體制上作反省，而是以種種派糖措施，或政治化妝術、公關手段來收買人心。但今年急急派糖的紓困措施，引來無助於三無人士的批評；雷曼事件初期曾蔭權拍心口說限兩周內銀行按市值向苦主回購，結果大話落空；減薪又引起公務員團體反彈，而潛在原因恐是政治任命高官減得太少；豬流感防疫開始時雖有掌聲，但其後又因防疫的過度措施而被指擾民。最後，突然結束機遇會並提出發展六項產業建議，許多市民已認定又是放空炮了。

是曾蔭權無能、特區政府無能嗎？非也。曾蔭權在港英時代是很能幹的，彭定康也公開對他稱許。

從市民過去的「倒董」，到今天的「倒曾」，已非

常清楚地顯示了，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不是「一國兩制」嗎？不是沿用港英的制度嗎？但你怎能想像，過去的港督或政府高官會說出「民主即文革」又或是「鎮壓導致經濟取得驕人成就」這類的話？你又怎能想像，那時的政府聘請一批高官可以不依機制、完全由一兩個人說了算呢？這說明，「一國」之下，難有「兩制」。港英時代實行的是「一國一制」，香港的制度基本上與英國相同，而「一國」又是不大理香港的弱勢一國。回歸後，「一國」變強勢，而「兩制」又互相扞格，不一樣了。

曾蔭權下台，於事無補。唯一可以解救香港管治沉淪的辦法，就是由香港市民普選產生直接授權的政府與立法會，由此而使行政與立法機關有充分的認受性。即使市民無奈接受二零一七、二零二零才有兩個普選，至少要在二零一二的政改中體現那不是假普選，即不是由中央篩選候選人的行政長官選舉，以及不是仍保留功能組別的立法會選舉。

否則，曾蔭權換唐蔭權或梁蔭權，也仍然是個怪胎。

二○○九年七月四日

二零一二特首爭奪：鹿死誰手？鹿死定了！

特區行政長官還有兩年多才換屆，三個可能的競逐者已開始了爭奪暗湧，其中尤以曾說過N屆都不參選的梁振英最蠢蠢欲動，被賭王以十賠一博他勝出的唐英年，亦不否認未來的可能性。但是連曾俊華在內，無論哪一位跑出，都不可能再享有董建華與曾蔭權剛上任時的民望了。

一國兩制之下，當特首的基本條件有三，一是中央的信任；二是管治香港事務的能力；三是民望。上述三人中，符合第一條件的依次為梁、唐、曾；符合第二條件的依次為曾、唐、梁；符合

第三條件的，三人都不具，若要在民望低之中選一個較高的，依次為唐、曾、梁。

梁振英長期以來，對他自己形象為何負面的解釋是，與他多年親中立場有關。零七年他在電台節目中說，回歸前港人對北京收回香港沒有信心，只要他說對九七後有信心，便已失分。因此他一直說香港人的人心未回歸。他這說法是想要向北京表示，他的民望低是因為他對北京忠誠，以此來取得中央更信任。

但這並非事實。香港人儘管大多數對回歸有疑慮，但能留在香港的人也很現實。既然回歸不可抗拒，就願意接受「港人治港」。因此，儘管沒有普選，但第一任特首董建華選出時，民意支持度達百分之六十五，高過彭定康任總督的所有時期。九七年十月他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後，民意支持度曾達百分之七十點四。這說明香港人願意接受一位長期任政協委員的親中人士的港人治港。其後由於八萬五、介入港大民調再加上廿三條立法，董的民望就急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了。

但倘若董在九六年被提名後，由全港選民投票，

相信他仍然會以大比數勝出。這樣首先他的處事方式就大不同，他與公務員體系不會有相互杆格的問題，其次八萬五就算提出來也會在亞洲金融風暴後急急收回，更不會在整個政府都無人知道的情況下，董忽然說「八萬五已不存在」了。至於廿三條立法，因董得到選民投票授權，也會順利得多。

第二任特首曾蔭權，上任時肯定中央對他的信任度不高，否則就不會釋法讓他只有兩年任期了。但他的第二個條件「管治香港事務的能力」和第三個條件「民望」都被中央認為夠高，於是試用他兩年。

香港市民鑑於對港英時代公務員的信任，亦對曾任特首予以支持。零五年六月曾接任時民望達百分之七十二點三。兩年後他連任時，民望仍達百分之六十八點九，他的民望下瀉始於零八年五月擴大政治任命的副局政助風波，接着連番施政失誤，顯示他連掌管公務員體系都無能為力了。零八年十二月他民望下挫至百分之五十點二。他尚未遇到廿三條立法這樣的棘手事，因此他的民望低處未算低。

在未有普選之前，特首須靠較高的民意支持度，

才能有效施政。但董、曾兩任特首的經驗告訴我們，民望高低與是否親中無關。霍英東夠親中了，但在香港市民中享有不錯的聲望。倘若親中不等於親共的話，那麼司徒華是香港最親中的人士之一。他的民望如何？董建華上任時的聲望更證明親中並非民望毒藥。舊日管治香港事務的能力，也與民望無關，而且與是否能真正有效領導回歸後的管治團隊無關。曾蔭權就是例子。

十二年來，兩任特首開頭民望均高，跟着下挫，這說明「港人治港」的真正癥結，在於特首缺乏民意認受性。倘若曾蔭權零五年或零七年經港人一人一票普選跑出，他肯定不會有以後一連串的錯失，而且，他何須不斷「任人唯親」去擴大自己的馬房呢？

因此，二零一二年縱使沒有普選，也一定要極大幅度地擴闊選民基礎，否則選出中央信任但民望低迷的唐、梁、曾任一人，也只不過是又一次災難的迴環。逐鹿中原，是指群雄爭奪，而不是訴諸民意。逐鹿中原，只問鹿死誰手。但作為老百姓的鹿，就死定了。

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共建政六十年的真正反思

報章報道互聯網流傳的「老同志談話」，筆者早已全文讀過。不管是萬里、喬石還是哪一位元老的錄音談話，從語氣、涵蓋範圍，與自稱退休仍享很高政治待遇來看，談話出自一位曾居最高領導層的元老口中，殆無疑義。又由於談話涉及其他幾位元老，因此這份談話所反映的，應不是一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着曾經為共產黨的事業奮鬥終生而至今仍未被權力、金錢徹底腐化的一批老去的高層領導，他們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時的真正反思。他們是最有資格去回顧這六十年的，儘管他們也是政治的既

得利益者，尚未能真正從老百姓的切身體會出發。

談話中引述一位病重的元老花了一個多小時對他說了對國家、對黨現狀的種種擔憂，「這位老同志提到，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怎麼向老百姓、向歷史交代」？一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老同志，曾對他表示有兩大遺憾，一是沒有能為黨的歷史上一個重大冤案平反，另一是遺憾沒有推動黨對不同意見的容忍政策。還有一位是黨的理論家胡喬木，七十年代末在一次黨內講話時提到政治倫理。而這個「政治倫理」的問題，就成為元老這篇談話錄的中心議題，也是過去為理想奮鬥一輩子至今良心未泯的元老們耿耿於懷的事。在建政六十周年時，要回顧過去，豈能遺漏了這些人的慨嘆？

中共為六十周年拍了許多電影、電視劇。這位元老在談話中說，講得最多的是「幾千萬革命先烈換來了紅色江山」，這是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但他們是為甚麼犧牲的？為的是當時中共設立的目標和理想。十多年前，曾出過一本書，把中共在三、四十年代公開發表的社論、評論、聲明收集起來，書名是

《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承諾》。這本書很快被查封了。當年中共「向全國人民做了承諾，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這些承諾的確吸引了無數志士仁人。那些犧牲的人就屬於這部份人。」這位元老還透露，「其實，那些承諾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許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修改掉了。」「我看到過一份文獻研究室送來的原稿和修改稿，當時，讓我心裏震動很大。……這麼個修改法，那幾千萬人不是白白犧牲了嗎？那是白紙黑字，確實推翻了當年我們黨的承諾。……這就是違反政治倫理，這就等於是把我們黨執政掌權的基礎建在沙灘上，這能牢固嗎？」

甚麼叫政治倫理？承諾的事要履行，至少不是硬把承諾過的東西一筆抹掉；做過的事要負責，執政黨做了甚麼，要承擔責任，對歷史要負責，對老百姓要有交代。

這位元老提到的另一個政治倫理，就是六十年執政，「我們黨把國家的治亂繫於一身。過去那麼多年的折騰，沒有不起因於我們黨自身的折騰的」、「黨的折

騰殃及了國家，殃及了老百姓。」然後，「我們告訴老百姓，這個國家沒有共產黨的話，就會大亂的，老百姓真是怕折騰怕到極點了，他們對穩定的盼望，就成了我們黨再單獨執政下去的『民意』，這一循環甚麼時候能夠打破呢？」

六十年，許多事都沒有變：中國共產黨至今還沒有在社團管理部門登記過，「我們國家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制度。『國家還是黨的國家』，而不是『黨是國家的黨』」。「財政上，黨庫與國庫之間的那堵牆沒有建立起來」。黨中央機關如中央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等，都是執政黨的機關，但都沒有「掛牌辦公」，仍像非法地下機關那樣運作。仍是黨指揮槍，「黨軍沒有被國家對軍隊的領導來代替。」

所以，現在香港的「愛國人士」，常講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就是「黨的國家」，因此要人們去愛的是「黨」，而且不是「國家的黨」。

二〇〇九年八月五日

天國與地獄：海外華人的兩極際遇

報章報道，對香港不少政商界紅人來說，中共建政六十年的慶典「大過天」，各種活動都要讓路。訪京團約有二、三百個名額，能不能躋身在名額內，而其中又有多少人可獲邀閱兵，許多人認為是身份象徵。

據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北京駐各國使領館，也為六十周年奔忙，投入大量金錢，搞各種慶祝活動，而各地華人中，也有不少人以能進入使領館所設酒會，或更風光地能受邀到北京參加慶典，來炫耀其愛國地位。

然而，香港或外國訪京團的人士

中，有多少是持外國護照的呢？也就是說，許多國籍身份已屬美、加、澳、紐的華人，都以能參加不是所屬國家的國慶為榮。這可以說是華人社會所獨有的咄咄怪事。

在不少人翹首以望北京請柬之時，我們在電視畫面看到與天國對比的地獄：位於中緬邊界的果敢特區，上萬名難民扶老攜幼地倉皇從緬甸逃到中國的雲南省，只因那地方受到緬甸政府軍的壓倒性軍事打擊，特區的盟軍死傷慘重，在政府軍控制戰局下，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華人，被迫逃離家園。

果敢原屬中國，國共內戰時國軍退守此地，成三不管地區。這裏自明代以來就由漢人居住，講西南漢語，寫漢字。面積五千二百平方公里。據柏楊的《異域》引述一九六一年盤據該地的國軍說：「共產黨所以在去年（一九六零年）匆匆的，喪權辱國的和緬甸『劃界訂約』，就是企圖明確的顯示出來我們（國軍和當地華人）侵佔了緬甸的國土，作為消滅和控告我們（指國軍的孤軍）的法律根據。」

一九八九年，經緬甸中央政府批准，在果敢成

立撣邦第一特區，擁有自己的軍隊。這次的衝突，是緬甸軍政府考慮到明年大選，要將特區軍隊收攏到政府軍中，引發地方軍隊與中央軍隊的對峙及開火，大量華人避戰火而逃亡。緬甸軍的炮彈甚至落到中國境內，造成一名中國平民死亡和多人受傷。

對於在原屬中國的大量華人聚居的地區，華人又再受到危及生命的攻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上月(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輕描淡寫地表示，「中方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已通過外交渠道向緬方表達關切，希望緬方妥善解決國內有關問題，維護中緬邊境地區穩定。」

對於軍政府以華人華僑為屠殺對象的軍事行動，中國政府的態度未免太溫和軟弱了。華人華僑受攻擊，只是緬甸國內的有關問題嗎？炮彈落到中國領土，殺死了中國平民，為甚麼竟沒有像當年美國誤炸北京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那樣，全國總動員來抗議？

原因是：那些逃難而來的華人，那些在邊境被炸死的中國平民，在專權政治的掌權者眼中，都是不值一顧的「屁民」；而那些拿了外國護照的華裔政商紅

人，才是掌權者要籠絡的「愛國人士」。過去五、六十年，東南亞多次的排華運動，中國政府有伸過援手嗎？六五年印尼排華，中國只派了兩艘船去接載華僑回國，印尼軍人對華人大開殺戒，中國也不吭一聲。一九七五年赤柬屠城，美國大使館對美籍人士甚至連一條狗都要接走。但華人湧到中國大使館，在後院鐵閘外只見使館的人在下棋，使館人員見華人湧到，立即退回屋內。華人大量被殺，少數歷盡艱辛去到泰柬邊境，拉起了橫額，上寫：「寧做美國狗，不當中國人！」這些都有當時的照片為證。

當中共以傾國之力，塑造奧運之後另一面子工程——六十周年慶典的時候，筆者不禁要問一問那些拿着外國護照去參加中國慶典並口稱愛中國的華人，你們看到湧向中國邊境的緬甸華人難民嗎？你們愛的，是一個「以民為本」的還是「以權（錢）為本」的國家？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日

爭取二零一二成為邁向普選的中間站

議論政改、雙普選這些話題，很可能市民已覺得沉悶，因為民主普選已講了超過二十年，市民的普選意願早就十分清楚，《基本法》也訂明這是終極目標，而實現雙普選的主要阻力來自北京，北京一天不同意，雙普選就無法實現。市民上街、發聲、通過民調，該表達的意見都表達了。二十年，市民的努力出現彈性疲乏。今天，仍講這個話題，有甚麼意義？會有甚麼效果？

筆者必須指出，與過去二十年都不同，今天正處在邁向雙普選的敏感時刻，市民與支持民主的從政人士，必須

重燃對雙普選的熱情，進行認真的討論和參與。而從政人士，尤其是泛民議員，更應在此時鼓起勇氣，準備為實現民主理想而不惜犧牲眼前的政經利益。這是人生中難得為自己的信念而一博的機會。

為甚麼說這是敏感時刻呢？因為根據人大常委零七年底的決定，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普選以後，立法會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

這也就是說，儘管多數市民仍希望二零一二年有雙普選，但中央也討價還價地明確了普選時間表，再也不是無限期地把普選拖延推遲了。

其次，人大常委副秘書長喬曉陽在對上述決定所作說明中提到，依照香港《基本法》規定，「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作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可以作為邁向普選的中間站，以利於向普選平穩過渡。」

這也就是說，按人大常委的決定及喬曉陽的說明，二零一二年的選舉應設計為邁向普選的中間站。因此，如真正在二零一七、二零二零實現雙普選，二

零一二的政改方案是關鍵。曾蔭權曾說，任內「徹底解決普選問題」、「玩鋪勁」，都是符合人大決定的應有之義。

但今年（零九年）以來，曾特首明顯退縮了。二零一二年政改方案推到年底，十月施政報告據稱也不提政改。公民黨提出推動二十三名議員總辭，並於泛民武林大會達致政改共識之後，政府發出新聞稿，強調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選模式，應由下任特首和下屆立法會解決，二零二零年立法會普選方案應由二零一七普選的特首和第六屆立法會處理。換句話說，曾政府已不考慮在二零一二年政改方案中，引入喬曉陽所提議的「邁向普選中間站」這個問題。

因此，在政府提出二零一二年政改方案之前，針對政府退縮的迹象，現在可說是處於爭取落實真正普選的關鍵時刻。二零一七年的特首普選，將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又是一個怎樣的「民主程序」，「邁向普選的中間站」應有與前不同的設計。全面普選立法會，也應在「中間站」中對於與普選相違的功能組別有所取捨。

泛民共識中，只提普選而不提年份，是一個讓步。在爭取二零一二年成為普選「中間站」的過程中，泛民與輿論也有足夠理由讓中央了解，泛民之所以採取這次的積極態度，是因為近幾年特區政府的施政弊端層出不窮，實源於民主成份薄弱的特首，不可能組成向廣大市民負責的政府之原故。

泛民議員及政黨，肩負市民的信任，寄予向政府施壓以實現我們夢寐以求的民主普選的重任，在這關鍵時刻走出的每一步，不用說都有他們的困難。我們議政較為容易，從政就有種種考慮。報章提及的民主黨的難處，亦是實情。但筆者認為，公民黨事前與其他泛民政黨商議是否足夠，對五區總辭人選的提出是否尊重不足，其實都是小節。有民主理想的從政者，應把小節拋諸腦後，以大局為重，攜手合力，步調一致地，在此關鍵時刻，為民主作出承擔，表現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香港市民一定會支持你們！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

中國進入一個互不相信的時代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口號》共五十條。這些包括「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等虛假、過時的口號，喊出來本身就使喊的人、聽的人以至全國老百姓都籠罩在說假話的氛圍中。而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名義發佈，也說明以黨代政、黨即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中共掌權者不可能不知道有這種影響，也許他們正要強調這種影響，即在民眾對黨的信心動搖的時候，以假話連篇的口號強硬表示，你們「屁民」儘管不

滿吧，以黨代政是不會改變的。

五十條公佈後，內地網民紛紛表示，其中「最牛口號」是第四十二條：「向全國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部致敬！」向幾種類別的人致敬是歷來有的，「向幹部致敬」則似是新鮮事。因為毛澤東、鄧小平都一直告誡幹部要警惕官僚主義、貪污濫權，不會「向幹部致敬」。幹部即官員，在今天無官不貪已成社會共識。每年逾十萬起的群體事件，均由貪官而起。「向幹部致敬」即向貪官致敬，這一口號出籠，說明掌權者已亂了方寸。

網上另一篇與幹部有關的調查，是「中國女性氣質排名」，氣質評比主要根據幾個準則：職業操守、待人誠懇度、穿着打扮、文化素養。是「文化素養」而不是「文化程度」，因為文憑也有假的，更可能是有許多水份的。評比又分六類女性：公務員、護士醫生、教師、三陪小姐、企業職員、打工妹（包括農村女性）。

評比結果是女教師氣質排第一，三陪小姐排第二，而排榜尾墊底的則是公務員，也就是幹部或稱官員。評語是，職業操守：糟糕，上班忙於上網聊天打

遊戲，基本就是混飯吃；待人：糟糕，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姿態；穿着打扮：糟糕，想學三陪小姐的時髦，又失去自己特性，不倫不類；文化素養：糟糕，語言表達能力差，不會更不喜歡主動說「謝謝」、「請坐」、「歡迎」、「不客氣」等禮貌用語。

最近引起香港社會輿論譁然的大陸女性公務員，應是新疆新聞辦主任侯漢敏。對她的職業操守、穿着打扮，筆者不敢置評，但作為一個新聞發言人，她的待人尤其是語言表達，實在是糟糕得讓人吃驚。甚麼叫「跟蹤拍攝」，甚麼叫「指手劃腳」，甚麼叫「煽動鬧事嫌疑」，甚麼叫「在人群中亂竄」，都是無視記者職責而強加暴力語言的指控。作為新聞辦，而說出這種違反新聞常識的話，實在難以想像。

而她的眼神閃爍，一副不敢正視記者們的心虛表情，使人覺得她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說的話。

這種理屈詞窮，尤其表現在她，還有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李剛，都不敢正面說出「打人」這句話，而都是說「發生大家不願看見的事」。這種迴避真實，砌詞掩飾，是中共建政初期的領袖人物如毛、周、鄧及當

時的幹部所不會有的。毛儘管常常「理曲」，但卻「氣壯」，使人不會懷疑他說出的是自己不相信的話。

在中共專權體制下，侯漢敏、李剛其實都是可憐角色，他們被迫說出自己也不相信的話時，他們怎麼可能認為聽者會信呢？當「六十周年口號」叫出連中共掌權者都不再相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建設」、「公有制為主體」、「向幹部致敬」這些口號的時候，已宣告了中國進入人民不再相信政府而政府也不再相信人民的時代。這是非常危險的發展。一位友人傳給我一句林肯說過的話：「輕信是危險的，但對任何人都不相信更危險。」真是至理名言。大陸社會已經逐漸變成了任何人都不相信任何人的社會，而「六十周年口號」無疑進一步粉碎一切互信基礎。

我們能相信侯漢敏嗎？我們能相信中央嗎？我們能相信「一國兩制」嗎？我們能相信在事實面前軟弱畏縮的曾特首嗎？這是大陸信心危機向香港的氾濫。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六日

在專權政治邊緣六十年的香港故事

六十年前（一九四九年），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大的轉折。經歷抗日戰爭，經歷國共內戰，苦難的土地上再次改朝換代，徹底改變了我們上一代和我們這一代多少中國人的命運。

北京傾全國之力慶祝建國六十周年。電影《建國大業》與種種慶祝國慶的活動如火如荼。可是，如果我們問：一九四九年是中國建國嗎？那麼中國豈非只有六十年歷史，又如何是五千年古老大國呢？回顧歷史，一九四九並非中國立國之年，也不是中國亡國後又重新建國之年，而是同歷史上的多次變遷一

樣，從另一批中國掌權者手上奪得政權的改朝換代。準確地說，四九年不是建國，而是中共建政，今年(零九年) 是中共建政六十年。

正名

改朝換代的是大陸，被代替的政權則遷移台灣。因此，今年也是國民黨政權遷台的六十周年。大陸固然有六十年的慶祝活動，台灣書市也出現了一九四九年的熱潮，許多作家紛紛出版對國府遷台六十年的政治、社會或個人的回憶。四九年對台灣也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夾在兩岸中間的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四九年的政治是穩定的。四九年前後，突然湧來了許多移民，使一九四五年只有六十萬的香港人口激增。那時，香港人把所有不講粵語的外省人，通稱為「上海佬」。上海佬把外省經營工商業的資金、管理、文化，帶來了香港，香港經濟開始了躍動。六十年的香港故事，就從全國各省遷來大批移民開始。

過客

在兩岸風雲變幻的動盪中，來港的合法非法移民越來越多。六十年代的逃亡潮湧進大批人口，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來港的移民與香港原居民一起，在政治平靜和法治穩定之下，過着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安居樂業日子。港英提供的法律，使這裏的中國人能在基本上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從而創造出香港的經濟奇迹。大陸的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均貧化對香港人沒有實在的衝擊，影響最大是心理上使香港人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他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香港是一個跳板，許多人總想着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他們從沒想過植根香港，歸屬香港，以香港作永遠的家。

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文革及六七年暴動居然沒有動搖香港，港英政府的廉政、公屋及保障社會公平的措施，使香港市民逐漸滋生出歸屬感。《獅子山下》及許多以香港屋簷下為題材的電視劇，香港粵語流行曲的興起，使香港人有了自己對香港的認同。這種心態的轉變，就成為日後港人要求發展民主的意識形態基礎。

遷徙

隨後九七問題出現了，中國收回香港的意向衝擊着港人剛剛建立起來的對香港的認同，人們認識到我們還是無法擺脱中國大陸政治的陰影。一百多年在中國政治動盪的邊緣得以倖免的香港，終於嘗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專權政治的滋味了。港人對八九民運的投入，「六四」螢幕前的熱淚，及其後北京對「六四」的取態，衝擊着港人的價值觀。九七和六四，使香港出現了移民潮。對於許多香港人來説，這是二次逃亡。第一次從大陸逃來香港，第二次從香港逃往美加澳紐。

接下來是香港回歸。回歸後司法獨立所提供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的保障，穩住了香港人心。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崛起，又使許多在海外無法適應移民生活的港人，再回流香港。對許多人來説，這是第三次遷徙。人生有多少個十年？人生經得起多少次飄蕩、流徙？香港的故事就是在中共建政六十年的衝擊下，躲避、創業、遷徙、拼搏的辛酸和沒有根的故事。

六十年來，香港人的國家民族意識經歷很大的改變。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前，香港所有中文報紙，除了

中共辦的左報之外，大都以「中華民國」紀年，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輿論，政治思潮，學術文化，是國共思想鬥爭的延伸。輿論非左即右，陣線分明。只有少數報刊有獨立輿論。但在中共眼中，獨立輿論也被貼上「親英」的標籤。回歸後，一切翻轉。所有報刊都以公元紀年，大部份輿論，已自動獻身於「愛國」了。

人生

筆者一九四八年五月跟從父母，從動亂的大陸移居香港。逾六十年來，離港往外地旅行居住的時間，從未超過三個月。筆者的成長、工作、生活、婚姻，也都受中共政權的影響。中共建政後不到一年，筆者就進入左派學校即愛國學校就讀，畢業後在左派出版社任職，後創辦左派刊物《七十年代》開始論政生涯。五、六十年來，關心國是，所從事的職業也緊繫着國家民族的命運。要說「愛國」的資格，也夠老了。五十年代香港的「愛國力量」仍薄弱，但絕大部份的愛國左派都懷着純真的理想，認同中共宣示的價值觀，要為祖國的事業獻身。先是一批批中學畢業生回內地升

學，其後在大躍進期間又有大批工人被動員回內地貢獻自己的力量。但這些獻身祖國的人，都經歷了「我愛祖國，但祖國愛我嗎？」的歧視，匍匐於「海外關係」的陰影下，在大陸是二等公民。他們懷着身心的創傷，灰頭土臉地一個一個在十年後又陸續重回香港，幾乎無一例外。回港後大部份人缺乏適應香港社會的技能，落寞地生活在底層。這裏多的是有血有淚的香港故事。

愛國

至於留在香港、投身愛國機構的懷抱理想的年輕人，包括左派影圈中曾紅極一時的影星，大部份也都晚景凄涼。宣稱「為人民服務」的愛國機構，對屬下員工比絕大部份的資本家更無情。這裏也多的是悲戚的香港故事。

回歸後，香港故事改頭換面。原來不愛國甚至反愛國的，都愛國了。愛國不再是純真情懷，而是政治經濟利益。於是，那些早年抱着追求國家均富理想的老一輩，在現實面前，對中共「愛國不分先後」的政策

作出感嘆：先愛國不如後愛國，後愛國不如不愛國。

中共政權的本質也變了。掌權者除了繼續緊抱專政權力不放之外，建政初期「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也變成視老百姓為「屁民」的既得利益者。「革命革了幾十年，一下子回到解放前」。不，老百姓的地位應比解放前更不如。向錢看、向權看是氾濫全國的價值觀，它也像傳染病似的毒化香港原來機會尚算平等的社會。香港衍生出種種讓人想像不到的奇形怪狀故事。

中共建政六十年，太多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清代孔尚任的曲詞：「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正反映我們這一代曾追隨中共建政時的理想號召的過來人，今天的心情：理想的高樓已崩塌，換上豪華的、朱門酒肉臭的高樓；賓客還繼續飲宴，但所有賓客都不是昨日面貌了。這座新型大廈的樁腳穩固嗎？還是終有塌樓的一天？

二○○九年九月二十日

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難解難分

連日來《蘋果日報》刊登的《中共建政六十年：香港故事》，大都是建政頭三十年的往事。對近三十年出生和成長的人來說，可能是比較遙遠了。就他們經歷的近三十年來看，中國的經濟不斷起飛，國際地位也在上升。他們較少看到更較少經歷中共建政頭三十年的苦難。

許多人把中共建政歷史，劃分為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去年（零八年）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報道，大都建基於對前三十年路線方針的否定。今天，許多人頌讚「祖國成就」，講的也是後三十年

的成就。前三十年，就「別提它了」。

不過，今年（零九年）中國官方卻下了指示，對建政三十年的定調是：六十年不分前後，既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有人認為，中共這樣定調，是為了平息內地左、右派的批評聲音。因為左派認為，中共現在的掌權者，只是口頭上講社會主義，實際上已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他們是背叛了馬列毛與社會主義路線的右派；右派則認為，掌權者太左，仍是文革專制的延續。掌權者在大陸理論家眼中，可以說左右不是人。但真正的情形是，掌權者既非左亦非右，他們是從特權階層而衍變成的權貴派。在中國大陸，掌權者中已沒有左右社資之分，只有權力大小與由權力掌握的資源多少的區別。社會矛盾就是官民矛盾，就是權貴與反權貴的矛盾。

從這個角度來看，筆者同意中共「六十年不分前後」的主調。因為六十年都是由打江山而獲得權力的特權階層管治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沒有區別，區

別的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

前三十年，中共以社會主義追求的平等目標為理想，並以此來號召追尋它的黨員、幹部、知識分子與民眾。平等是一個很好聽的詞語，多數人尤其是年輕人，很少人認為人應該不平等，有些人應該騎在他人頭上剝削壓迫他人的。然而，如果一味追求分配平等而不惜犧牲人的自由的話，那麼追求平等的結果，就是如《動物農莊》所說的：「一切動物都平等，但有的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也就是說，犧牲了自由，不但產生了「更平等」的特權階層，而且是整個社會均貧化，實現了羅素所說的「乞丐最平等」。

中共建政的後三十年，打破了前三十年追求的「分配平等」，實行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然而，由於在前三十年滋生的「更平等」的特權階層仍享特權，而且成為世襲權貴和有了「近親繁殖」衍變，因此雖打破了分配平等的追求理想的符咒，但在自由經濟中不僅沒有建立機會平等的規範，而且突出了機會的不平等。所謂機會平等的規範，就是嚴格的法治，是三權分立尤其是司法獨立，是人民投票授權的民

主體制。沒有這些機制，自由經濟就不是一個機會平等的機制，而是依靠特權和官商勾結發財的機制。打破了社會主義追求分配平等的理想之後，更使社會失去了信仰，變成上下交征利、無事不可為的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物質主義。於是貪污腐敗越演越烈，低人權和低環境生態，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與保障。人與人缺乏互信，人的墮落和不擇手段地追求私慾成為主流。經濟騰飛，貧富懸殊，假貨盛行，騙術層出不窮，是後三十年社會的主要發展趨向。而掌權者全無意願要建立機會平等的法制，所有施政都是權宜，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都是以暴力與假話去維繫穩定。建國初期的平等理想，民主追求，道德遵循，已全部被埋葬了。

不分前後的六十年，是怎樣不分？甚麼是一以貫之的？只有一個字：權。權就是一切。權就是從前三十年到後三十年的一切罪惡的淵藪。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明天(零九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天安門廣場有大閱兵。筆者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曾看過陳凱歌的電影《大閱兵》(張藝謀攝影)。那時陳、張二人仍是帶點反建制意味的新一代電影人。電影《大閱兵》講的是軍人為參加一九八四年的閱兵,所受的地獄式的訓練,包括發燒四十度仍要受訓,母親病故也不能回家,雙腿紅腫仍要奔跑等等非人操練,只為了經過天安門一齊邁步、一齊甩臂、一起高呼的一秒鐘。

由蘇聯開始、中共依隨的「國慶」閱兵,是現代文明國家的人民無法想像的

事。「國慶」不是國家的生日嗎？正常人過生日不都是吃蛋糕、送禮物鮮花的嗎？拿出西瓜刀、鐵尺、手槍來炫耀，恐怕只有黑幫過生日才會如此。

以閱兵來過「國慶」，只有一個理由，就是對暴力的崇拜，對國家是合法暴力機器這種觀念的認同。這不是「人民共和國」，而是「軍國」。在國家生日時炫耀武力，不惜採取種種擾民措施，正足以說明這國家究竟是「以民為本」，還是以暴力為本。

這幾天，我們會每天不止一次地聽到螢幕播「國歌」。儘管已聽得耳朵起繭，但筆者仍對其中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深有感觸。慶典前在北京的嚴加戒備，驅逐訪民，嚴查進入北京車輛，而且據稱國慶前一天起，北京二環路以內的酒店實施戒嚴……。這一切，都證明確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

對這句歌詞有感觸，還因為早前中國作家沙葉新在網上的一篇文章：《「腐敗」文化——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沙葉新在一九七九年寫了話劇《假如

我是真的》，是文革後第一部反映幹部特權的話劇。這個戲掀起軒然大波，最後遭到禁演。但實際上，所揭露的腐敗，不過是幹部要求換大一點的房子，並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調回上海這些小特權而已。與後來的發展相比，那些特權只是小菜一碟。其後在一九八五年，沙葉新當了八年的官——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社會種種發展，使他擔心再幹下去不知自己會不會也變成貪官，於是他堅決辭職。由於寫過被禁的揭露特權的戲，又有當官經驗，眼看腐敗現象在大陸蔓延，他以「憂國如家」的勇氣，準備三年，寫了三個月，寫下這篇《「腐敗」文化》。

在這篇長近二萬字的文章中，沙葉新總結出中國官員貪污腐敗的集團化、部門化、市場化、黑幫化，貪官品性的低下、骯髒。其中最震撼的揭露，是買賣官位的「市場化」。他列出湖南郴州販賣「烏紗帽」的市場價格，從縣委書記、公安局長、政法委書記的二百萬，到縣檢察長、縣政府辦主任的二十萬，一一列出。而烏紗帽收入也由郴州市委書記、副書記、紀

委書記按比例分配。

賣官者固然是貪官，買官者也一定變貪官，他們必以數倍或數十倍的利潤賺回買官的投資。這種腐敗的市場化，實際上等於半合法化、半公開，並成為體制的一部份了。

沙葉新的結論是：腐敗是這個政權執政的基礎。以法治國，以德治國，都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國才是實情。「當腐敗的程度能讓各級官員滿意而又不讓百姓太不滿意時，便是這個政權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這個平衡被打破，就將危及政權本身，這才有了所謂『反腐』。」

但近年來，越來越多地方平衡被打破，老百姓走投無路，群體抗爭事件越來越多。沙葉新在江西「紅色根據地」贛州城外，就親耳聽到一個攤販憤憤地說：「現在就缺陳勝吳廣了。」民眾對陳勝吳廣的盼望，使中共更覺暴力統治的必要。因此，大閱兵最大的意義不是對外而是對內炫耀武力。

我們都不希望出現陳勝吳廣，不希望以暴易暴，

因此期盼中共能進行政治改革：開創民主政治，三權分立，保障公民權利。但至今未看到中共有政改之意。誠如沙葉新所說，「拒絕民主政治，不但會孳生腐敗，而且拒絕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種腐敗——政治腐敗。」於是他的結論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為甚麼不僅是政權，而且是中華民族呢？因為，腐敗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行為準則，成為生活方式，成為政治制度的一部份，成為侵蝕精神生命、影響民族性格的一種文化，怎麼不是民族的最危險時候呢？

最危險的時候不是來自外強入侵，而是來自專權政治與民族自身的內耗。這是令人痛心的日子。

二〇〇九年九月三十日

沒有了「人民」的慶典

胡錦濤檢閱各兵種時，眾兵齊聲多次呼喊「為人民服務」。看完直播後，筆者最大的感觸是在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盛典中，看不到「人民」。

中央電視台拍下從空中鳥瞰天安門與周圍情景的鏡頭。看到北京的高樓大廈，寬闊街道。然而，多條街道都沒有車輛，也不見行人，屋宇天台與窗前空無人迹。在外國，遇有大遊行，常見街道、屋頂、露台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北京大巡遊，「人民」到哪裏去了？

博訊網頁刊出多幅北京大遊行時街道的照片，幾乎所有街道，都只見公

安、武警，又或是參加完遊行後有秩序散去的人群。北京市民都不見了，他們都不走出門去看熱鬧了。這是專權政治下人民生活的寫照。

不錯，你可以說「人民」在遊行隊伍中，一個個方陣除了有軍隊，還有工人、農民、學生。但那些都不是普通人民，他們是「人民」的代表。而且，不是由老百姓選出來的，而是中共黨遴選的代表。就像零八年奧運五十六個中國民族出場一樣，幾乎所有穿上少數民族服裝的孩子都是漢人扮的。這次大巡遊的台灣花車，也不是台灣貢獻而是北京越俎代庖自製的。因此，方陣上的「人民」不是真正的人民。

被挑選出來的方陣的「人民」，也有笑容。既是被選中，也不能說他們的笑容是假的。但如果我們回想二十五年前，一九八四年大巡遊時，一些民眾自發地舉着「小平，您好」的標語牌，他們的笑容恐怕才真正自然和發自內心，而他們才是真正的而不是被挑選的「人民」。

大陸知名博客楊恒均，在網上一篇文章說，他身在澳洲，同時在電腦上看CCTV大檢閱直播和電視上

CNN直播，他發現，CCTV的直播比CNN的直播晚了三十秒鐘。比如說，當CNN直播的儀仗隊已走到金水橋了，電腦上CCTV的儀仗隊才剛剛出來。他認為，晚半分鐘是非同小可的事。CNN的直播可以說見證歷史，而CCTV的直播其實只是看表演。當然，晚半分鐘，同樣場景，我們不會覺得有甚麼損失。但如果真有甚麼意外發生，經CCTV的編輯審查後大陸人民都無法看到。因此，晚半分鐘意味着大陸人民只能看到掌權者允許他們看的東西，這半分鐘，正顯示了掌權者在沒有人民參與的國慶節日，既不相信人民，也害怕人民。這與人民不相信官員也害怕官員，是相互的。

人們對大閱兵最大的驚嘆是「整齊劃一」。這整齊劃一，尤其是女兵和女民兵們，所構成的美感，是賞心悅目的。然而，當想到整齊是由一個又一個的個人所組成，而他們本來都是和我們每一個人一樣，是自由行動的人，只不過為了取悅掌權者才經地獄式訓練而變成個人的消失，變成集體之一員，變成方陣中的一角。而這種「集體主義」，絕不同於西方福利國家

的任何施政均以全民利益為考量的「集體主義」，而是為專權政治所用的集體主義，是抹煞了個人的集體主義。想到這一點，我們還會覺得那是美嗎？

在坦克駛過天安門時，筆者想到的，是六四王維林隻身擋坦克的畫面，那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真正的個人，真正的悲壯之美。如果王維林是我們的民族精神，筆者會以身為這民族的一員而驕傲。

在大檢閱中，這種人民不存在了，連普通人民也消失了。掌權者的統治意識，不是以民為本，而是在剝削百姓的廉價勞力、透支資源、戕害生態之下發展經濟，然後分一點殘羹給屁民，使他們不思造反。

曾特首觀禮後回港。離京前他談到拜會中央各部門，談的都是經濟發展。其中他提到拜會公安部，談毒品輸港與非法入境問題。顯然他沒有向公安部提出香港記者在大陸被毆打的事，而這是他不久前曾說過要表達的關注。他已經與北京掌權者同調，只講經濟發展而漠視了人，尤其是人的權利。而人的權利，才是最值得珍貴的。

二〇〇九年十月三日

有普選，才免於「官不聊生」

連續三年，特首施政報告的題目都有一個「新」字。老要標榜「新」的東西，幾乎肯定是了無新意之物。因此，在施政報告發表的前一天，筆者就判斷「明天將發表最少市民關注的施政報告」。專欄作家李純恩回應說，特區政府「恨不得無人關注才好」，因為「多人關注，罵的人多。少人關注，罵的人少」。

施政報告發表第二天，《蘋果日報》大概認為「無料到」，因此沒有放在頭版頭條。然而，接下來一個多星期，卻幾乎每天頭版都講施政報告。那真應了李純恩所說，「多人關注，罵的人多」，而

筆者認為「最少人關注」的預測也落空啦。

可惜，被市民關注的，卻不是我們期待的對大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而是一些小事使我們憤怒。如雙普選路線圖，高地價政策，教育困境，施政頻頻出錯，貧富懸殊……這些市民關注的大問題，施政報告都交了白卷。小事則是慳電膽風波，和活化工廈等涉「利益輸送」之事。

小事還包括特首對一些質詢的回應。比如他厚顏無恥地把一再延宕政制發展稱之為「一百五十多年來……最重要的里程碑」；在回應七萬元一呎豪宅時說很多樓宇都是四千多元呎價或以下，潛台詞是要買樓的人遷離市區；又為貧窮定義為收入在綜援以下……。他真的沒有體會到市民的艱辛與期望。民調顯示，施政報告的滿意度，去年（零八年）大跌了二十一個百分點，今年（零九年）又跌十二個百分點，只有百分之十九受訪者表示滿意。

以慳電膽現金券來說，先撇開已多人論述的「利益輸送」或至少沒有申報利益的問題不談，單以節能來說，施政報告就沒有提及近年大力研發不含水銀、

技術飛躍而售價下調的LED環保燈，而仍然去推廣已落後的「慳電膽」，實屬對環保的無知。

慳電膽現金券的另一問題，是政府和兩電在沒有明確法例授權下，將並非免費的現金券強加給市民。市民為甚麼非要接受不可？家中早已全部換上慳電膽的住戶，也要接受加電費嗎？電費中其他非用於照明如冷氣機等耗電，也要捱貴了的電費乎？

慳電膽事件捱罵了十天。邱騰華胞弟涉嫌獲得活化工廈免補地價的先機，從而併購工廈改建酒店，也捱罵了。高鐵捱罵了。未對去年的任命副局政助作檢討，又再多任命兩名副局，也捱罵了。政府做甚麼事，無論是多麼小的一件事，似乎也做不好。高官動輒得咎，越被罵越沒有信心，越沒有信心，就越容易出錯。台灣的沈君山曾形容官員動輒得咎的狀態，稱之為「官不聊生」。現在的香港，正是處於官不聊生的政治局面。擴大政治任命本意説是要招攬社會人才，又説要培訓政治人才，結果新增副局都是現任或退休公務員。在官不聊生狀態下，稍為自珍羽毛的社會人才，有誰肯去當官？要當官也不會想到服務社會，而

是為了那可觀薪俸吧。

強政不起來的政府，官不聊生，動輒得咎，造成這種情勢，說到底是由於沒有落實雙普選、政府沒有認受性而立法會也認受性不足。慳電膽風波揭出後，有議員將煲呔與阿扁相提並論。若論涉利益輸送的程度，煲呔自不如阿扁遠甚。但說到掌政時的權力與認受性，煲呔是更不能與阿扁相比了。必須是人民投票選出來的領導人，才有認受性，有公信力，強政才強得起來，即使涉貪瀆，人民也心甘命抵，誰叫你把他選出來呢？下次不選他就是了。

只有人民真正作主，掌權者才能真正「為民」。否則，官不聊生之現象，不僅永無止境，而且還會每下愈況。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試為錢學森的最後一問作答

被稱為中國航天之父的錢學森逝世，備極哀榮，海內外對他一生貢獻，交相讚譽。內地媒體在介紹錢氏生平時，有提到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對前來探望他的溫家寶總理說，「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

每當海外華人取得科學成就的消息傳出，比如高錕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就會出現一些有關於中國大陸何以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評論。而錢學森本人，也包括錢

三強、錢偉長在內的「三錢」，都是在外國學術有成之後回國的。近二十多年出國留學的人不少，也有些頗有成就的，但大陸自己培養的頂尖人才，則不見有。

中國航天之父提出的問題真是太大。大到讓溫總理立刻約見了六位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提出錢老的問題。幾位校長的回答是：老師不行⋯⋯不是大學出問題，是基礎教育出毛病了⋯⋯。

各大學校長的回答顯然沒有點出癥結所在。實際上，正正是錢學森本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時的一些作為，就足以回答這問題。

《蘋果日報》論壇版刊登張成覺的文章，提到錢學森一九五八年分別在《人民日報》和《知識就是力量》上撰文，以科學論證的方式，宣稱糧食畝產幾萬斤是完全可能的。另外，網上又有網民貼出錢氏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論證一畝地可以生產一百六十萬斤蔬菜。

錢氏當年的文章，「科學」地論證了毛澤東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在哄抬、謊報、浮誇風吹颳下，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李銳在《反思大躍進》中，記述毛澤東說，他是「看了大科學家錢

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畝產萬斤的」。

錢學森逝後，他的這些舊賬被網民翻出來，許多人認為錢應為大躍進災害負一部份責任。然而，筆者想到的，是錢剛回國幾年，在那種革命熱氣騰騰，政治熱情鋪天蓋地的氛圍下，寫出並非他本行（他絕非農業專家）的「科學」文章，實際上是一個科學家被極權政治所擺佈的作為。他可能是奉命，可能是領會最高領導的意向，可能身不由己，總之他是在那種政治環境下失去了自我的獨立思考，以致插手到他不了解的知識領域。

專權政治之下，人會失去自我，因為個體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下是沒有價值的。人民，在掌權者眼中，只是一堆數字。

錢學森在一九五五年回國，當時美國軍方有將領說，「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他回國後，毛澤東對他說：「對我們來說，你比五個師的力量大多啦！」

結果，十一個美國戰俘，就換回了相當五個師的錢學森。用周恩來的話說，「太值了！」然而，對美國這個尊重個人價值的國家來說，每一個生命都是一個

世界。錢學森要去中國，十一個戰俘要回美國，這是對他們的自由意志的尊重，沒有數量上交換值不值的問題。正是這種對個人、對自由的價值觀，這種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人文精神，造就了獨特的創新力量、不斷冒出傑出的人才。

一九八五年，列根總統的科學顧問基沃思訪華，他對原科委主任宋健説，錢學森在美國工作二十年，對美國作出很大貢獻，當年美國在麥卡錫黑暗時期，對錢的橫加迫害是沒有道理的，我們感到很難過。

美國為當年迫害錢學森道歉了。別小看這句道歉，實際上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能力，一種願意承認做錯的能力，這也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一種表現。

內地網民有人認為錢學森應為一九五八年那幾篇也許害死許多人的文章道歉，但真正應該道歉的是掌權者，是執政黨。如果做出了這麼多的殘民禍事，一句道歉都沒有，只能說這是一個缺乏包容、扼殺自由精神的國土。中國現在老講「科學發展觀」，卻不知道科學精神之一是有錯必糾。沒有這種精神只能產生出技術人才，又怎能培養出真正傑出人才呢？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四日

「民主行頭，個黨第二」是重要原則

曾特首要遵從北京意旨，推出無路線圖的「翻叮零五年」政改方案，不但難以在立會過關，而且與零五年相比，那時他尚能獲較高民意支持，而現在，他的民望是「黃腫腳，不消蹄（提）」，不獲立會支持的方案，與社會反曾情緒滙合，將使曾政府陷入更大的掌政危機。

問題是，泛民若一致否決了特府的「翻叮零五方案」，泛民的下一步要採取甚麼行動。早前提出的五區補選變相公投，及接下來二十三名泛民議員總辭的爭普選策略，目前仍未獲泛民最大黨的民主黨接納。若沒有其他辦法，是否

就任由曾特首與中央宰割香港民意，繼續拖延為二零一七普選作擴大民主機制的準備？

五區補選肯定會涉及不少困難。民主黨可能要作出較大犧牲。筆者認為，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提出的「我哋要擺民主行頭，個黨第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代政治理念和民主政黨原則，值得仔細分析，以及所有從政人士好好咀嚼。

所謂「民主行頭，個黨第二」的意思，就是全黨所信奉所堅持的政治理念、價值觀要放在前面，是指導行為的優先準則，而黨的利益甚至黨的存廢，就放在後面。凡事都要先考慮政治理念、公義、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觀，而不是黨的利益。倘若把黨的利益放在前頭考慮，那麼坦白說，民主黨尤其是身兼支聯會常委的領導者，根本沒有資格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因為中共不為六四平反，正正是出於對黨的利益、黨的存亡的考慮，而罔顧真相與公義的。

眾所周知，任何政黨的組成，都是為實現一定的目標，基於共同的理念，要追求一個共同的理想，以此號召人們參加這政黨，以便共襄大事。然而，由於

人事糾葛，以及種種政治經濟利益的衝突，現實政治實行過程會不斷發生政黨利益牴觸政黨所信奉的理念以至牴觸公義的事。在這種情勢下，革命政黨往往就會為了黨的利益而放棄對政治理念以及公義的堅持。長此以往，革命黨就成了為黨利益實際上是為黨領導層利益而罔顧公義與理想的集團。這種變化與黑社會無疑，故有人稱「黨」這個字由「尚」「黑」組成，不無道理。

中共當年與國民黨鬥爭，也提出一堆民主、自由、法治的理想。這不是用來騙人的，因為在中共領導的邊區，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實現。中共的民主理想，當年吸引許多青年奔赴延安。然而，當政治現實出現了黨的利益與公義相牴觸，中共就把黨的利益放在前面，不斷放棄它原來信奉的政治理念。終於，今天談社會主義，談平等，談工人階級領導，談窮人翻身，談民主，都成了笑話。當黨的利益不斷放在前頭，黨也就成為徹頭徹尾的尚黑集團。

早前的甘乃威事件，民主黨曾考慮用重金掩蓋和擺平這事。這就是將黨的利益，尤其是黨中從政人

士的利益，置於公義之上的考慮。儘管這只是小事一椿，但這種考慮就是「個黨行頭，理念第二」的做法。雖然不成比例，但持這種做法的黨，實缺乏足夠的道德品格要求中共平反六四。

在海外反對中共的組織，不少都是這樣：把組織的利益放在公義、道德之上。為反共不惜造謠、揑造和誇大事實。他們用的是中共的鬥爭哲學：與狐狸鬥爭就要比狐狸更狡猾；中共說謊，我們為甚麼要那麼老實？但倘若你不是佔據道德高地，那麼你和你反對的對象又有甚麼差別呢？

民主政治成熟的西方國家眾政黨，「民主行頭，個黨第二」是不言而喻的。但在香港，因為對手一貫把黨的利益放在至高無上地位，那麼向它爭取民主的黨也就很難擺脫「黨第一」的考慮。難是難了，仍要堅持。因為理念先行、黨利益在後，是民主政黨的重要原則，應以此來思考所有政治議題，包括五區補選與總辭的議題。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七日

王維林以一人之力推倒柏林圍牆

（零九年）十一月九日，東德出生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波蘭前總統華里沙，步行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第一個開放的檢查站——博爾豪爾摩大橋，為慶祝柏林圍牆倒下二十周年揭開序幕。

柏林圍牆的倒塌，是一九八九年「蘇東波」中最具戲劇性與象徵性的歷史事件。它意味着冷戰結束，蘇聯東歐共產集團崩解，歐洲和平整合與歐洲政治景觀的改變，更重要的是：人類自由精神的壓倒勝利。

這一切的變化，自然與戈爾巴喬夫

推行改革路線、放鬆對東歐共產國家的控制有關，但轉變的開始則是波蘭六月四日的選舉。不錯，八九年六月四日，是天安門慘劇發生的那一天。六月五日早上，王維林以隻身擋住一整列坦克的畫面，因時差關係，在六月四日傳到波蘭。連日來對北京事態的電視報道，很可能在這一刻影響了波蘭的投票結果。

在蘇聯鬆手的情勢下，開明的波共領袖雅魯澤爾斯基於八九年二至四月與反對派的團結工會舉行圓桌會議，決定實行三權分立、總統制和議會兩院制，總統由兩院聯席會議選舉產生。原有的眾議院三分一議席自由選舉產生，三分二議席留給波共和它的盟友；新設的參議院實行自由選舉。執政黨控制着媒體，推出體育明星、電視名人、地方名人為候選人，形勢大好。選舉前幾天，波共中央委員會曾開會討論，如果團結工會連一個議席都拿不到，西方國家會有甚麼反應。團結工會自己最樂觀的估計也不會拿到超過二十個議席。

然而，六月四日的投票結果卻大出波共與團結工會意料之外。團結工會獲得參議院百分之九十九的議

席，在開放自由選舉的眾議院一百六十一個議席中，團結工會囊括全數。這是驚人的改變。

甚麼因素突然改變了波蘭選民投票意向？唯一解釋是王維林擋坦克畫面，六月四日在波蘭電視螢幕出現。

為免遭鎮壓的事情重演，華里沙說服反對派選舉雅魯澤爾斯基為總統，新總統委託團結工會組閣，由此而成立蘇聯集團中第一個非共黨政府。波蘭歷史掀開新篇章。這一結果促使蘇聯東歐國家的變革，捷克天鵝絨革命，羅馬尼亞壽西斯古被處決，蘇聯崩解……。而柏林圍牆的倒塌則是「蘇東波」的最重要標誌。

許多人都說，柏林圍牆是被戈爾巴喬夫、無數波蘭人和東德人推倒的。但就直接影響來說，柏林圍牆說不定是被王維林一人推倒的。他在長安街上所展示的向無情國家機器挑戰的良知和勇氣，激勵了全世界具良知和自由意志的人們，既然手上仍有改變自己命運的選票，或有聚集起來行動的能力，就不要遲疑，不要對改變的後果考慮太多，堅決以自己的意志作出選擇。

在八九年六月四日波蘭投票之前，波共中央書記喬塞克曾作比喻說：「我有一隻狗，名叫皮古希。皮古希病了，需要吃藥。皮古希就是波蘭，而我知道皮古希所需的藥就是民主。但是如果我們給皮古希注入的藥過多，皮古希不會好轉，而會一命嗚呼。」

六月四日前，波蘭許多人相信這段話。六月四日王維林擋坦克畫面出現，它告訴人們，掌握自己命運最重要，按自己的自由意志作選擇最重要。王維林有考慮他以卵擊石的行為對自己的後果嗎？

柏林圍牆倒塌二十年，有調查顯示，東歐前共黨集團國家，許多人對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發展不滿，也有不少人對民主失望。政治、經濟體制的巨大變遷，會使人們不適應。然而，我們不妨想想：若仍處身在極權政治控制下，任何對經濟、政治的不滿能表達出來嗎？人們有政治權利對不滿的現實作出改變嗎？

掌握自己的命運，做一個自由人，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太重要了。不要相信「皮古希這隻狗」那樣的鬼話。民主就是自己做主人，何須循序漸進！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北京現階段沒有讓步的能力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

無論在對美關係上，還是香港政改問題上，北京有無可能作出讓步，是當前最大的議論焦點。讓步並非軟弱。讓步是一種能力。政治需要妥協、折衝、務實、讓步。掌政者只有在內部掌握了充分權力，才有可能在對外關係上作出符合實際的讓步。

我們不喜歡獨裁政治。但在缺乏民主機制下，倘若不是個人獨掌權力，倘若有另一權力核心掣肘，那就不能在內政外交上作出務實而果斷的決策，而只會被意識形態所支配，只會教條，只會

左，只會貫徹國家主義。因為沒有充分掌權的人，不具備妥協、折衝樽俎的能力。

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突破中美關係，邀請美總統尼克遜訪華。那是因為他在文革中鬥倒了劉少奇，七一年又壓倒林彪奪得軍權。時在文革期間，誰敢與「美帝」勾結？只有掌絕對權力的人才敢於面對現實。

一九七六年鄧小平復出，起始他說只會在教育與科學領域發揮餘熱，但當華國鋒與文革勢力被他打退，他掌了絕對權力，於是就在七九年提出「改革開放」。倘若權力未固，他豈敢違背毛的「繼續革命」理論全力發展經濟？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江澤民與李鵬推行極左路線，對內要消滅個體戶，對外就視全世界國家為敵人。鄧小平以絕對權力，九二年南巡表示「誰不支持改革開放誰就下台」，又提出對外要「韜光養晦、決不當頭」，「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動」，還說要「夾着尾巴做人」。

中共建政六十年，實行較右的也是較為務實路線時，多是一人掌絕對權力之時；實行左的、教條的、

意識形態化路線時，多是權爭激烈，誰也掌握不到絕對權力之時。最左是文革，那是毛澤東向劉少奇奪權的運動。

中國今天因面臨第五代接班人的內部爭奪戰，而使江胡權爭激烈化。六十周年閱兵時江胡並排，尤其是《人民日報》頭版刊出江胡二人並列的大照片，更不顧國際觀瞻地使權爭表面化。

稍早時太子黨的薄熙來在他主政的重慶，大力推動「唱紅打黑」。唱紅，是力主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戲，宣傳毛語錄，還豎立一個三十七點四米高的毛澤東巨像。打黑就是打擊黑社會與勾結黑勢力的貪官。「用貪官、反貪官、殺貪官」是中國古代腐敗朝政的手腕。中共不僅用這招來鞏固權力及清除異己，更發展到「用黑社會、打黑社會」來鞏固權力和攫取民望。太子黨的唱紅打黑，更是要顯示他們繼承正統根正苗紅，故理應接班。

團派的李克強就在（零九年）九月底演出一場上井岡山看望老紅軍的戲碼。井岡山會師是一九二七年的事，那時的老紅軍還有甚麼人活着？廿一世紀的中

國人誰又會記得老紅軍？李克強上井岡山的訊息是：他們這些團派，雖不是太子黨，但也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繼承人，有資格可以做第五代領導核心。

緊跟江澤民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和中宣部長劉雲山，十一月就還以顏色，分別也來井岡山，顯示他們才最有資格繼承「革命傳統」。

唱紅打黑和爭相去井岡山，是中共權爭不息的連串鬧劇。在爭奪第五代接班人的形勢下，中央當政者只會人人鬥「左」，爭相表示繼承毛的革命傳統，堅持國家主義和革命教條，對一切務實的、向西方靠近及在普世價值前讓步的政策，誰也不敢提，提出來也會遭到狠批或失勢。因為，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這時都不在考慮之列，爭奪權力是中南海諸公的唯一考慮。

現階段，中共在政治上只會強硬和自大。對外交往如此，對香港政改問題也如此。要民主，香港人只有靠自己。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國特色的普選路線圖

政改諮詢方案以二零一七、二零二零普選方案超越今屆特區政府權限為由，拒絕提交普選路線圖。這是荒謬的托詞。任何政府都有一定任期，但都不會只作任期內的規劃，不會只做任期內可以完成的事。高鐵、西九、其他基建，有的甚至連啟動都不在今屆任期內，若下屆政府停止撥款或反對興建怎麼辦？是不是因超越了今屆政府任期，就停下來不去推動？更何況一七、二零的普選時間表已由人大敲定，也就是說，已有了一個目標，二零一二政改就必須向這個目標邁進，大幅增加市民參

與的普選成份乃必然之舉，不這樣做那麼一七、二零是否真正實行普選反而引人疑竇。未有普選時間表的零五年政改方案原地踏步還勉強說得過去，有了普選時間表的二零一二政改方案再原地踏步就怎麼也說不過去了。

二零一二年方案有沒有普選路線圖呢？輿論普遍認為沒有，但實際是有的。只不過並非普世公認及符合我們理解的普選路線圖，而是有中國特色的普選路線圖。

林瑞麟說，新增五個功能組別議席由區議員間選產生後，立會七十席就有六成由地區直選或間選產生，所以是一個民主進步的方案。全世界都知道，間選不是普選，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普及而平等的投票權利，而是可以操控的「選舉」。但按中國特色，以及林瑞麟解釋，這就是民主選舉。因此，這是邁向將來三十五個功能組別都由間選產生的中國特色「普選路線圖」。學者關信基甚至認為：「有可能連地區直選也透過類似間選產生。」

被問及是否要取消功能組別時，唐英年反問聽眾：《基本法》哪裏有說取消功能組別呀？不錯，《基

本法》確實沒有說要取消功能組別，不過《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說，從現在的選舉方式「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就不知何所指了。唐英年的說法並不新鮮，因為早有中國涉港高官說過，功能組別也是普選啦。

提高特首選舉的提名門檻，也是中國特色的普選方式。只要看看早前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如何稱道澳門的等額選特首就一清二楚了。

二零一二政改諮詢方案的普選路線圖已很清楚，就是間選即普選，保留功能組別即普選，特首提名全在中央掌控之內就是普選。

且撇開人人應有平等的政治權利這個基本人權不談，這種中國特色的選舉體制施行於香港這一制，行不行得通呢？從回歸以來，尤其近幾年施政情況來看，實在是問題重重。香港的成功在於機會的平等。而要保持機會平等，防止政治特權，在於制衡。再英明的政府，也不可能做甚麼事都對，因此，立法機關的制衡很重要。現在政府在立法會提出的任何法案，在功能組別為主的保皇派護航下保證一定通過；政府做錯了事，議員提出的指摘議案，就一定被分組點

票否決，於是，政府有錯不能糾。議員自然也有對有錯，在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下，議員表現不佳，在下次選舉中就會被選民唾棄。但現在大部份的功能組別議員，不論表現如何，不管選民怎麼不滿，他們都能確保自己的萬年議席。

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有錯不能糾，是近幾年政府失誤越來越多，以及引起市民對官商勾結越多質疑的原因；也是市民對立法會的評分趨下的原因。缺乏新聞自由的澳門，市民惟有啞忍。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國際城市，言論自由至為重要。立法無力，輿情洶湧，政府成了動輒得咎的弱勢政府，別說強政勵治，就算是行政主導也在輿情下顯得有氣無力。

政改諮詢提出的中國特色普選路線圖，看來是北京的想法多於是特區政府的主意。為免使香港這一制步向沉淪，市民需要直接參與。目前看來，除了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之外，沒有別的路。公投未必有效，但至少是市民全體參與表達意向的一個手段。每一個市民都應藉此向中國當局和全世界表示，在挽救香港沉淪的過程中，你沒有缺席。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籲請泛民以鋼鐵團隊參與總辭公投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焦點是公投，而不是補選。儘管名義上是五區總辭和補選，但實質上是公投。因此，不能以選舉工程的勝負角度去看這個行動，而應以公投成敗的角度去觀其意義與成效。

首先，為甚麼要進行這次公投？

一、爭取實現真正普選，既是普世價值，又是香港市民逾二十年不斷致力的目標，現在已到了關鍵時刻。二、普選已不僅是理想，而且是現實的需要。近幾年政府施政頻頻錯失，立法會振作乏力，其根源在於體制：行政長官的認

受性太低，立法會對政府無力制衡，而立法會大部份功能組別議員表現差劣，卻能連選連任兼自動當選。換言之，《中英聯合聲明》定下的「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這個體制未能建立。任由政府犯錯和任由議員差劣的體制若延續甚或擴大其弊端，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將會步向沉淪。因此，政治現實已到了不能不改變體制的時候了。三、中央已定下一七、二零的普選時間表，而政府的二零一二政改諮詢則顯示，中央及港府擬想中的普選是假普選，不但擴大立會的功能組別，而且提高了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政改諮詢提出的路線圖是一國兩制中大陸那一制的路線圖，而不是香港這一制的真普選路線圖。面對假普選的設計，香港人不能不強烈表態。四、種種爭普選的行動，當然都有意義，但縱使一百萬人參加元旦遊行，北京和港府仍可以說相對七百萬市民是少數。惟有公投才是最有力且無法扭曲的市民意向表達。

其次，變相公投是否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北京反對《中英聯合聲明》進行公投，因為它認為香港人在中英交易中不應有角色；北京也反對將《基本法》交港人公投，因為它認為這是「一國」的主權。這些，我們都不去質疑。但現時要進行的變相公投，不是就《聯合聲明》、《基本法》甚至香港獨立公投，而是就政府提出的路線圖是否符合《基本法》進行公投。《基本法》規定要達致雙普選的目標，而《基本法》確認的兩個國際人權合約中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廿五條訂明「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須使每一個公民都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權；公約的第二條訂明所有公民不分種族、宗教、財產、政治及其他見解，享有公約的一切平等權利。倘若未有普選，公約中有關選舉的規定尚勉強可以豁免。現有了一七、二零普選，而政府政改方案所提供的普選路線圖卻違背《基本法》的上述原則。這就需要香港人作一次大規模的「護法」行動。公投不是偏離《基本法》，而是要確認《基本法》的原則。

其三，聚焦公投的總辭、補選應怎樣推行？

變相公投是極為莊嚴的事，所有關心政制前景

的人士，都應積極參與，長期為香港爭民主的鬥士，更應排除個人與政黨的政治利益考慮，聚焦民主與公投。

五位總辭議員，和五位將參與補選的人士，都是在這個關鍵時刻願意作出犧牲的民主典範。因此，筆者呼籲，五區總辭須包括泛民三大黨的主席，即何俊仁、余若薇、黃毓民，他們須以自己的典範，表示願為民主作奉獻與犧牲。其他如民協馮檢基願參與，也應歡迎。

參與補選的五位，筆者籲請已退出議會的民主派元老再投身參選，包括兩位《基本法》起草委員、民主黨創黨元老李柱銘、司徒華，被譽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包括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既然建制派已退出議會的陳婉嫻都可能參選，泛民中已退出議會的人士也不必太執着，何況參選的目的不是要重返議會。

五位辭職的議員，不是真退，只是暫時退出議會兩年，二零一二年一定挾更大的民主聲望重來。五位參選的人士，也不是真的要做議員，他們可明確承

諾，在玉成這個公投大業後，二零一二年必全身而退。

十人組成鋼鐵團隊，可發表宣言，可共同出席在每一個選區舉行的造勢大會。他們的宣言，盼能像馬丁•路德•金的講話一樣，喚醒已因彈性疲乏而放棄追求民主的市民。鋼鐵團隊很可能掀起市民投票熱潮。筆者期待，這將拉高補選投票率，而鋼鐵團隊也會高票獲勝。

除非筆者的籲請太天真，否則這會是可令總辭公投逆轉勝之道。要相信鋼鐵團隊的號召力，和市民的醒覺。這是一場許勝不許敗的公投大戰。一億五千萬公帑用於選舉，可能太多，但用於公投就算少了。

面對鋼鐵團隊，建制派的可能策略是不派人參選。那麼泛民就可以派五個小角色來陪跑。無論如何，一定要讓全港市民，有一個憑公投表達真普選意向的機會。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北京全力在港推動中國特色的「普選」

一九九九年台灣大地震，其後中國地震專家赴台參加「兩岸地震交流與合作學術研討會」。據中國《兩岸關係》雜誌二零零零年三月號報道，大陸代表團在會上宣讀論文，談到地震是「可預測」的，其中地震局原副局長、地震專家何永年說：「大陸地震學者有關地震預測的研究，包括海城……等實例，引起了台灣學者的極大興趣。原先，不少台灣學者認為地震是不可能預測的，現在他們也改變了觀念並開始探索這一領域。」

同一位何永年，到了二零零八年汶川地震發生後，就在香港《紫荊》上撰文

題為《地震預報仍是巨大科學難題》，文中說：「由於人類對地球認識差得太遠，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辦法對地下的物質、結構、狀態及其變化運動的規律獲得真切了解。」

台灣發生地震，中國地震專家在台灣表示「地震可預測」；到了中國大陸發生地震，同一個地震專家就認為「地震不可預測」了。

學術，在中國專權政治下，與新聞報道一樣，都是政治工具。中國沒有獨立的學術研究，沒有能提出與中共主旋律有異的獨立學術見解。何永年如此，大科學家錢學森也如此。自然科學尚且要當政治奴才，人文科學就更不在話下了。敢提出有異於當前中共政治主張的學者、作家，都被當局視為要監控的異見人士。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說，普選可以和功能組別並存，普選不代表一定是一人一票的直選。這是他獨立思考的學術意見嗎？當然不是。不用說，這正是中央的意向。早些時候，北京清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程潔說，零三年後，中央已改變「河水不犯井水」態度，積極參與香港政治了。這當然也不是她個人意見。

官方人士，這一年多來的言論，取向就更清楚

了。去年（零八年）七月，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港，提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構要互相了解、互相支持」。這一見解在不久前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的公開發言中再獲強調，他高度評價澳門的行政、立法、司法相互配合的體制。這顯然想要扼殺香港賴以保持法治現狀的司法獨立。

去年，中聯辦研究部的曹二寶，提出從事香港工作的內地幹部，在香港組成「第二支管治隊伍」，今年（零九年）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在北京提到與港府達成「十點協議」，讓港區政協插手香港事務。今年三月和九月，政協主席賈慶林和國家主席胡錦濤都提到要「支援港澳委員在香港澳門社會政治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還讚揚澳門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強調了「它的穩定性」。

所有這一切，都顯示自零七年中央提出普選時間表之後，中央的意向就是要在香港建立一個中國特色的普選，這普選的立法會部份是繼續維持功能組別、並非每一個人有平等政治權利的普選，普選的行政長官部份就是經中央篩選候選人、在中央授意之下的幾乎只能像澳門那樣市民沒有選擇權的「普選」。這樣產

生的行政長官，須配合中共派駐香港的「第二支管治隊伍」。立法、司法也要與這「第二支管治隊伍」相配合。至於《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嘛，可以不必理會了。

中共為甚麼在這一年多來，要不顧《基本法》，不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汲汲於以大陸那一制強加於香港這一制呢？原因之一，是普選已不能再拖，必須以中國方式去徹底解決香港普選問題；二，是中國經濟起飛，為香港確立中國特色的普選提供了「機遇」。中共建政六十年來，它的政經規律是：經濟繁榮＋政治自由＝一個常數。也就是說，當經濟失敗了，瀕於崩潰了，它對公民的自由就放鬆一點；而當經濟好景了，繁榮了，它對公民自由就收緊一點。前者可稱之為「不見棺材不流淚」，後者可稱為「一闊臉就變」。這兩種輪番出現的心態，其實也是國民相當普遍的心態。

面對這種河水公然干犯井水而特區政府則曲意奉承的形勢，香港實際上比零三年廿三條立法前的危機更深重得多。泛民必須推出全部籌碼爭一七、二零真普選，市民也應動員起來，不遺餘力地出錢出力予以支持。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日

把市民應有的決定權，變相給予市民

黃毓民今天（零九年十二月九日）將在立法會提出「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議案，在分組點票及民主黨傾向投棄權票的形勢下，不大可能獲通過了。但聲勢已逐漸上升。另外，公民黨黨魁余若薇今天在《蘋果日報》論壇版發表專文，闡述公民黨參與總辭公投的立場和道理。總辭公投看來勢在必行。而市民對總辭公投的認知度，恐怕也淩駕於對政改諮詢方案的認知度。

泛民中反對總辭公投的意見，歸納起來有三點：一、變相公投不是憲制中的公投，而只是補選。二、五區總辭

後，補選的得與失：若泛民五區全勝，中央與特區政府也不會承認這是公投的結果，故不構成必須依從的壓力；若稍有閃失，比如失去一兩席，那麼在立會中就守不住對政改方案的三分一否決票數。得無所得，失卻全失，機會與成本不成比例。三、目前應聚焦政改方案，全力反對，而不要分散注意力在不切實際的公投上面。

變相公投當然不是憲制上明確的公投。但香港憲制沒有公投之設置，而中央也明顯不允許香港公投。因此，現在不是在公投或變相公投之間選擇，而是在要搞變相公投還是放棄這一手段之間選擇。當前形勢是，中央定下了二零一七、二零二零這兩個實現普選的時間表，但京官和內地御用學者卻一再曲解普選的國際定義，說設置功能組別也是「普選」，說「普選不代表一人一票的直選」，譚惠珠更說何謂「普選」要由中央定義。因此，現在是處於一七、二零是真普選還是假普選的關鍵時刻。這個時刻絕對需要全體市民以投票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意願：要真正的政治權利，還是覺得這政治權利可有可無、甚或虛假的也可接受。

這不是爭取普選的公投。因為普選時間中央說已經有了。如果公投聚焦在二零一二雙普選，相信多數市民從實際出發覺得不可能。但若聚焦在真普選的一人一票的定義，則相信絕大多數市民都會支持。

公投以補選形式舉行，實非得已。但泛民若全力推動，市民必會理解這是公投而不是補選。

即使泛民五區全勝，中央和特區政府也不會承認這是公投的結果，這一點毋庸說。但泛民在立會中以二十三席之力否決政改方案，同樣不會改變中央的假普選意向。否決結果不外是二零一二原地踏步。也許原地踏步也比新方案稍好，但實際上是相差無幾。泛民發動遊行的作用已不大，因為香港市民已對政改議題疲乏了，泛民要不出甚麼新花招，形勢只會越來越對爭取真普選不利。

泛民在總辭公投中，得與失其實對中央銳意推假普選都起不了阻歇作用。但總辭公投喚起民眾對中央玩弄假普選的關注，以選票表達對真普選的意向，這是泛民以「變相」的方式給予市民公投的政治權利。這一政治權利的實施，對香港、對內地，都會有很大的

啟示作用。國際輿論會予以足夠關注。香港特府也會在日後不斷承受變相公投所產生的壓力。

當然，如果泛民在變相公投中輸了，那麼這也是香港市民的選擇。但若泛民以筆者所籲請的鋼鐵團隊參與總辭公投，則不大可能輸。

孔子有「義命分立」的論斷。命是成敗得失，「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人受客觀條件限制，行與廢都是有限的。但人有可以自己決定的層面，這就是指是非對錯的「義」。儒家肯定人有「義」的領域，而且應把是非對錯放在成敗得失之前去考慮。這是我們支持總辭公投的主要原因：它把市民應有的決定權，變相給予市民。

至於誰會因此而搶佔道德高地，在大是大非面前，難道還應計較嗎？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

市民應奮起捍衛《基本法》

《基本法》的條文，和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的獨立司法權，正受到粗暴踐踏。現在是香港人應奮起捍衛《基本法》的時候了。

自回歸以來，儘管輿論對特區政府的施政有許多批評，儘管港府種種大計劃不是無疾而終就是施政一團糟，儘管政商界紛紛「忽然愛國」而傳媒也大部份作自我審查，但大部份國際傳媒仍認為香港「保持了原貌」，絕大部份市民縱使對政府有許多怨言但基本上不認為在香港生活與回歸前有甚麼不同。

原因是甚麼？答案很簡單，就是因

為香港有一部維護香港原貌的《基本法》，這部《基本法》保障了香港人的自由、人權。但光有《基本法》還不夠，中國的憲法不是也明載着人民有言論自由、遊行集會自由嗎？所以更重要的是司法獨立。《基本法》明確香港有獨立司法權，而香港法院在十二年裏也依據《基本法》判案，並對自治範圍內的《基本法》條文作解釋。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香港終院大法官李國能在判詞中說：「與其他憲法一樣，與《基本法》不符的法律是無效的。……出現可能不符或無效的問題時，特區法院可以審理。因此，特區法院根據《基本法》條文，可以決定人大或人大常委會的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

根據法律條文而不是根據行政、立法機關的意旨判案，是獨立司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社會的基礎。但對人治的中共當局來說，卻是彌天大罪，以致人大常委以釋法來否定了終院關於居港權的判決。

但香港大法官們其後仍執着於對法律的忠誠，無怨無悔地依據《基本法》條文審理所有條件。在一系列案件中，包括最近就「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的解釋，

和關於民間電台案的判決，都維護了立法會的制衡權力和市民表達自由的權利……。

一部保障市民人權的《基本法》，一個公正地以法律條文及案例去審案的獨立的法院，構成香港人最根本的法律權利，是香港能保持原貌的關鍵。

公正、平等的法律權利，為社會提供了平等的機會。社會主義追求分配的平等，其實施結果是「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法治社會追求的是機會的平等，只有機會平等才能彰顯公義和促進人的自由發揮和帶來社會進步。

但這個能讓香港「保持原貌」的基礎，近年卻頻頻遭到踐踏。北京清華大學副教授程潔撰文說，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後，中央已改變「河水不犯井水」態度，積極插手《基本法》定下的高度自治。賈慶林、曹二寶、黎桂康表達北京透過「第二支管治隊伍」及港區政協插手香港事務的意圖。更嚴重的，是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零八年訪港，提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構要互相支持」。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高度評價澳門行政、立法、司法相互配合的體制。若司

法配合行政判案，那麼《基本法》規定的獨立司法權就變成中國特色的司法了。

多年來港人爭取普選。沒有普選我們還可以力爭，但現在中央定出了二零一七、二零二零兩個普選時間表，卻把普選解釋為「普及但不平等」的選舉，京官及內地學者一再明示要保留功能組別，《基本法》委員說普選要由中央定義。香港政治制度在《基本法》中有明確規定，但京官和香港跟屁蟲說中央有權改變政制。《基本法》受挑戰，香港的司法獨立受挑戰，市民的法律權利將不保，這比廿三條單一立法更可怕。香港社會的機會平等處於危險境地，這一切將由「普及但不平等」的所謂普選開始。

香港法律界十九名選舉委員會委員於（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表聯署聲明，指出「普選不能包括功能界別」，又指一人一票是《基本法》所含人權公約中對「普及而平等選舉」的規定。

捍衛真普選，不僅是普選而已，它是一場捍衛《基本法》、捍衛香港人法律權利、捍衛機會平等的戰役，關乎香港最根本的價值——法治的存亡。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這不是一個快樂的聖誕節

「這不會是一個快樂的聖誕節！香港這麼少人關心劉曉波。」這是筆者在（零九年）聖誕前夕收到一位朋友的簡訊，她是港府前高官，一位長期關懷國事港事的人。

筆者以那一天《蘋果日報》的頭條標題覆她：「十五國政府挺劉曉波」，並加了一句：「香港人已漸與世界文明脫節」。她再回我：「正是如此，澳門化！」

昨天（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曉波案宣判。宣判前，支持《零八憲章》的內地維權人士，最壞的估計也只是判刑三、五年，因為《零八憲章》所提出來

的政改建議，若不是中國憲法中已有的條文，就是毛澤東、周恩來過去的言論或中共機關報在建政前的社論曾主張過的東西，而且都很溫和，對中共的改革開放也有些肯定。然而，重判了十一年。

聖誕前夕，香港有八萬人擠爆了首日「亞洲遊戲展」。於是，筆者想到那位朋友的簡訊重點，是對香港「澳門化」的慨嘆。

廿五年前（八四年），中英剛簽訂《聯合聲明》，筆者那時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繁榮安定腐化順從的香港》。文章著重分析在中國領導人意念中，九七後的香港，應是怎樣的一個圖景。

「繁榮安定」，是中共說個不停的對九七後的期待。但繁榮的一個副產品，就是享樂，享樂到放縱程度，就是腐化與墮落。當時中共談九七，最常說的是「馬照跑，舞照跳」，尖東某豪華夜總會開幕，中共駐港大員親臨剪綵。「資本主義的腐化」是中共領導人對香港這一制的主要見識。「安定」也有一個副產品，就是「順從」，安安份份當順民，而不能有任何抗爭活動，甚至連輿論都不要有異議聲音，尤其是針對「一

國」(中共專權政治)的尖刻批評。順從的條件包括接近「一黨專政」的行政主導，不能有獨立的立法與司法對行政的制衡。一旦三權分立，行政就不可為所欲為了。任何抗爭和制衡，在專權者眼中，都是有礙安定的行為。

《聯合聲明》簽署後，有一次筆者在與中共主其事的魯平晤談中，魯平說，《聯合聲明》附件一，中國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並非中英兩國協議的結果，而全部是中方提出來的。於是筆者就問他，包括「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這一條也是中方提出來的嗎？魯平就閃爍其詞地說，當然也不是都那麼具體。實際上，從中共歷來言詞及其後表現來看，這一條肯定是在英方力爭之下，中方心不甘情不願地定下去的。

其後，在《基本法》制訂過程中，以及在回歸後中共的對港政策中，都力阻立法制衡行政的這一條落實。不惜違反《基本法》，不惜釋法，極力維護功能組別，堅持分組點票，拖延普選，目的就是要在一黨專政的中央掌控下，貫徹在香港的行政主導。力阻立法

制衡之外，還意圖削去香港的獨立司法權，要三權配合，以便如大陸似的，讓香港成為「繁榮安定腐化順從」的香港。

澳門回歸遲了兩年，但澳門迅速實現了中共的期待，於是在回歸十年時，受到從港澳辦副主任，到人大委員長以至國家主席的盛讚。言下之意是：香港人也識相點，學澳門吧。

澳門回歸十年，經濟成長極快。原因之一是開放了賭權，引入競爭，原因之二是這十年大陸貪污的蓬勃發展，源源不絕的內地大款到澳門賭錢洗錢。澳門的腐化墮落順從，與中國大陸的政治腐敗、經濟發展相配合。有良心的審計長蔡美莉在換屆時下台了；大貪污犯歐文龍，最先還是由香港廉署揭發的。

小小的香港，能頂得住龐大中國的專權政治與腐化侵蝕的壓力乎？筆者對此並不樂觀，儘管不樂觀並不等於不積極，不等於放棄對普世價值的堅持。看到大陸不少人在法院外為劉曉波案抗爭，仍享有自由的香港人能夠無動於衷嗎？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國香港，變亦變，不變亦變

新聞出版總署前署長杜導正出版回憶錄，披露趙紫陽曾說過，中國非走民主政治改革這條路不可，中共「主動改革，社會進步；被動改革，可能導致革命」。

趙還說，實行民主政治是世界大趨勢，中共「不想走這條路，抵抗這條路」，結果只好「內部加緊控制，外鬆內緊，想頂住民主大潮，但又頂不住，且戰且退」，「這麼下去，自然是很危險」。

這使筆者想起一百一十四年前（一八九六年）梁啟超發表的《變法通議》，他說：「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

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所敢言矣。」

梁啟超這段話，當年十分激勵人心。他說的「法」，是君主立憲，實現「民為政之世」，使「人人有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人人自主之權」，即民主人權。這是天下大勢。「以一人（或一黨）而奪眾人之權」的體制總要變。「變而變」，是主動求變；「不變而變」，是被迫不得不變，也就是官逼民反，或叫起義，或叫革命。那時堅持不變的當權者就只能讓人「束縛之馳驟之」了。

可惜，當時滿清皇朝不願「變而變」，終導致革命的「不變而變」。中華民族又經歷了百多年，現在又到「變而變」或「不變而變」的循環了。趙紫陽的話，正是為了挽救中共而提出來的「變而變」的忠言。但因「變而變」損及當權者既有利益與權勢，因此儘管一九八零年鄧小平已提出了全面的「變而變」的政治改革，卻因觸及特權階層利益而收回。趙紫陽任總書記

時，亦對政治改革作研究並於一九八七年十三大提出一些方案（見吳國光記錄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但六四後不但無疾而終而且政治上更趨保守。

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特權階層的腐敗，已全國氾濫，其無恥、骯髒、公開及與民為敵的程度，遠超過滿清與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期了。三年前（零七年），作家沙葉新寫了一篇鴻文，題目是《「腐敗」文化，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以種種事實與數字，提出中國大陸的腐敗已經集團化、部門化、市場化和黑幫化了。他親耳聽到贛州城外一個攤販憤憤地說：「現在就缺陳勝吳廣了。」

我們都不願見到中國再來一次「不變而變」、以暴易暴的革命浩劫。百年來的革命，證明無法帶來民主政治。「不變而變」的結果，實際上實現的是浩劫後仍然「不變」。然而，每年數以萬計增加的群體抗爭事件，楊佳被視為英雄，鄧玉嬌受到各地民眾支持，都說明人民因走投無路而產生的暴戾之氣正在上升和蔓延。也就是說，「不變而變」的氛圍在擴展中。

另一方面，要求開創民主政治，實施憲政大法

「變而變」的《零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卻被判刑十一年。

香港保安局長李少光說他看不見已上載互聯網人人可見的公安越境拉人，而警方卻看見了香港所有媒體鏡頭都看不見的陳巧文襲警。這說明香港已在政治上回歸中國的墮落了。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香港自然也不應獨享安全。但百多年來香港都有救中國的傳統。因此今天，儘管當權者已選擇了「不變而變」之路，我們是不是仍可以推動「變而變」的和平改革呢？積極參與總辭公投，是香港「變而變」的選擇。為了中國的前途，為了中國的和平政治改革，中國當權者又何妨容許香港作一個「變而變」的試點呢？香港公投，香港真普選，不過是實現百多年前梁啟超的「變法」，也不過是實現中共延安時期提出的民主理念，更不外是「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而已。一變而通，則可解香港體制的窘迫。中國大陸，也可以看到一條「變而變」的出路。

望中共當權者思之。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三日

走出無法實現真普選的怪圈

假若香港市民大都相信中央零七年承諾二零一七年和二零二零年可以實現雙普選，是真心誠意的，是確實會履行的普選時間表，而不是在「可以」中還包括「不可以」的意涵在內；假若大部份市民也相信曾特首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信誓旦旦地說，「普選，當然是真普選，沒有所謂的『假普選』這回事。」那麼，我們應看到，現體制中有一個無法走向真普選的怪圈，這怪圈就是功能組別議席的存在。

真普選的含義，在國際人權公約中是清晰的，即一人一票的普及而平等的

選舉，功能組別的存在，涉及一人兩票或多票的不平等現象，不符合真普選的定義。就邏輯來說，《基本法》既稱「最終達至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那就意味原有的功能組別的存在並非普選，因此才需要予以改變。再從現實政治的實施來看，功能組別二十四席是少於五萬選民選出來的，其中有些更是無競爭對手地自動當選。功能組別的許多議員或是三點不露，或是多年不提一個質詢或動議，只為政府提案當舉手機器。他們的表現及缺乏民意代表性，完全放棄制衡政府的立會功能，在高鐵事件中已非常清楚。

因此，不廢除功能組別，就不可能有真普選。然而，《基本法》又規定，任何改變行政長官或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的修改，都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立法會有半數議席是功能組別議員，其中大部份是由行業的利益集團壟斷的席位。他們會同意通過一個廢除他們政治特權的法案嗎？不要做夢了，世界上是沒有任何擁有權力的人會自己同意而不是被迫放棄權力的，更何況是政治特權。若他們不同意，廢除

功能組別的政改提案，即使由政府提出亦不能通過，於是真普選也就無法實現。

要實行真普選，就要廢除功能組別，而廢除功能組別，就要由三分二立會多數通過；立會中有半數是功能組別議席，必力阻廢除他們特權的法案，於是這一政制設計就形成一個無法實現真普選的政治怪圈。

怎樣走出這個無法實現真普選的怪圈呢？一是修改《基本法》，政改方案毋須三分二立會多數通過。這樣的改法改制，會動搖人們對一國兩制信心。另一有效辦法是就「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實行全民公投。公投不同民調，民調是測試民意供當政者參考，公投卻是公民權力的行使。如公投結果是要廢除功能組別的話，功能組別議員不可能投票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法案。

公投本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事。許多國家的地方政府（如台灣的澎湖、美國的加州）都就地方事務進行公投。《基本法》雖沒有定下公投創制，但並不表示不能就香港內部事務進行公投。不過由於中央及港府反對公投，那麼泛民發動的五區總辭再補選，由於議題單

一，也完全可以視之為「變相公投」。

變相公投，實在是要使香港走出不可能實現真普選這個怪圈的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中央及港府若真心要實現真普選，那麼應支持這個有助走出怪圈的變相公投。否則，很難說他們說的真普選，不是要港人在怪圈中打轉的陷阱。

因泛民內的爭議，總辭公投最終沒有採納筆者曾建議的以鋼鐵團隊參與，在勝算上不能不讓人憂慮。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參與總辭與補選的議員、候選人的個人聲望不足，更可以凸顯這次的補選絕非取決於個人的民意支持度，而是取決於議題。議題很清楚：「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支持或反對這一議題的選民，一定要來投票。覺得香港有無普選，與自己無關，願意把命運交給別人宰制的，可以不必投票。不喜歡某一候選人的，可以在二零一二年選立會議員時不選他，但這一次仍請來就議題投下一票——關乎自己和下一代能否自主的一票，也是幫助宣稱要實現真普選的中央與特府走出怪圈的一票。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摒除文字障，看公投本質

一九五一年美國有著名的丹尼斯案。丹尼斯（Eugene Dennis）被控組織共產黨，鼓吹武力推翻美國政府。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因為共產黨是一個有紀律有組織的集團，被告鼓吹盡速以武力推翻政府，會產生「明顯而立刻的危險」。因此，被告的言論不在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範圍之內。但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持反對意見，他指出，美國共產黨的力量非常有限，在警察、軍隊等關鍵性行業裏，它們的勢力微不足道，不具備真的危害政府和社會的力量。丹尼斯案後，美國政府遂進

入麥加錫的白色恐怖時代，經過幾年災難，美國人終醒覺，道格拉斯大法官的意見才是對的。

這個發生在將近六十年前的美國案例，足以說明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語言文字即使涉及暴力，尚須看與這文字相應的行動是否有暴力成份，才可予以「定性」。曾有哲學家把一些文字禁忌稱之為「文字障」。中國人似乎特別容易受文字障所擺佈。

五區公投用了「全民起義」的宣傳口號，就中國的文字障而言，確有不妥。因為不論怎樣從辭書或由專家去解釋，就一般人所理解的含義來說，「起義」確有不惜流血革命推翻現政權的意思。但如果我們摒除了文字障，稍稍了解一下與這宣傳口號相應的行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哪裏有任何流血革命的成份？別說發起這行動的公社兩黨手無寸鐵而且在社會上的力量微薄，而總辭補選本身也是在現體制之內的合法行動。簡單來說，就是透過現行體制可以容許的方式，尋求一次讓香港全民表達數量化意向的機會。

不過，「起義」這個文字障，卻似乎給左派和左派傳媒提供了彈藥，出現了鋪天蓋地對「總辭公投」的渾罵。一些持平的輿論也批評公社兩黨的口號授人

以柄，認為難以取得市民認同。然而，難道市民真的受文字障所惑而不會去看清楚事實嗎？即使是民建聯所作的調查，受訪者也有百分之四十五點二六不認為「起義」等同鼓吹港獨，稍多於認同的百分之四十三點一二。儘管有五成受訪者認為「公投」會激起社會矛盾，七成認為會對香港與中央關係構成負面影響。但這個急就章的問卷，受訪者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年齡在五十歲以上，遠高出這年齡層佔人口四成的比例，而八十後只佔受訪者人數的一成三。受訪人數又低於民調的五百人門檻，只有三百二十七位市民。問卷設計更有引導成份，比如「（公投）行動是否浪費公帑？」就不是中立的問題。

自由黨在田北辰已派出十萬張傳單後，因「起義」這個詞就宣佈棄選，這已經令人詫異。民建聯急急推出一個不成熟的民調，無非也是為宣佈棄選找下台階。

在建制派不派人參選、缺乏兩陣對壘的情況下，一些輿論估計投票氣氛會冷淡。認為若投票率偏低，就失去「公投」的意義。

這是在北京指揮棒下香港左派的如意算盤。但情

況是會變的。倘若無對手參選的話，公社兩黨仍可以製造反面參選者，使市民有一個支持或反對實現真普選的投票選擇。沒有建制派的參選，其實更可以凸顯這不是「補選」，而是以「補選」為名實現的真正「公投」。

公投，是因為在現時立法會的組成及投票機制下，不可能實現真普選，因此無法不把決定真普選的權力直接交給市民。「總辭補選」則因為目前的體制中沒有公投複決法例，故不得不以「總辭補選」這個辦法來實現。地方政府也有公投，故公投根本不涉國家主權，更非獨立。市民不可能不會逐漸明白這個意義，不可能不知道這次投票是要行使他們的權利。筆者相信，在沒有建制派參選之下，願意為公投而投票的市民會逐漸多起來。

「起義」是公社兩黨的不智用語。但這用語引來的狂轟濫炸，卻會使市民清醒地看到一些奴才的嘴臉，也會摒除文字障去認清事情的本質：這是公社兩黨藉自我犧牲而為市民爭取的一次公決的機會，每一個選民都不應放棄。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

扭曲孔子迎合時潮令人痛心的電影

電影《孔子》中弟子顏回勸孔子：「您曾經跟我們說過，如果人不能改變世界，那應該改變自己內心。」

在觀影時聽到這句話，心中像受到猛然一擊。這是藉孔顏之口，對筆者堅持數十年的人生價值的否定。

對改編歷史或名著的電影，筆者一向抱寬容的態度，無論改得如何離譜，也想到電影要面對廣大觀眾，編導自有為難處。只是，《孔子》中的這段話把孔子為人與思想如此扭曲，實在太難容忍了。翻遍《論語》與史書上對孔子的記載，不但沒有這句話，而且全部是與這句話的觀念相反的。孔子的一生，就是

堅持自己的理念與信念，即使不能改變世界，個人的堅持仍不動搖。他說「士志於道」，「朝聞道，夕死可矣」，又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現實的政治、利益、權勢，孔孟是決不攀附的，所以孟子說：「見大人則藐之，無視其巍巍然」。何謂大丈夫，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因此，「道」，即孔子內心世界的理念，是不可能因為不被外在世界接受就改變放棄的。其實不僅儒家如此，而且先秦諸子均如此，要不然，秦始皇怎麼會焚書坑儒呢？就因為先秦諸子都有堅持，而不會屈從權勢。而後世儘管中國實行專制政治二千多年，仍有不少讀書人秉持儒家的風骨，對皇帝犯顏直諫。不論怎樣黑暗的時代，這種儒家風骨都對專權政治發揮一定的制衡作用。

電影《孔子》這段硬栽在孔聖顏聖口中的話，是對孔儒的最徹底背叛，它反映當前中國社會為私利、為迎合權勢而不惜改變自己、扭曲自己、否定自己既有價值觀的趨炎附勢的潮流。可說是利用孔子來反孔，毀掉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堅守仁義的價值

觀，不能不令人有錐心之痛。

電影《孔子》截取的是孔子五十一歲後從政、失意而周遊列國，最後歸（魯）國講學終老的人生片段。主題的歸國愛國迎合當前主旋律。但孔子從政，目的不是愛國，而是要貫徹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被魯國的現實政治接受，他就周遊列國去尋找可以貫徹理想的他國，而不是改變自己的理念去愛國去遷就權勢。但在電影中，卻是相反的取向，強調孔子總想為掌權者所用，到處碰壁，因而成為「喪家犬」。

甚麼是孔子的從政理想呢？《論語•顏淵第十二》有一段話：「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前輩大儒徐復觀認為，孔子論政，都是針對統治者說的。「去兵」是去「兵役」「力役」；「去食」是指「去食政」，即「去賦稅財政」。而《論語》上的「信」，可分兩大類，一是就士的操持上講的，一是就政治上講的。「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他引孔安國（西漢人，孔子第十一世孫）的注稱：「自古人皆有死，死

而君德無所可譏，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意思是統治者與常人一樣是會死的，只有立信於民，才可以使人民不會忘記，雖死猶生。

從上引《論語》原文中，可以看到，孔子認為政事三環節，是力役、財政與立信。這三者中最重要的是立信。「民無信不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

電影《孔子》講孔子從政，卻完全沒有提到他政治思想的這個核心，因為中共的「民信」已不復存在。六十年政治反覆，種種諾言到頭來都是對人民的欺騙，老百姓的順口溜：「共產黨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說明人民對當政者的「信」已蕩然。更由於掌政者六十年的「無信」，導致社會上人與人之間也失去了互信。中共製造了一個沒有互信因而不「立」的社會，是對孔子政治思想最大的背叛。

最痛心的是，藉一部電影對孔子的扭曲，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中較為優良一面的堅貞不屈的價值觀，要人們改變自己的內心世界去屈從權勢。香港愛當奴才的特首和政團不斷改變自己去迎合北大人，可從這部電影所宣揚的意識中得到鼓勵。

二〇一〇年二月六日

譚案顯示：國家政權等同豆腐渣工程

早前報載二零一零年奧斯卡獲提名的名單，較少報道獲提名「最佳紀錄短片」的，有一部是關於零八年四川地震的影片，英文片名是：《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中國非自然的災難：四川的眼淚），製片人是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教的華裔教授夏明和酈治中，導演是美國著名記錄片導演Jon Alpert和他的助理Matthew O'Neill。影片由HBO投資，製片人給影片起了一個中文名字：《劫後天府淚縱橫》。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影片的片段。它最特別的地方，是全片沒有旁白，話音

全由當地災民的直接談話組成。夏明等四人在川震第十天前往災區，親見家長們控訴校舍的豆腐渣工程，為死難的子女討正義。他們原想拍攝天災，結果拍出了「非自然的災難」，即人禍。

全世界都會透過影院、HBO電視頻道，看到四川地震中人禍，而唯獨在中國看不到。不僅看不到，而且還把最早揭露川震中校舍工程質量問題的譚作人，判了五年徒刑。

譚作人案零九年八月審理，期間有香港記者遭公安在酒店扣留，藝術家艾未未前來聽審被拒更遭毆打。審理隔六個月才宣判，宣判日香港記者也遭到粗暴對待。法院以譚作人的六四文章定罪，沒有提及豆腐渣工程。

顯然，這是經過六個月的中共高層考量，而作出政治的而非法律的決定。譚作人的六四文章寫於零七年五月。而他是在零八年川震後，深入災區，收集死難學生數據，零九年二月，他呼籲對校舍工程質量作調查，「確認每一個班級，每一所學校，每一個鄉鎮，每一個縣市，每一個地區遇難學生的真實資料。」這

些資料，本應是政府有責任去收集確認的，但政府不但不做，反在譚作人提出這呼籲後一個多月，把他拘捕了。當局以他的六四文章定罪，顯然是因為明眼人都會看到，若以「確認遇難學生真實資料」為由，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實在太勉強了。譚的獲罪，名為六四文章，實為他對川震受難者的人道關懷。

譚作人的六四文章，是零七年五月寫成的。八九年他在北京，見證了六四的全過程。他在文章中說，十八年來他無數次衝動着寫作的念頭，但提起筆「都寫不下字」。為甚麼零七年五月他寫了呢？「這要感謝一位叫馬力的香港先生，因為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五日，他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侮辱了你的智力，踐踏了你的記憶。他讓你想到了惡，而不是美。你想告訴他，你想記住的，只是美。一九八九年，中國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美麗，譜寫了中國當代史的華美章節。它留給世界的，是大愛的人性光輝和大美的真理價值。」

在這篇題為《一九八九：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中，譚作人寫他在廣場所見到的互相扶持、互相救護的人性的美麗，寫目睹的事實

而不帶仇恨，相反還引用劉曉波《絕食宣言》所提到的「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

文章的警句很多，例如，文章提到「改革開放」之後的「偉大」轉型：「從此沒有美惡是非對錯，只有貧富強弱輸贏，以發財致富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為終極價值。首先壞起來，才能富起來，不能富起來，也要壞起來。這是悲，還是喜？」當年大學生在廣場的堅守，「守住的不是廣場，而是人的尊嚴和價值。這是當今發展中的中國，最為欠缺的東西。」

八九年中國「最後的美麗」，在坦克機槍中消失了。譚作人反對並揭發豆腐渣工程，結果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按邏輯來說，他反對的，等同於他要顛覆的。因此法院的宣判顯示，國家政權也就等同於豆腐渣工程了。豆腐渣工程：堂皇、虛假、脆弱，還加上恐懼——暴力，正正是來自於恐懼。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日

沒有激烈主張，連平和改革也不行

一九二六年，魯迅在香港一次演講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來開窗了。沒有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沒有激烈的主張，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魯迅當年對中國的觀察，證諸現在，似仍適用。

泛民主派，無論是公社兩黨的「補

選公投」派，還是以二民（民主黨、民協）為主的「終極普選」派，其實主張都一樣，就是「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二者都只是主張開一個窗，沒有提出要拆掉屋頂。但是爭取的手段卻不同。一個是用動員全民來表態支持真普選和廢功組，另一個是等待與中央或特區政府溝通去推動其主張。然而，在公社兩黨決計把補選公投付諸實現之前，有任何迹象顯示中央或特區政府會願意與泛民主派談真普選和廢功組的問題嗎？不但沒有此迹象，而且中央及建制派還不斷放出功組不可廢和提高特首候選人提名門檻的議論。二零一二年政改諮詢方案，實際上是向假普選和擴大功組悄悄邁步。

儘管泛民兩派的主張一樣，因手段不同，在北京看來就區別大矣。「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是中共一貫的處事邏輯。只要你態度好，他就「坦白從寬」；態度不好，就「抗拒從嚴」。基本上是只看態度而不是依從準則的。因此，「公投」儘管是「變相」，儘管沒有「公投法」做基礎，儘管其實只是補選，但你喊出「公投」，就是意圖遏制中央予取予攜的權力，

要由公民投票去決定政策，若此先例一開，這不等於把屋頂拆掉嗎？所以，儘管泛民兩派的主張都只是開一個窗，但因有一派提出不開窗就拆屋頂，於是中央就對不講拆屋頂的一派釋出善意，中聯辦主任彭清華說，「理性討論聲音增強了」。政協常委陳永棋更讚民主黨「越來越好」，並揚言「中央（對話）大門永遠打開」。

這些都是策略性的統戰語言。要說「理性」，眾所周知，理性主義的一個重要準則是數量化，公投是最能體現數量化的，怎麼不理性？而中央與泛民的對話大門又在何時打開過？怎麼忽而變成「永遠打開」呢？

因此，倘若說過去中央對泛民之門是「永遠打開」的話，那麼「永遠打開」的含意就是「永遠關閉」。泛民要與中央談真普選、談廢功組，這道門是永遠關閉的。可以談的是甚麼呢？不是「終極普選方案」，即使談也是點到即止，說些讓二民聽來順耳的話；重點談的是「過渡方案」，也就是包括二零一二年政改在內的實現雙普選前的過渡安排。二民主張讓區議會提名的區議員進入立會，這一點建制派正中下懷，因此林瑞麟說雙方「拉近」了。

中央和建制派有可能對二民的過渡方案作些讓步，目的是以此為餌，去誘騙撐真普選、廢功組的市民，使他們誤以為過渡方案已走向他們的目標，於是放棄在補選公投中去投票。

香港市民，尤其是支持民主的市民應認識清楚：一，沒有五區公投，就不會有中央和建制派對「終極普選」派的忽然善意；二，即使有了「忽然善意」，也絕不等於中央和建制派會支持真普選和廢功組；三，中央和建制派拉攏泛民「終極普選」派的目的，是要孤立和打擊「五區公投」派；因此，四，若想中央和建制派真正向真普選和廢功組這兩個底線作出讓步，市民就要全力支持「五區公投」派。市民可以接受「終極普選」派與中央協商甚或妥協，但任何協商必須有實力作基礎。「終極普選」派的談判實力，就來自五區公投的選民投票率。這是數量化的真正的理性主義。

沒有激烈主張，連平和改革也不行。如果認為五區公投是激烈主張的話，以手中選票力撐這主張正是實現平和改革的必要手段。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每年三月開一次的苦菜花

全國政協開幕，過兩天，全國人大接着登場，這就是一年一度的北京兩會。

《蘋果日報》報道，有人大代表透露，兩會期間最熱的特區議題，一定是政改諮詢，預料曾特首會向京官交代特區最新政改發展，港區人大與政協也會大談政改議題。而內地呢，則全國十一省市共十七家媒體，罕見地發表共同社論，力促兩會廢除現行戶籍制度，還人民自由遷徙及平等權利。

這兩個香港與內地分別關心的議題，兩會的大小會議有可能議論一下嗎？

大約兩年前（零八年）吧，內地網絡

出現了一篇《中國的七大噁心》的貼文。這貼文很快被刪除屏蔽了。筆者倒把文章留着。其中「第三噁心」，是「可憐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協」，原文如下：

「每年的三月份，這一對苦菜花都要開放一次。……第一個讓我搞不懂的是：憲法既然規定了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為甚麼它居然是業餘的而不是專職的？每年除了三月以外的十一個月裏它究竟在幹甚麼？代表們在幹甚麼？第二搞不懂的是：這些代表是誰選出來的？怎樣選出來的？代表誰？通過銀屏我看到代表們形形色色：官員、學者、企業家、勞模、影星、歌星、體壇明星，甚至有連國語都聽不懂的少數民族。我真的懷疑他們懂不懂法？懂不懂立法？國家的管理難道任何人來都行嗎？第三搞不懂的是：為甚麼人大開會的重點就是圍着《政府工作報告》轉？聽取政府工作彙報應該只是人大的工作之一。現在這種茶話會形式的人大會相對於憲法賦予他們的使命而言，是不是有點瀆職的嫌疑？

「政協就更讓人不知道是幹甚麼的了。看着一群老得連自己姓甚麼都想不起來的人在參政議政，不知

道是委員們個人的幸福，還是國家的不幸。」

這是內地人對這一對苦菜花的慨嘆。當然，人大、政協原來並不是這樣的。至少在改革開放初期，還有政協委員的大會發言，台籍人大代表黃順興反對建三峽工程的拂袖而去的抗議。但每下愈況，現在人大政協已純然是一場統戰騷與公關騷了。

會不會討論一下香港的政改諮詢？會不會議論內地十七家媒體提出的廢除戶籍制度？端看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有沒有這兩個議題，因為人大政協的個別代表委員的大會發言早已沒有了。分組討論也是「圍着《政府工作報告》轉」。《政府工作報告》不存在的議題，怎麼有機會在小組會中「轉」呢？而依筆者看，這兩個議題不太會納入《政府工作報告》中，所以嘛，別說「熱議」啦，即使想「議」一下，也別做夢了。

港區人大政協私下會與京官談政改嗎？

當然不排除。但有用嗎？負責香港工作的京官難道不了解港人對政改的不同訴求？但他們腦子裏的「不可有真普選」的屏障，使他們只會聽一面之詞。日前，范徐麗泰出席人大常委會議，據她透露已將「終

極普選聯盟」的建議，提交北京相關官員了，對方沒有明確反應，但她認為，要中央接受二零二零年立會選舉全面取消功能組別，難度很大。

因此，私下傾談，向京官反映意見，是談不出結果來的，兩會對香港政改也不會「議」，更莫說「熱議」了。

像取消戶籍制這種議題，在內地一定已談了很多。十七家媒體雖非正宗黨報，也是黨報的附屬報，這些媒體的主事人與官方的關係難道不比香港的人大、政協深厚得多？要能私下談出結果，又何須發表共同社論？說到底，還不是因為私下談來談去都無用嗎？

內地媒體都為了百姓的利益，對官方採取聯合行動了，香港的媒體有法律保護，何以反而越來越怕冒犯中共而變得順從？內地有志之士早已看穿無法對兩會這對苦菜花有所寄望了，香港一些政界人士何以仍以為可在兩會期間熱議香港政改？大陸人已越來越傾向採取共同行動向中央施壓了，香港人何以還對「變相公投」這種合法的共同行動有所畏懼？

香港人，香港媒體，真要好好想一想了。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日

「愛國」新詮釋：不是感情，而是政治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要「深入推進政務公開，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

說得好聽，現實卻是把有意監督政府的譚作人，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日，《南方都市報》的「深度周刊」，刊出「三峽庫區險境」專題，報道興建三峽水庫，大規模的開山破土加劇了地質破碎的災害，「除了產生新滑坡，還有大量老滑坡被激活。庫區新縣城，大多成為了滑坡高發區，而大量的裂縫爬上了學校和居民的樓宇……國家已投入上百億資金治理地

質災害，但，險境和考驗仍在繼續。」專題拍出奉節縣幸福中學的一座天橋的巨大裂縫和錯位，看來觸目驚心。三峽工程的大興土木，與天鬥爭，更被專家指為引發了地震。儘管零八年的汶川地震是否與三峽工程有關，尚未證實。

在溫總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汶川地震，一味讚揚災區重建，歌頌災區人民在全國支援下如何重建幸福生活。豆腐渣學校一字不提，死難學生人數付之闕如，地震是否有預警？與三峽工程引發的地質變異是否有關？溫總不說，而這些問題也早在內地所有傳媒消聲了。內地沒有任何「監督政府」的機制，監督中國政府的功能落在西方國家與境外人士的「說三道四」了。

然而，溫總講到四川災區重建時，由於他提高聲調，示意該鼓掌了，也就引來了掌聲。依靠中國人大這個相當於國會的機制去「監督政府」嗎？溫總說要「創造條件」，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事了。

三月三日，賈慶林在政協大會上說，「堅持把愛國作為最大的政治共識，最大限度地凝聚海內外中華

兒女的智慧和力量。」這句話直桶桶地表示，在中共眼中，「愛國」不是一種感情，而是「政治」，而且是最大的政治共識。我們一直認為愛國是愛土地、愛人民、愛中華文化的民族感情。中共和香港愛國人士常說甚麼「血濃於水」，港澳台同胞是「骨肉同胞」，原來都是假的，「愛國」是政治，是對中共執政的認同，是擁護中共黨的政策，包括壓制異見人士，不「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的政策，直白說就是要「愛黨」、「愛權勢」。

因此，香港泛民主派一些人希望藉由港區人大、政協向中央表達港人要真普選的意願，不僅是所託非人，而且簡直是自取其辱了。看港區政協三月四日小組會上，藉着面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機會，紛紛唱衰泛民主派，批八十後，罵公投，將社會矛盾諉過泛民，又有港區人大力倡盡快為廿三條立法。他們都無非是乘機會向中央「表忠」，以求得到政治或經濟的更多賞賜。

不能怪這些摧眉折眼事權貴的人大政協，因為他們的政治地位非來自民選，而是來自中共的賜予。向

權力來源效忠自是應有之舉。

至於賈慶林呼籲港澳政協「密切同港澳重要政團、社團和各界人士聯繫，不斷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意思也不是要他們真正去了解並向中央反映港澳市民意願，而是要他們爭取更多人「愛黨」。

港台節目《左右紅藍綠》中，有時事評論員認為中共近年加強了對宗教、互聯網、維權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極權嚴控。他的觀察是對的。但他的結論是，在中央對港政策從嚴不從寬的情勢下，香港人「用對抗來爭取民主，恐怕是錯判形勢」，卻是屈從現實、罹患軟骨症的看法。且不說五區補選是否就是對抗，倘若凡是中共視為對抗的行動都不可行，那麼港人只好節節退讓，拱手讓廿三條盡快立法了。

在「愛國」是政治的詮釋下，一味向極權者靠攏和乞求，就會有出路嗎？

二〇一〇年三月六日

釐清「事實」與「言論」的分野

先是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放硬話，批五區公投「公然挑戰《基本法》」，繼而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指香港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要求港人尊重和準確了解《基本法》。一犬吠影，眾犬吠聲，香港親中左派人士及輿論再群起狠批五區公投。加上建制派杯葛補選，特首和眾高官不鼓勵投票，更有民主黨不認同總辭公投，使香港許多市民包括部份支持民主的市民，由於這議題雜音太多，以致對一些基本認知感到模糊，屆時是否投票也不清楚了。

對此，筆者認為須釐清基本認知，

即釐清「事實」與「言論」的分野。

就事實而言，五區總辭再補選，並非具真正意涵的公投。《基本法》沒有規定禁止的，當然不能說不合法。但特區未制定「公投法」究是事實。有公投法才能保證公投產生結果之後必須予以執行，沒有公投法，確如港澳辦所言，「沒有法律基礎和法律效力」。因此，事實上這是一次補選，而非公投。

就言論而言，公社兩黨對五區總辭補選賦予公投的意涵，但這是「變相」的，是不具法律效力的公投，也就是藉合法的、全體選民的投票，來確認公社兩黨提出的「真普選，廢功組」的訴求。它是數量化的民意指標，不是當權者必須遵循的方向。公投的說法，只是言論，是宣傳口號。口號再誇張，再煽情，「起義」、「解放」甚至用上更激烈字眼，也只是一種意見，不能改變總辭補選不具備強制執行法效的事實。

公社兩黨就總辭補選賦予公投的意涵，就如同政府就政改方案中增加五個區議員互選議席，指為擴大民主成份一樣，都只是一種意見，是否認同見仁見智，基本上屬言論自由的範疇。

一個現代文明社會，必須弄清楚「事實」與「言論」的分野。事實是一回事，對事實的論述則屬言論，是另一回事。五區總辭補選在事實上並沒有挑戰或違反《基本法》，甚至也沒有挑戰人大常委的權力。倘若總辭補選違反了《基本法》，反對這行動的左派人士大可以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予以禁制。但顯然不會有人作這嘗試。因此，補選不但不違《基本法》，而且正正是履行由《基本法》確立的香港法制的規定。

那麼，言論上是否挑戰或違反《基本法》呢？彭清華指五區公投宣傳口號極端，挑戰《基本法》，顯然指的是言論。但言論自由恰恰是《基本法》與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言論上，從沒有為「挑戰」甚麼設限。一九五一年美國丹尼斯案，丹尼斯被控組織共黨鼓吹武力推翻美國政府，當時的大法官道格拉斯反對判丹尼斯有罪，因為美共勢力微不足道，鼓吹只是講講而已，不具備真正危害政府和社會的力量。與「鼓吹武力推翻」相比，沒有「公投法」之下的補選，更不具備以公投推行目標的能力了。

因此，因宣傳口號而大發雷霆，指摘口號「挑戰

《基本法》」，這說法本身正正是違反了《基本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說出這種話，或有這種思維，恐怕是長期以來受「以言入罪」的專權政治意識影響所致！是否有公投的事實不論，有公投的言論就罪大惡極。而港區人大中，也有人被這種專權政治思維洗腦，建議速速為廿三條立法，以圖禁制種種「危害」國家利益的言論。

這是一場藉批公投以壓制並主導香港言論自由的鬧劇。香港選民必須認清楚：補選是事實上合法而且政府和市民都應履行的責任；公投是公社兩黨賦予這次補選的意涵，實際上屬言論自由範疇；因公投這個宣傳口號而打壓五區補選，是「以言入罪」思維入腦而採取的壓制言論自由包括杯葛補選在內的手段。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保香港優勢和特點，是解決矛盾之道

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會上，終於把他讓曾特首和港人猜謎猜了幾年的「深層次矛盾」，揭出了謎底。原來這深層次矛盾講的是五個方面。其中經濟與政改兩者兼備。不過由於他講的第四點，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政治」，於是又引起一些抱善良願望人士的夢想，認為特區政府稍後可能對政改有輕微讓步啦。

民主問題筆者已談過許多，本文且就溫總提到的其他幾個深層次矛盾議一議。

溫總提到的第一個矛盾，是如何發揮已有的優勢，繼續保持和發展香港的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第二是如

何結合香港的特點發展優勢產業，特別是服務業。

被列為第一、第二的，是香港「已有的優勢」和「香港的特點」，是「已有」的，而不是新開闢的。這「已有」的是甚麼優勢呢？是甚麼東西可以讓香港擁有金融、航運、貿易、服務業的優勢地位呢？

相信隨便問一個商界人士，或這些行業的從業員，他們都會告訴你，優勢來自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容筆者補充，優勢還來自市民對作為香港人這身份的認同。

香港的法治，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礎。依靠大法官李國能領導的眾法官對法律的堅執，依靠大律師公會對法治的維護，依靠絕大多數市民長期養成的守法傳統，是回歸後香港「基本不變」的基礎。然而，中共的釋法，和對香港法治的胡亂批評，已造成對香港法治的衝擊了。北京應該知道，「法」在香港是最大的，有權解釋「法」的法官是最權威的。香港的大法官不像中國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只是聽命於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小媳婦。

香港第一個深層次問題，之所以成為矛盾，是中央釋法和香港一些要迎合上意的人士動輒要中央釋法，是

中央輕言香港依法進行的政治活動違反《基本法》。這會威脅香港「已有的優勢」。若親中人士覺得香港有人違反《基本法》，那就向香港法院申請司法覆核好了。

其次，自由是「香港的特點」。希望北京當局搞清楚甚麼是「言論自由」，弄清「言論」與「事實」的分野，對遊行示威等表達自由要懂得尊重。保釣人士到日本領事館遞抗議信，領事館是派人接信的，儘管日本不承認釣魚台是中國領土。中聯辦門前，變得草木皆兵，究其原因只是中聯辦不肯派人接信，也就是不尊重示威人士的表達自由而已。若接信就萬事大吉了。北京當局對表達自由的專橫態度，使特區政府不得不出動大量警力去阻擋示威者進入中聯辦遞信。再加上香港的言論自由因中共統戰而使傳媒紛作自我審查，自由褪色還可以保住「香港的特點」嗎？

有報道稱，內地一項調查，全國各地讓消費者滿意度最高的地區總冠軍是香港。包括酒店、購物、旅遊景區、交通、機場服務這五項，香港的得分都拋離內地所有省市地區，也拋離澳門、台灣。這些都是溫總所強調的服務業。筆者認為，香港人普遍服務態度超越全國各省市，最基本的原因是長期形成的對香港

人這身份的認同。儘管香港已回歸，我們到了外國，外人問起來自何處，我們會說是香港而不說是中國；問是甚麼國籍的人，我們會說是香港中國人。有一位香港年輕女子寫過一本書，書中說，她在外國，「對香港人這身份有一份執着。畢竟我們（與中國大陸）所呼吸的空氣、所踏足的土地，都有截然不同的氣息。」

因此，溫總講的第三點，是「利用香港毗鄰內地的優勢，進一步加強香港與珠三角的聯繫」。毗鄰內地固然有優勢，但矛盾在於香港發展與內地聯繫時，如何保住香港人的身份。年輕人反高鐵的主要理由，是建高鐵只為了配合內地的高鐵網絡，而不是因為香港本身的需要。這種一味向北望的政策，使香港人失去了身份，也失去了在各行業尤其是服務業中，以保住香港人身份為榮的傳統。

溫總講的是深層次問題，但為甚麼會是矛盾呢？矛盾在於香港人與內地高官在價值觀上南轅北轍，矛盾在於中央有意無意不斷損害香港「已有的優勢」和破壞「香港的特點」。怎樣才能保住香港的優勢與特點呢？答案就在溫總所指的第四點：發展民主政治。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七日

真的真不了，假的假得了

陳志雲一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成了這陣子最受議論的句子。讚譽的人説他「好叻」，這句話「好有意思」；揶揄的人則說這句話只是說「我阿媽係女人」，毫無意義。

然而，在筆者看來，陳的這句話，卻絕非「阿媽係女人」那樣理所當然。無數的事實顯示，世界上的事，真假難辨，往往不是「真的假不了」而是「真的真不了」，也不是「假的真不了」而是「假的假得了」。

這句所謂「真假禪語」，不是陳志雲發明的。報章報道，九八年台灣妙天禪

師和零四年陳水扁都講過這句話，而其後的事實卻不是「假的真不了」，而是「真的真不了」。上述兩個説這話的人似在故弄玄機，雖不是斷然否定有關他二人的負面新聞，但大有「真金不怕洪爐火」之意，暗示有關負面新聞「不真」。

另一例子是零八年劉德華擔任「中國產品質量電子監管」代言人，廣告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為宣傳詞語，指食品等等貼上通過國家質檢總局認證的電子監管碼後，就是有質量保證的真品也。然而，此廣告出後不久，就發生了毒奶粉事件，而被發現含三聚氰胺超標的三鹿奶粉，正正是通過國家質檢總局認證並獲「國家免檢產品」稱號的「假的真不了」之產品。當然，劉華只是作為代言人，無權參與質檢總局運作。

另一個大新聞，就是內地不法商人用「假的假得了」的坑渠油，充當食用油銷售，橫行內地食肆，致使人民每年吃下含毒性物質極重的坑渠油三百萬噸。

「真的真不了」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基於人性。《羅生門》的故事告訴我們：即使是事件的參與者，每個人都會從自己利益、榮譽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件事，

而描述出來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視角。在人類生活中，無數事情都是經由不同目擊者、見證人說出來的，而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利益、觀念、榮辱的角度去說同一事情的不同面貌，於是事情也就真相難辨了。

「真的真不了」的另一原因，是基於當權者的政治考量。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說：「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因此，歷史是由掌權者詮釋的，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說明即使是較為可信的歷史，也會由於當權者的詮釋，而有可以置疑的空間。

至於專權政治之下，歷史就更是一片空白甚至一片混賬了。專權政治由於沒有立法、司法和自由媒體的權力制衡，更是假象、假貨、假話橫流，充盈整個社會。如果你跟生活在那種社會的人說「真的假不了」，那裏的人恐怕會把你當白癡：甚麼假不了？甚麼都可以假！在大陸，有一個嘲諷說法：除了媽媽是真的之外，其他甚麼東西都可以是假的。

《紅樓夢》第一回有一副對聯：「假作真時真亦

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意思是：把假當真，那真的便成了假的了，把沒有的視為有的，有的也就成了沒有的了。

謊言重複一千遍，就變成真理。這是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Paul Goebbels, 1897-1945）的名言。當把假普選說成是真普選，把功能組別也說成是普選的成份，說一千遍，這「假的」也會變成「真」。

因此，我們不能將「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視為必然，而應視為人類社會理想的追求。英國作家約翰 • 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說：「人類所作最偉大的事，是把所看到的，平實地告知世人。」這似乎是人人可做到的平常事，卻不是人人會做，但它的確是「偉大的事」，尤其對於做傳媒工作的人來說，更應以此自勉。

作為一個香港人，表達你對真普選的意見；作為傳媒人，貫徹「只求傳真」的精神。這樣才可以使我們的社會慢慢實現「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日

香港核心價值的淪落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政府新設計的飛龍標誌，「向世界宣傳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開放、積極進取、追求卓越、勇於創新、優質生活。」

二零零四年六月七日，香港二百九十四位來自不同界別、包括非民主派的專業人士，在報章刊登一份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宣言認為「近年香港核心價值備受衝擊」，呼籲市民以言論及行動維護這些核心價值。

當天，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對這份宣言作回應，表示「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完美無缺，而政府充分了解市民對這些價值的珍視，所以會致力加以維護，不會令之受損。」發言人重申：「政府管治建基於法治、自由、平等、開放、廉潔等核心價值。」

與零四年二百九十四名學者與專業人士所列舉的核心價值相比，財政司司長代表政府宣示的核心價值固然變了樣，即使與當年政府發言人所宣示的核心價值相較，也已不能用「倒退」來形容，實際上可以說是「淪落」了。

二百九十四名學者、專業人士，包括現時的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當時的工商專聯主席黃匡源、全國政協羅祥國、導演徐克和陳嘉上、陳方安生堂妹方敏生等。張炳良且以發言人身份在記者會申述聯署這份宣言的社會背景。今天他身為行政會議成員，應參與認可新飛龍所標誌的核心價值。是他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認識改變了嗎？

新飛龍標誌所宣示的五個核心價值，不但沒有民主，而且也不見當年政府所宣示的「法治、平等、廉潔」。飛龍標誌所宣示的，除了「自由開放」，其他四

項都指向經濟發展，目標則是第五項，「優質生活」。

這四項，實際上是所有社會都會追求的，談不上是「核心價值」。核心價值必須是我們的價值觀。如果不是法治、平等、廉潔之下的自由競爭，這樣贏得的「優質生活」，絕不是大多數香港人所期望得到的。內地山西省近日又發生礦難事件，而網上流傳的山西省煤礦礦主的婚禮，有長達一公里由林肯加長車組成的豪華車隊，其豪奢極侈的程度，香港億萬富豪婚禮也望塵莫及。這種踩在屍體上的「優質生活」，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嗎？

零四年二百九十四人宣示的核心價值，首位是「自由民主」。當年港府發言人肯定這些核心價值，只因政府不是由民主產生，因此才在「政府管治建基於」之下，沒有列明民主。民主，對於香港一般市民來說，也許不覺有切身的需要，如果民主等同於普選，那麼香港在沒有普選的狀態下，一百多年來也大體上安定和繁榮。

自由、法治、人權，卻是與香港市民每天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沒有了這幾樣，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就會感到威脅，經濟上也失去了在法律保障下機會平等

的自由競爭。因此，回歸前曾有不主張民主的政論家認為，香港的經驗，是自由＋法治＝繁榮＋穩定。

可是，政治學理論告訴我們，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可分開的三位一體。香港回歸前的自由與法治，依靠英國的民主制度保障。香港回歸後的自由與法治，卻依靠中國不民主制度下的承諾來維持。專權政治的承諾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國專權政治下對香港的釋法，對媒體統戰而導致自我審查，公開宣稱要香港「三權合作」，以及出現「第二個權力中心」的言論與行動，都對香港的自由、法治構成威脅。

零四年特區政府仍堅持法治、自由、平等、廉潔等核心價值，到了二零一零年的現在，則法治、平等、廉潔這些核心價值都不提了。是丟棄了嗎？還是：特區政府已緊跟「一國」的「不義而富且貴」的潮流，不顧法治、公義去一味追求「優質生活」了。

也許曾司長所講的核心價值，正是政府高官以及和他們有關連的政商界所追求的吧。而香港市民過去自尊自豪的核心價值，就走向淪落。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兒童節感言「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明天（四月四日）是兒童節。儘管中國內地根據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婦聯會議，將兒童節定在六月一日，但各國的兒童節均不同。香港人在民間約定俗成下，仍多以民國時期定下的四月四日為兒童節。

兒童節當然是兒童歡樂的日子，是希望兒童健康快樂成長的日子。然而，在中國內地，災難卻偏偏降臨在兒童身上。結石寶寶、地震寶寶、疫苗寶寶、血鉛寶寶等，層出不窮。有些災難是成年人也要承受的，有些卻只落在天真的兒童身上，比如四川的豆腐渣校舍。

一位結石寶寶的爸爸趙連海，被當局控以尋釁滋事罪，被戴上鐐銬送上法庭，受害人被硬栽為罪犯。他的結石寶寶兒子在法院外，無法見爸爸一面。趙連海的要求其實十分卑微，只是要監管失責的政府，付結石寶寶的醫藥費而已。香港藝人梁詠琪在內地個人微博上，轉貼了有關趙連海的報道，立即被勒令刪除。當藝人的，不能無視大陸市場，所以她說：「內地有內地的規矩……好，我刪！但不公平的事還是不想再看到，尤其發生在平民百姓身上。」她自稱沒有政治立場，只是「抒發情緒」。但對弱者的同情，在內地就犯了大忌。所有對弱者的關心和援手，包括譚作人、艾未未、香港樂施會，在內地都被當權者視為敵對分子。

但香港人的同情心沒有被「一國」河蟹掉。一群港人收集了「災難寶寶」名單，將於明天兒童節遊行到中聯辦，張貼在中聯辦外。他們的心情和香港許多人一樣，要求也很卑微，只是希望施政者不要選擇性地把禍害與苦難，施之於最純真也最無告的孩子身上。

內地網站流傳一首歌，是由盲歌手周雲蓬創作，並以沙啞嗓音唱出的，歌聲和唱詞都讓人震撼心酸！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愛滋病在血液裏哈哈地笑／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變成了一筐煤，你別再想見到他／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兇光／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新疆克拉瑪依劇場大火，火起時劇場宣佈：「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由此而導致二百八十八名學生被燒死，領導等成年人則安然脫險；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黑龍江沙蘭鎮洪水氾濫，官員知情卻沒向學校通報，活活淹死八十八名小學生；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歲小孩李思怡母親吸毒被警察羈留，她告訴警察家中無人照料孩子，但警察不理，李思怡活活餓死；河南有愛滋村，山西礦難頻發，孩子突然不見了爸爸……。這些是盲歌手創作此歌的背景。

後來網上又有人添加：「不要做汶川人的孩子，

因為學校的房屋是豆腐渣／不要做奶粉餵大的孩子，因為它不光讓你變得頭大／不要做湖南人的孩子，因為你的血液會被鉛化／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因為我們不知道活着為啥。」

如果你認為，中國孩子再多結石寶寶，相對中國人口仍是少數，那麼你可曾想到，身體摧殘之外更大面積的是心靈摧殘嗎？奧運假唱，五十六個孩子假扮少數民族列隊進場，虛報年齡參加體操比賽，使他們從小就視造假說謊為常事；金正日來訪，也使我們想到，幾十年來兒童向多少來訪的獨裁者、殺人魔獻花？今天孩子們的夢想是甚麼？零九年九月廣州採訪視頻訪問了一些一年級學生，問他們的理想是甚麼，一個小女孩回答是：「想做貪官，因為貪官有很多東西。」

魯迅的《狂人日記》寫中國是「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最後一句是：「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但九十多年過去，到了今天，中國孩子竟想做貪官，想吃人了。你知道中國的一切罪惡根源在哪裏嗎？就在克拉瑪依火災時的那一句：「讓領導先走。」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日

感謝聲中，黨和政府越來越偉大了

山西王家嶺煤礦災難出現了生命奇迹：一百一十五名礦工，被困在礦井下八天八夜，依靠着頑強的生存意志，在井下吃煤塊、皮帶、飲尿，挑戰人類的生理極限，竟然獲救生還。

現場救援人員與電視機前數億觀眾，許多人都為這生命奇迹而落淚。每遇內地有災難都密切關注的香港人，也多為這些礦工的獲救而高興。

最應感到高興的是甚麼人？除了逃出生天的礦工和他們的家人之外，就常理來說，應是煤礦的礦主了。他們不僅可以省去好大一筆賠償金，而且大大減

輕了輿論和社會對他們的指摘。即使沒有自由評論的媒體，礦主也會因礦工的獲救而減少自己的良心責備。因此，礦主應該感激受困礦工與死亡奮戰的生存意志。

王家嶺煤礦是國有企業，它的礦主是政府，因此政府應一方面感到高興，另方面也應感謝脫險礦工憑堅強意志創造的奇迹。

不過，我們看到的卻是相反的景象：不是政府感謝礦工，而是礦工感謝政府。大陸官方媒體，口徑一致地將礦工獲救，定調為「黨和政府領導下的奇迹」，央視新聞聯播更稱「是黨中央國務院的英明決策，創造了這場世界救援史上的奇迹」。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到醫院探望獲救工人，也強調「轉達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的問候」。而獲救的工人，則異口同聲地說：「謝謝黨中央，謝謝胡主席。」

如果不是礦難，而是地震、火災、風災等自然災害，即使其中有豆腐渣校舍這類的「人禍」因素，我們還勉強可以說災難是自然造成的。但礦難基本上是由於安全設施不足所致，主管機構難辭其咎。國有企業

主管機構是政府。於是內地有人問：「英明決策為甚麼不在礦難前？」獲救礦工為甚麼不向導致他們幾乎送命的黨和政府責難，反而要向黨和政府感謝？即使黨和政府動員了救援人員把他們救出生天，這也只是黨和政府應盡的責任，何感謝之有？

筆者想到不久前在冬季奧運速滑賽中奪冠的周洋，她在獲獎後表示，「我覺得拿了金牌後可能會改變很多，首先肯定會讓自己更有信心，也可以讓爸媽生活得更好一點。」這番感動了許多人的真實感言，卻受到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于再清的批評，他說「感謝你爹你媽沒問題，首先還是要感謝國家。要把國家放在前面。」周洋父母在回應記者詢問時，連忙說，孩子歲數小，經歷少，就算說錯了，你們也應該諒解，下次和孩子交流時會告訴她先感謝國家後感謝父母。

我們的國家真是太偉大了。回想起零八年在奧運中囊括八項游泳金牌的美國選手費斯（Michael Phelps），獲獎後沒有感謝國家，相反倒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布殊第一時間代表美利堅合眾國感謝費斯，由於他的努力與成就，為國家帶來榮光。可是在中國，不管好事壞

事、災禍幸運、喜劇悲劇、得獎受難，都要感謝國家，感謝主席總理，感謝黨中央國務院。只有歲數小、經歷少的「孩子」，才會說出大實話而不說這種感謝假話。

這是壓迫出來的感謝聲音。在聲聲感謝中，老百姓每一個人的個人價值都被擠壓了，不僅被視為「算個屁」的屁民，而且也在感謝聲中自輕自賤起來，不知道自己的生存權利，也不知道執政黨和政府有責任去保護每一個百姓的生存權利，似乎因安全設施不足而自己險些送命都是自找的，而黨和政府組織救援則是他的救命大恩人。一切奇迹都不是人而是黨和政府創造的。

這種感謝聲音，也等於給了黨和政府一張張空白支票，使他們可以在老百姓身上予取予攜，黨和政府也就變得越來越偉大，而屁民就更屁了。

這一聲聲感謝，正顯示專權政治之下百姓個人與政府關係的大顛倒。

二〇一〇年四月七日

要爭取當公民，還是甘願淪為屁民？

不管你對社民連的激烈抗爭多麼反感，不管你如何認同普選聯以尋求對話方式去爭取民主，甚至不管你對中央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多麼有信心，單從這次中央和建制派對五區補選的全力打壓來看，你作為一個市民，想要爭取「公民」的權利，而不願淪為「屁民」，那麼你應知道在這次補選中，要如何取態了。

甚麼是市民？現在香港人所處的境況就是市民：在中央承諾之下享有法治與自由，但這承諾是沒有民主政治保障的，是隨時可以說變就變收回的。甚麼

是公民？公民就是有政治權利的人民，不僅可以有選出行政首長和立法議員的間接民權（因為選出以後所有行政、立法的權力就由當選人去行使了），而且在重大爭議事項上有公民投票決定的直接民權。北京辯護士說中國是單一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因此不可有公投這種「創制複決」權，是胡說。不論單一制還是聯邦制，只要承認民權，那麼人民就享有間接民權和直接民權。甚麼是屁民？就是在無視人民應有權利，說人民「算個屁」的專權政治管治下的百姓。

五子總辭，本來是兵行險着，因為倘若建制派應戰參與補選，五子相信難以全取五席。這樣，要否決政府提出的二零一二政改方案就不可能了。這也是民主黨不參與總辭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中央一聲令下，民建聯、自由黨不參選，不但搶不到議席，且也失去力保二零一二政改方案的時機。顯然，中央把杯葛「公投」（儘管是變相的）看得比奪取建制派議席、力保政改方案更重要。因為民權的上揚，即意味着中央專政的權力被削弱，而權力是中共寸步不讓的。台灣三次公投，北京都強力反對，只不過權力之手伸不到

台灣，無可奈何。香港已回歸，儘管標榜是「港人治港」，但若在中國主權下進行公投，即使實際上沒有公投的功能，也是對全國「屁民」的極重要示範。近年內地屁民挑戰專政權力的群體事件此伏彼起，而網絡世界又無法封鎖香港公投的訊息，因此中央把象徵意義的補選公投，看得比實際選戰輸贏重要多了。

對這次補選公投，中央定下了「不參選、不參與、不投票」的「三不」策略。林瑞麟（二零一零年）二月時豎起一個「零」字手勢，得意地說：「我未聽過所謂公投，係零投票率都可以講係不戰而勝。」中央原以為補選時公社五子無對手，均自動當選，那就是「零」投票，也就辦不起公投了。但現在這個為「零」投票而設的局已破，共有二十六人參選，五區都會投票，公投肯定辦起來了。

建制派「不參選」，反而激起大專年輕人參選。中央號召「不參與」，也會激起許多人參與其事。「不投票」則是最後一招。曾特首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不會投票，林公公說政府中人會自行決定是否投票。在政府與建制派杯葛投票的情勢下，相信也會激起不少人的

逆反心理去投票。

公投的投票率會有多少，是香港市民對民主嚮往程度的試金石。毫無疑問，香港市民是有民主訴求的，只不過許多人未必贊同以公投這種方式去爭民主。政府和建制派對普選聯釋出善意，表示願意談，也使一些溫和派市民有幻想。然而，談只是攏絡手段，到目前為止，中央和建制派並沒有表示任何會接受或考慮普選聯方案的意願。左報一篇評論表示普選聯比起五區公投，它尋求對話的做法較可取，但同時表示功能組別體現「均衡參與」，不可廢除；普選聯將二零一二選舉與二零一二以後的選舉「綑綁處理」也「違反憲制程序」。換句話説，中央和建制派絕無向普選聯方案退讓半步的迹象。

因此，「尋求對話」也罷，全民投票也罷，説到權力，專權政體是一步不讓的。不過，由總辭五子打出了一個變相公投的缺口，香港市民總不能缺席這個在專制政權下難能可貴的表態機會吧：要當一個公民，還是任由宰制而逐漸淪為屁民？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日

立會世博行是一石四鳥的統戰招數

立法會議員的世博行，是北京對泛民溫和派要求真普選和廢功能組別的回應。顯然牛頭不對馬嘴，給出的與要求的不是同一樣東西。就像你要求一份穩定的工作，回應的則是請你吃頓飯，或只是給你一顆糖。

立會世博行安排在五區補選公投的前一周，提議世博行的立會主席亦是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和民建聯現主席譚耀宗都信誓旦旦地表示，立會世博行沒有政治考慮，然而，不須有多少政治見識的人，都可以設想，安排在補選公投前一周的世博行，起碼會產生以下的政

治效果：

一、儘管說是全體立法會議員世博行，但選在立會五人辭職而補選未舉行的時機，就正可以把言行激進的社民連三子排除。一方面避免出現他們在世博示威引起國際媒體報道的尷尬場面，另方面也藉此機會排斥孤立社民連。

二、世博行安排在五區補選前一周，可把傳媒注意力吸引到世博行，藉此降低補選的選舉氣氛，從而壓低投票率。

三、在補選前一周把泛民議員帶離香港，使他們無法為補選議員站台助選，也有助壓低投票率。

四、給些甜頭回應溫和路線的普選聯，也算是善意，以獎勵溫和民主派沒有參與補選公投。

立會世博行，是中共一石四鳥的統戰招數。說甚麼沒有政治考慮，說甚麼世博工作繁多，活動要配合上海安排，是說出來連自己也不相信的托詞。世博開放給所有人參觀，香港立會議員參訪，有甚麼事要勞煩上海當局忙不過來的。

即使是向溫和民主派釋出的善意，這善意也很有

限，給出的甜頭未免小器。發給泛民的，都只是一次過的證件，施捨的意味太強，難怪劉慧卿公開表示拒絕這種施捨，而回內地應是所有香港市民的權利，尤其是民選的立法會議員，因為他們有民意代表性。倘若大器一些，向全體願成行的泛民議員都發十年回鄉證，那就使想拒絕參與的議員都沒有理由拒絕，一石四鳥的作用才真正發揮出來。

給溫和民主派的胡蘿蔔小小，但打向普選聯的棍子卻大大。自普選聯提出溫和政改主張，政府、建政派和中央不但全無回應，而且對普選聯的主張從批評到放狠話，大棍子打將下來也。先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批評普選聯方案不符「政改五部曲」，超出人大常委會決定；政協常委梁振英則指市民未必接受普選聯方案。《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更直斥普選聯與公社兩黨「雖然策略唔同，但目標一樣，根本是扯貓尾！」

可憐溫和民主派和普選聯諸公，得不到中央的善意回應，等了一個月都溝通無門，只得到一個毫無意義的世博行。為證明他們的溫和路線正確，還要為

北京解釋。比如說，劉迺強的狠話是建制派內的鷹派主張，意圖挑撥及分化泛民，令普選聯放棄與中央對話。而普選聯不會在中央未有回應前放棄爭取與中央對話。

　　這想法真是自欺欺人。劉迺強哪裏是甚麼鷹派？中共對香港政策基本上是高度統一的。若劉迺強說的是鷹派的話，他說了以後，何以又不見有鴿派去澄清？事實上，劉迺強說的正是北京的意思，是大實話。為北京解釋的泛民溫和派是在做夢呢，還是為自己的溫和路線找理由呢，抑或是為靠攏找出路呢？

　　立會世博行，其實不算甚麼高明招數，但居然有不少人受落，可見權力還是很能迷惑人的。清醒的香港市民，要作怎樣的回應呢？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三日

假如黃福榮仍活着

玉樹地震中捨己救人的香港貨車司機黃福榮，遺體已安放紅磡世界殯儀館，家人正安排適合的禮堂，讓所有認識他或不認識而敬仰他的市民，前去致祭。

黃福榮的生前事迹，連日來許多媒體報道，曾特首撰文讚揚，特區政府追頒他金英勇勳章，新華社訪問他家人，中聯辦派員向他家人致意，內地網民稱道他是香港人之光，是真英雄，許多香港人在網頁留言說「他永遠是香港人的驕傲」。

黃福榮殉難，受到交相頌揚，自是應有之義。只是近日筆者想到一個問題：如果黃福榮沒有死，他繼續活着，

繼續不斷到大陸各個發生災難的地方做義工，他的遭遇會怎樣？

零八年他到汶川震區當義工，他在網誌寫道：「拍子跟我說，政府現在有人在調查我們幾個。唉，在中國做事就是這樣；那管它，反正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在這沒做壞事，你們喜歡查就查吧。」

但是，行得正企得正，未必就得到公正待遇。在內地，像黃福榮這樣不顧身家性命到各災區幫助災民的人，他的動機就足以引起泛政治化並輕忽人命的當局懷疑。而且，救災這種事，要黨和政府去做才顯出領導英明，民間和非政府組織的救援，會受到當局敵視。早前教育部發文件指樂施會「用心不善」就是一個例證。

在內地，做好事做善事是要擔風險的。零六年南京青年彭宇，在路旁扶起一個跌倒的老太太，並送到醫院，結果被告上法庭，說老太太是被他撞倒的。法官認為彭宇的好心「與情理相悖」，判他賠償四萬多元。自此以後，在內地要不悖情理只好對跌倒老人袖手旁觀了。

零九年江蘇淮安居民周翠蘭在路上撿到一千七百元，她找到失主，對方卻堅稱丟掉的是八千二百元，

要她歸還全數。這故事告訴人們以後撿到錢也不要歸還失主。

在大陸，行善很難，行善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行善讓人懷疑動機。因此，黃福榮在內地不斷做義工，做善事，做久了未必不會被當局懷疑。

即使黃福榮在內地行善而沒有被當局懷疑其動機，那麼另一種情況也很容易發生，就是他在災區救人，卻目睹種種人禍害人，他激於義憤，站在災民一邊向當局爭取公道，於是他又成為當局的「敵人」了。

黃福榮到汶川震區當義工時，他在網誌上寫道：「教學樓（學生上課的地方）倒塌，但連在一起的宿舍只有裂痕，一層也沒有倒，為何會這樣？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發生甚麼事……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

玉樹地震的情形也一樣，百分之八十的校舍倒塌，政府大樓依然光鮮亮麗屹立在廢墟旁。黃福榮本着對受難者的愛心，對官與民之間建築物的對比他豈會孰視無睹？他會一直只是默默地救人而不會正視造成災難的人為原因嗎？而一旦他正視，他就會惹禍上身。

因此，如果黃福榮活着，繼續他在內地捨己救人

的善行，他未必會有一個好下場。因為，他行善的地區，有一個不把人當人的政府。

劇作家沙葉新在回應溫總關於尊嚴談話的文章中說，「若要讓人有尊嚴，根本要把人當人。」「…… 不能強行拆毀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發聲 …… 不能把上訪者當神經病，不能逼拆遷户自焚，不能在記者採訪時奪走她的錄音筆，不能在律師取證時置疑他的眼神，…… 不能把人打死説成是『躲貓貓』，不能把人判刑是因為他的言論 …… 甚麼時候真的把人當人，人的尊嚴就成真。」

黃福榮的三姐説，阿福不會喜歡這種烈士光榮，「我細佬覺得自己都係一個普通人，（救人）係本能反應，又唔係一心想捨己救人。」

現代文明社會，普通人就是把人當人的有尊嚴的人。本着對生命的尊重，救人是普通人的行為。在不把人當人的社會，想當一個做點好事的普通人也難。

在懷念黃福榮一生行善的時候，是不是也該想想怎樣去除惡，怎樣實現一個普通人有尊嚴、做善事不會無好報的社會呢？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民主黨方案總算向普選走前一步

倘若（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七日余曾辯之前，支持與反對特府提出的二零一二政改方案的市民，仍是不相伯仲甚或支持者略多的話，那麼經余曾辯後，反對者就肯定大比數壓倒支持者了。倘若該日之前，曾班子仍認為有可能拉攏到立會泛民議員中，立場有搖擺傾向的三兩人的話，經過這場辯論，曾班子應該希望幻滅了。因為泛民議員中即使本人立場搖擺，他也不可能不顧及選民的意向。

因此，原有的方案，即使不稱它是「爛方案」，也在一次辯論之下變爛了。特府若仍將原方案原封不動並一意孤行

地要在六月二十三日拿到立會表決，那麼不獲通過還恐怕是特府的運氣，若通過必激起七一規模盛大的遊行，曾特首怕又要重蹈他前任的腳痛覆轍矣。

倘若余曾辯在五一六之前舉行，選民的投票率絕對會飆高。

由此看來，儘管我們鄙視曾班子落區宣傳政改的醜陋表演，也對曾特首在六月十七日晚的辯論表現嗤之以鼻，但我們還是要對曾班子願意落區和邀余辯論這兩項做法給予鼓勵。他和他的班子即使不濟，至少是開了一個落區及辯論的頭。今後，反對派不妨主動邀曾班子高官辯論一些公共政策，看曾班子是否可延續這種向公眾公開不同意見的風氣？還是來一次就從此嚇怕了？

經余曾辯後，特府的二零一二政改方案面臨尷尬局面：原封不動拿去立會表決絕無信心可通過，收回或大幅修改又有違不久前有關鐵定（六月）二十三日表決及不會修改的宣示。

在這個尷尬時刻，民主黨方案出現了可能被接受的轉機。此前中央的喬曉陽、中聯辦的李剛、郝鐵川，以及所有香港的接近中方人士，如梁愛詩、譚惠珠，還有高官如唐英年、林瑞麟，都說民主黨方案違

反人大「決定」，不可以接受。奴才政團民建聯就更不用說了。余曾辯後，曾蔭權被記者問及會不會接受民主黨方案時，他說若接受了方案而得到民主黨九票，但卻失去了十票，政改還是過不了立會。十票，正是民建聯在立會的議席。也就是說，在此之前，民建聯已向特府表明，若特府吸納了民主黨方案，民建聯是會投反對票的。

然後，形勢說變就變。梁愛詩六月十七日忽然轉軚，表示民主黨方案並不違反人大的決定。梁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非等閒之輩，她若非得到北京同意，是不會對民主黨方案貿然支持的。六月十八日，基本法委員會內地委員饒戈平在北京表示，民主黨方案有討論空間，希望港府與泛民協商解決分歧。接下來，親中人士也紛紛隨着指揮棒起舞，陳弘毅、陳永棋，工聯會的黃國健和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也說可對方案考慮也。

另外一個變化是，新華社忽然中性地報道余曾辯，並不帶批判語氣地報道余的觀點。對此，左派報紙的報道還來不及跟上。

絕對有理由相信，中央的意向有了改變。中共的

政策，從來都是「説變就變，其快如電，眼睛一霎，老母雞變鴨」的。為甚麼會有此變化，可能涉中共高層的權爭，也可能是掌權者聽了不同的香港形勢的滙報。

不過，余曾辯後，泛民及其支持者也起了變化。據報道，民主黨的少壯派，會在六月二十一日的民主黨大會上對妥協方案提出異議，民主黨可能被迫向特府提出更高的要價，比如降低特首候選人和區議員立會候選人的提名門檻，以及承諾二零二零年取消所有功能組別之類。

但無論如何，民主黨的妥協方案，仍是一個擴大立會直選議席使增至四十席的方案。它仍不是取消功組議席的真普選，但較現政制算是向普選走前一步。政治講妥協。走了這一步，仍須繼續努力爭取廢功組和真普選。

未來仍存在許多變數。不過有兩點可以肯定：一，二十三日以原方案交立會表決會成為一個笑話；二，今天的政改向前走大遊行更是一個特大笑話，因為走向哪裏連領隊向前走的人也不知道：未得到來自北京的準確指示也。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

支持民主的市民何去何從

中央突然變調，香港特首、高官、建制派也齊齊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眾人一面，眾口一聲，力撐民主黨改良方案，充分表現出如天安門前步操的整齊氣勢。相反，民主派就爭吵之聲不絕，民主黨內、民主黨與公民黨社民連之間爆發大爭吵。兩大民主元老李柱銘、司徒華各執一端。支持民主的年輕人在《城市論壇》狙擊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一片「出賣民主」、「出賣香港人」之聲。民調雖顯示支持立會通過方案的民意佔優，但就無法平息市民的疑慮：民主派鬧成一團，我們這些長期支持民主

的市民何去何從？

也許我們先要探討一下，中央為甚麼會突然轉態？

主因相信基於香港社會政治過去大半年的變化。

首先是由反政改導致的五區公投。儘管從公投意義來說，百分之十七點一的投票率不算成功，但換一個角度來看，在中央、特府、建制派竭全力杯葛並聯同媒體冷待的情勢下，仍有五十八萬選民前往投票，而且是在無競爭氣氛下明顯地要投票給議題而不是候選人，這就給中央及特府傳出明確的訊息：這是鐵杆支持真普選並了解它的意義的五十八萬人。中央和特府不能忽視他們的存在。

其次是眾多的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積極投身公投，參與六四集會，在眾多公共政策問題上投入抗爭，維園阿哥壓倒維園阿伯。年輕的政治明星開始湧現。

其三，特府施政的頻頻失誤，使社會矛盾增加而且越來越尖銳化。政府的「起錨」宣傳和落區表演激起的是更強烈反對聲浪。

這一切現象，都說明了：如果二零一二政改方案再遭否決，社會的紛爭和深層次矛盾將更趨激烈。

因此，中央的轉態極可能是由於看到香港社會的這種變化。換句話說，是激烈抗爭帶來改變。

筆者在今年（二零一零年）初為文，引用一九二六年，魯迅在香港一次演講：「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來開窗了。沒有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儘管五區公投不是甚麼激烈主張，但從中共專權政治的角度來看，卻是激烈主張。因此，可以推斷，中央這次的讓步，是由五區公投間接促成的。有人主張拆掉屋頂，他就開一個窗。沒道理不接受開一個窗吧。

特府高官和建制派說，民主黨方案是向民主跨進一大步。錯了。它只是向普選推進一小步，而且未來仍有許多陷阱與變數。這已有不少論者指出了。但正如反對方案的李柱銘所言，它確是較原有方案進步。

走了這一小步，不是意味我們不要走以後的更大步，不是說我們不要防陷阱與變數。但筆者年輕時聽過長輩一句話：「一百賒不如五十現；五十現不如十五便。」意思是說：要欠我一百元，不如給現金五十元；給五十元不如立即付十五元。一小步也先收貨再說。更何況不能不照顧有相當數量的市民是反對原地踏步而希望有所進展的。

香港市民是有智慧的，多數人一定不會以收到「十五便」為滿足，還是會力促收回「一百」——百分百的真普選。在推動全面真普選、廢功組的過程中，仍要有、而且一定會有激烈主張。現在的平和改革一小步不是專權政治的掌權者大發善心，也不是提出平和改革的民主黨有甚麼談判技巧，而完全是激烈主張帶來的改變。既如此，今後就仍須激烈主張與平和改革交互推進民主。

激烈派現痛罵改良派「出賣民主」。筆者也收到讀者信罵筆者支持改良方案的文章，罵民主黎，罵《蘋果日報》，對這種激罵，衷心擁護民主的人絕對可以包容。事實上，激罵又或至造成民主派內的分裂，正適

足以向中央和特府表明：香港市民是多麼強烈地要求真普選和廢功組，接受和支持平和改革的民主派和民主人士要承受多大壓力。

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何去何從？今後繼續撐民主和投票給心儀的候選人就是了。議會需要有民主黨、公民黨，也需要主張「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社民連。向專權政治要民主，無疑與虎謀皮。但馬丁路德•金說：「改變不會自動到來，而是要經過不斷的抗爭。」抗爭帶來政改向前一小步，但「路漫漫其修遠兮」，要實現真普選仍待今後的持續努力。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新階段民主運動的開始

「表決過了，是新階段民主運動的開始。」這是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在（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四日於報章刊出給「各位市民」信中的一句話。

余若薇是筆者最尊崇的現任立會議員。眾所周知，她是這次政改方案的反對派。她寫此信時已知新方案必獲通過，因此她呼籲民主運動的同路人，團結合作，迎接新方案實施階段的民主運動。

有人認為，中央和特區政府這次推動政改方案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功地分裂了泛民政黨。觀乎這次政改爭持中引起的泛民之間的互相攻訐，已經到了使支持民主的市民親痛仇快的地步。但分裂會持續嗎？

關鍵在於泛民之間是否在民主價值上有分歧。如果這次不是如激烈反對者所言民主黨向中共賣身投靠，如果民主黨今後仍要循民選之路晉身議會參與政治，那麼我們相信泛民各黨在民主理念上仍然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實現民主的路線有分歧。

路線分歧究竟是策略分歧還是原則分歧？

如從「一國兩制」與《基本法》規定的原則來說，中央一再插手香港內部事務，尤其是把《基本法》的政改「三部曲」由人大常委決定改為「五部曲」，已是對《基本法》的肆意踐踏了。民主黨去同中共官員溝通，謀求北京認同他們的改良方案，這樣做的本身，也是邀請中央插手，違反了「一國兩制」的原則。

然而，中央的插手及在香港政改上的主導，已是現時的政治現實。言論上譴責不能改變這政治現實。按《基本法》，任何政改都要獲立法會議員三分二通過，在人大已作決定功能組別必須佔一半議席的情況下，要功能組別議員投票否決功能組別的存在，根本是無可能。因此，民主黨才會提出這個藉區議會方案去增加「變相直選」議席，使支持廢功組的議席有望可達致三分二的多數。這種「溝淡」功組的方案是達致廢

功組的必要策略。

但走這一步的難度也很大，因為變相直選的區議會新五席要在區議員中提名。以目前區議會組成的情況，倘提名門檻為二十席，那麼民建聯（一百一十八席）足可提名五候選人，而民主黨（五十九席）不足提名三人，公民黨（八席）、社民連（六席）、民協（十七席）均沒有足夠提名席次。

正因為民建聯掌握區議會多數議席，因此特府才有區議會方案，中央才會終於同意民主黨改良方案。

民建聯挾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儘管在區議會選舉中佔盡優勢，卻不必然是囊中物。記得二零零三年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就大獲全勝，讓民建聯的黨主席曾鈺成引咎辭職。當然，零三年是延續「七一」五十萬人遊行的民主熱潮而帶來的選舉形勢。這形勢不易再現。因此，明年（二零一一年）區議會選舉，對爭取民主來說是一場極不易打的硬仗。

除了路線與策略分歧之外，有沒有民主理念的分歧呢？民主黨面對「出賣民主」的斥責，與其戮力反駁，不如視之為「無則加勉」的警戒較好。民主黨在現實政治的無奈之下，邀請中央干預已屬事實。今後北

京可能會給民主黨種種好處，比如發回鄉證給民主黨議員，特府也可能向民主黨議員委任一些公職，內地高官來港的宴會也有了新賓客。看到劉慧卿以燦爛的笑容向議會外的左派人士揮手，人們關注民主黨會否放棄以往的堅持，並非多餘。畢竟無數堅執大半輩子最後晚節不保的例子，筆者一生見得多了。

向專權政治的掌權者要民主，無疑與虎謀皮。為甚麼這次中央會向港人釋出部份普選權利，除了他們認為有很大把握掌握區議會議席的提名權之外，還因為零九年以來香港社會運動的越趨激烈。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的對抗行動影響中國內地，因為內地人通過「翻牆」可以掌握到香港訊息。北京擔心這種港式抗爭會像傳染病一樣被內地人感染，因而影響大陸各地的「穩定」。這是北京讓步的另一因素。明乎此，我們就知道香港仍須有激烈抗爭，我們也理應支持抗爭。

新階段民主運動，既須做地區工作以便力爭明年的區議會選票，亦須有持續抗爭行動。至於現時泛民間的矛盾，筆者願奉上一句西諺：「犯錯人皆難免，寬恕則屬超凡」。期待泛民各黨七一齊集維園再出發。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絕不讓政改一小步演化成最後一步

一九二三年，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發表演講，指出女性要得到解放，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經濟權。他說：「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無賴）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不足為法，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明天是（二零一零年）七一，又到遊

行和爭普選的時候了。今年七一適逢在政改方案通過之後，泛民因政改而產生的爭拗之聲未平息，支持或反對政改方案的市民也有重大分歧。籌辦七一遊行多年的李卓人表示今年最艱難，有市民為泛民爭拗感到「無癮」，對泛民尤其是民主黨的表現「心淡」，以致覺得民主無望，說不會出來參加遊行。

這是一個關鍵時刻，比政改方案的通過與否更具關鍵性。它更需要市民的韌性堅持。魯迅八十七年前的話，結合今天的形勢，就是對民主，要繼承這種「無賴精神」。你說普選已有時間表，不必爭了，我們說要真普選，廢功組；你說政改方案已走了民主一大步了，我們說只是一小步，我們要真普選，廢功組；你說泛民已內鬥得不可開交了，我們說那是泛民之間的事，作為市民，我們要真普選，廢功組；你說泛民老大已妥協了，我們說要真普選，廢功組；你說爭普選的一些行動太激烈了，我們說沒有激烈就沒有改革，仍要真普選，廢功組；你說這次政改已顯示全由北京主導，香港人不必爭了，我們說要真普選，廢功組；你說香港人怎麼爭都鬥不過中共這龐然大物，我們仍然說要真普選，廢功組。

支持民主普選的香港市民，有這種鍥而不捨的韌性嗎？當前真是一個考驗。

儘管筆者認同已通過的改良方案，是向普選邁出的一步，但只是一小步，而且它隱藏着把這一小步當作是最後一步的陰謀。它會開啟一種使功能組別議席永遠存在的模式；它會毒化和腐蝕民主第一大黨，使他們放棄抗爭、尋求走入建制以享受權力滋味，甚至為能接近北京的最高權力而亢奮；它會使北京當權者認為，即使對普選另作解釋，即使暗示不會廢功組，只要給一點小小甜頭，香港人也會喜孜孜接受；它會使北京堂而皇之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關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公然站出來主導屬香港內部事務的政改，而得到泛民第一大黨和多數市民的背書。

這是走向普選這一小步之後，香港人面對的艱難時世，我們認同改良方案，只因為我們的處境如馬克思所說的「雅利安的驢子」，不是在兩堆乾草中選擇哪一堆較好，而是在兩陣棒打中選擇哪一陣較輕。

這一小步，絕不能讓它演化成最後一步。泛民中尤其是民主黨必須警惕，支持泛民的市民必須警惕，你

們縱使一時之間「心淡」也絕不可放棄對民主的堅持。

我們支持抗爭，包括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的激烈抗爭。世界各地的民主，包括台灣的民主，都是一邊在妥協中爭取議會的普選議席、另一邊不放棄街頭激烈抗爭而取得的。何況這種抗爭有向內地人民示範和震懾中南海使他們作出讓步的作用。

我們也支持八十後的民主苦行。他們可能已厭倦了遊行，也厭倦了社民連的抗爭方式，他們透過身體，以苦行形態去喚醒香港許多人已遺忘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應有權利，這是新一代、新形式的抗爭行動。

明天，請到維園，請走上街頭，顯示香港人爭普選、廢功組的堅強意志，即使面對目前這樣令人困擾的艱難時刻，也絕不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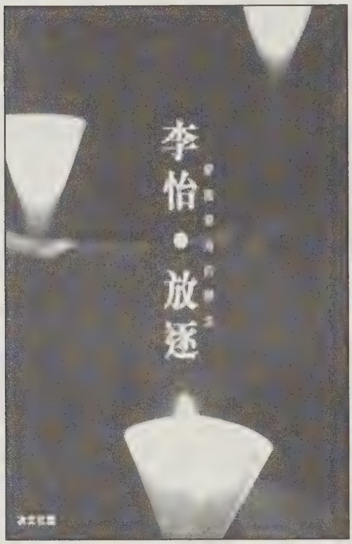
倘若你還沒有想好，暫不想參與遊行，也沒有關係，只要你心中知道，絕不能讓這政改的一小步成為最後一步，仍須持續爭取，就可以了。

讓北京當權者和全世界都看到：香港有這樣堅韌地要取得自己應有政治權利的市民，香港會有光明的未來。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

補購

李怡◎評論集



《放逐》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放逐》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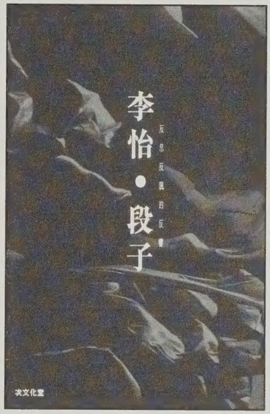
李怡◎散文集



《對應》



《思緒》



《段子》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對應》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思緒》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段子》 ___ 本（每本港幣48元）（連郵費）

姓名：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 者 服 務 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邊緣•沒有季節的廢墟

購買地點：.............................. **區** ....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

姓名：＿＿＿＿＿＿＿＿ **年齡：**＿＿＿＿＿＿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

職業：＿＿＿＿＿＿＿＿＿＿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

＿＿＿＿＿＿＿＿＿＿＿＿＿＿＿＿＿＿＿＿＿＿＿＿

＿＿＿＿＿＿＿＿＿＿＿＿＿＿＿＿＿＿＿＿＿＿＿＿

＿＿＿＿＿＿＿＿＿＿＿＿＿＿＿＿＿＿＿＿＿＿＿＿

＿＿＿＿＿＿＿＿＿＿＿＿＿＿＿＿＿＿＿＿＿＿＿＿

＿＿＿＿＿＿＿＿＿＿＿＿＿＿＿＿＿＿＿＿＿＿＿＿

＿＿＿＿＿＿＿＿＿＿＿＿＿＿＿＿＿＿＿＿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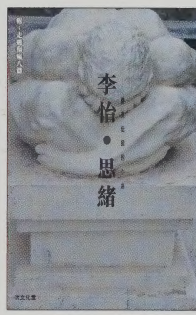
李怡作品



《李怡・放逐》



《李怡・對應》



《李怡・思緒》



《李怡・段子》

多倫多大學和
香港中文大學

這本書，是我的

藏書人：

收藏日期：

CUHK Libraries
004935625

沒有季節的廢墟

- 香港會不會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被邊緣化？是香港近年引起關注的問題。香港應該邊緣化呢，還是應該中原化？
- 香港從來就處於中國大陸的邊緣。百多年來，香港的邊緣地位反而擁有自己生存發展的空間，也使香港在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共和中有重要角色。
- 如果香港放棄了邊緣地位，融入中原體制，包括本書所有文章在內的言論都不復存在，香港成為山西，對香港、對中國會是好事嗎？
- 中國富起來了，崛起了，國家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國家領導人在外國領袖面前威風了，但中國公民在國際社會卻是不被尊重而且受歧視的族群。
- 保住香港的邊緣地位，維護邊緣社會的價值觀，避免受中原政治文化污染，保持香港人的尊嚴，也促使中國社會讓人民也有尊嚴。

知也無涯・憂也無涯

封面設計：原秋白　攝影：Jim. P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ISBN 978-962992254-2
9 789629 922542 80
SCB 535 $80
ISBN : 978-962-992-254-2
Printed in Hong Kong
www.subculture.com.hk